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二十世紀
重大外交謀略

 **eBOOK**
内网资料 非同寻常

二十一世纪重大外交谋略

列斯特约 以退为进谋

俄罗斯母亲呵！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这是俄共（布）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对德妥协的布列斯特和约后，列宁发表在《消息报》上的一篇文章的开头。这三句诗，摘引自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文章题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它以简短扼要的文字，在评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后，又指出布列斯特和约的全部屈辱性，笔意是沉痛的，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和力量。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苏维埃政权急需集中力量治理国内。而列宁从由前线发回的详细情报又看出，军队没有斗志，再不能打下去了；士兵一心只想回家。工人和农民都厌弃长期的战争，国民经济已经完全崩溃了。但是，前沙皇政府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英、法协约国一方对德、奥作战。十月革命后，尽管俄国已是“改朝换代”，交战双方却偏不认帐，仍死死拽住列宁的苏维埃俄国不放，要它继续战争。而只要俄国还处于同德奥交战的状态，就无法保证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完全巩固。要真正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结束战争。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从十月革命刚一胜利就展开了争取和平的斗争。

苏维埃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公正的民主的和解开始谈判”。但是，英法两个“盟国”不接受苏维埃政府的建议。由于英法两国拒绝和谈，苏维埃政府执行苏维埃的意志，决定同德奥两国进行谈判。

谈判于1917年12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12月5日，签订了暂时停止战争行动的协定。在德国，企图摧毁俄国的主战派还占着优势。德国政府派蛮横的帝制派军阀霍夫曼将军担任和谈代表团的主席。

谈判是在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普遍疲于战争和俄国军队从前线撤退、前线陷于瓦解的局势下进行的。在谈判期间看出，德帝国主义者企图夺取前沙皇帝国的大块领土，而把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变为德国的附属国。

而在这种局势下继续战争，又无异拿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命作赌注。摆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面前的是，必须接受苛刻的和约条件，对当时威胁最大的德帝国主义让步，以便取得喘息时机，巩固苏维埃政权，建立一支能保卫国家、抵抗敌人进攻的新的军队——人民的红军。列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向俄共（布）党中央建议尽快对德国缔结和约。缔结得越早，受的屈辱越少；缔结得越迟，对方要“价”便会更高，条件会更苛刻，屈辱会更重。列宁苦口婆心地向全党、全国反复说明这个道理。

可是，国内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反动分子，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到最坏的旧沙俄分子，都疯狂地进行煽动，反对签订和约。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通过破坏和谈，挑起德国人进攻，使尚未巩固的苏维埃政权遭受打击，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受到威胁。

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里，列宁坚决主张尽快单独同德国议和。列宁

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完全支持他，斯米尔加和索柯里尼柯夫毫不犹豫地跟着他走。但是极大多数中央委员和曾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同志（曾经同他们一起进行过十月革命）都反对列宁，反对他的观点，把各委员会也牵扯进了。彼得格勒市委员会也好，莫斯科省委员会也好，都反对伊里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布哈林、拉狄克、奥新斯基等在彼得堡开始出版他们的“共产主义者”日报，胡说什么与其缔结屈辱的和约还不如让苏维埃政权灭亡好些，并且完全不估计力量空谈革命斗争。他们认为，同德国帝国主义政府缔结和约就等于放弃自己所有的革命阵地，就等于背叛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曾经在一起工作过多年、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也得到过他们的支持的许多非常亲近的同志都属于“左派”共产主义者。这时，在列宁的周围形成了某种真空。托洛茨基则采取了一个特别的态度。他是个喜欢说漂亮话，喜欢装漂亮姿态的人，因而与其说他是在考虑如何使苏维埃国家摆脱战争，如何获得时间以便巩固力量和发动群众，不如说他是在考虑如何做漂亮的姿态。他说：“我们不缔结屈辱的和约，我们也不进行战争。”列宁称这种姿态叫做贵族老爷式的姿态。他说这个口号是容许无产阶级执政的、正在开始伟大建设的国家让人任意洗劫的冒险行为。

列宁更坚决反对“革命战争”的口号，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空洞而危险的词句，只能断送革命。他指出，俄国的农民是拥护工人阶级的，但是，在当时还不能进行革命战争。沙皇的旧军队上气不振，再也不能打仗了。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建立起来。欧洲工人的革命运动会取得胜利，但是在取得胜利之前，还得有一段时间。因此，目前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尽快地取得可能的和平，解散沙皇军队，恢复国民经济，建立新的、由工人农民组成的、社会主义的军队。假如能够有几个月的喘息时间，就可能改造国家。“而这种改造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和全世界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也将力强大的工农红军建立巩固的经济基础。”

列宁解释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巩固，同时也保证了全世界工人运动的未来的成功。苏维埃政府的国际政策必须估计到在国内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

在1月21日（俄历8日）举行的党负责工作人员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参加苏维埃第三次大会的代表），列宁宣布了他的关于立即议和的提纲。他详尽地指出，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未来的成功，有尽快争取和平的必要。大部分人反对列宁，而主张立刻发动革命战争。

1月24日（俄历11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列宁坚决主张立即缔结和约。他说：“我们现在不得不签订的和约无疑是一个可耻的和约，但是如果进行战争，我们的政府就会彼推翻，而和约将由其他政府来签订。”斯大林坚决拥护列宁。这天投票，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九票）赞成托洛茨基的立场：战争应当结束，但不应签订和约，军队应当复员；只有七票反对托洛茨基而支持列宁。2月3日（俄历1月21日），就现在是否允许缔结和约问题再次表决，五人赞成，九人反对。2月17日，五人赞成立刻向德国建议缔结和约，六人反对。2月18日，就是否要向德国人提出恢复和谈问题表决，六人赞成，七人反对。与此相应，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也作出了同样的决议。这些决议，都先后送达苏俄在布列斯特的和谈代表团。

1918年1月末，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在签订和约

问题上，给政府广泛的权力。

但是，俄共（布）党内的不同意见却使参加和谈的政府代表团无所适从。2月上旬，列宁在答复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代表团的询问时写道：“在答复你们的问题之前，我要先同斯大林商量。”之后不久，列宁又通知代表团说：“斯大林刚到，我将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将立即给你们一个共同的答复。”接着，答复来了，是列宁和斯大林合署的，宣称他们仍然坚持以前的意见：立即缔结和约。

不料，2月10日（俄历1月28日），作为驻布列斯特的苏维埃代表团首席代表，托洛茨基却叛卖性地违背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直接指示。他声明苏维埃共和国拒绝在德国提出的条件下签订和约，而同时他又通知德方，说苏维埃共和国将不进行战争，并在继续复员军队。

正如列宁预料到的，托洛茨基的“策略”果然坏了大事——它帮助了德帝国主义。几天以后，德国军事当局宣告停战期已过，2月18日，新的攻势开始了。俄国旧军队的残部抵挡不住德军攻势而开始溃散。德军迅速推进，夺取了大片俄国领土，并威胁着彼得格勒……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以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出“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召唤。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踊跃拿起武器，高唱着《国际歌》开赴前线。德国占领者在纳尔瓦和普斯科夫附近遭到了坚决的回击。他们向彼得格勒的推进被阻止了。于是，抗击德帝国主义军队的日子——2月23日，便成了苏联红军的生日。

与此同时，列宁继续着对德媾和的努力。还在苏俄接到德国停战期结束的通知后，列宁立刻在中央委员会上主张必须立即邀请德国进行新的和谈。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拥护他的主张，但是大多数（托洛茨基、布哈林、乌里茨基等）仍表示反对。

2月18日（俄历5日）早晨，列宁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上重新提出他的主张：一小时也不能再迟延了，必须立即建议缔结和约。列宁依旧是少数。就在这些日子里，德军迅速向前推进的消息不断传来。德国人利用他们的突击部队，很快地攻占了不止城市。当晚，中央委员会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

“决不能同战争开玩笑……”列宁说，“德国人会立刻抢走一切东西。玩笑已经闹到这种走投无路的地步，如果继续采取中间路线的政策，革命就非失败不可。”

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说：“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混乱，我不同意托洛茨基……我们现在必须估计一切，并声明我们主张重新举行和谈。”

2月18日的会议，中央委员会终于通过了列宁提出的致电德国政府立即缔结和约的建议。但德方为了保证自己获得更有利的和约条件而继续进攻，直到2月22日德国政府才表示同意签订和约，但这时的和约条件比原先苛刻得多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自然还包括波兰，都割让给了德国。乌克兰脱离苏维埃共和国，变成德国的附属国。苏维埃共和国必须向德国人交纳赔款。德国还限定48小时答复。

为此，俄共（布）中央于2月23日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与会者又争论不休。一个与会者后来写道：“伊里奇急冲冲地跑来出席中央委员会有决定意义的这次会议。他就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头巨狮。他怒气冲冲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整个面部的表情严肃坚决，全身筋肉紧张着。‘我再也不能等待，一秒钟也不能等待了。这问题已经折腾得够了，一秒钟也不行！’他说‘一秒

钟也不行’时，是用一种坚决、认真，同时又充满愤怒的齿音吐出的——这是伊里奇在‘发怒’时的一种特征。于是伊里奇发出了他最后通牒。”

列宁当时愤怒地指出，德国的条件，无论多么苛刻，必须立刻接受。没有别的选择，任何别的决定就等于宣布苏维埃政权的死刑。他毅然宣布说，假如那种玩弄革命词藻的政策（就是空谈那种实际无力发动的革命战争）继续下去，他将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他将向党呼吁，党是会拥护他的。他将力他的路线而斗争。与会者都沉默了，开始认真的思索。大家都知道列宁是认真的，可是，党和国家无论如何都不能没有列宁。2月23日这天的最后结果，是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列宁的提议（7人赞成，4人反对，4人弃权）。中央于是决定接受德军统帅部提出的全部条件并签订和约。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叛卖行为使苏维埃共和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此时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人中，乌里茨基代表布哈林、皮达可夫等宣称他们要辞去党和苏维埃里的职务，托洛茨基也在这时递了辞呈。

然而，列宁像狂涛中的岩石那样屹立不动。他们的辞呈吓不住他。他还是坚持立即议和的政策。

苏维埃代表团立即赶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去进行和谈；3月3日，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了。

后来，当代表团把布列斯特和约的正本交给列宁看时，他心情沉重地说：“如果我有任何办法避免这样一个和约，我是既不愿看它，也不愿遵守它的。”

1918年3月6日，在列宁的建议下，俄共（布）召开了一次非常会议，即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面临着这样一个极端重要问题：如何把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帝国主义战争中挽救出来。列宁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尖锐而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采取的策略。他说：西方的革命较难开始，但是较易继续，而在俄国这里，开始较易，继续下去却较难。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都明白何以我们不得不签订这样一个压迫人的、屈辱的和约。我们没有军队，士兵都不愿打了，而围绕着我们的，是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强盗。军队是我们国家的病灶，愈早解散愈好。列宁说：和平将给我们以喘息时机。“我们要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来说服人民，要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并且告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要建立自我纪律，建立严格的纪律，否则你们将来还会像现在这样遭受德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

列宁说，工人农民是会了解和平的全部必要性的。”每一个实事求是的农民和工人都会力我辩护，因为他们懂得。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而对德宣战将会助长俄国资产阶级的煽动，将会葬送苏维埃政府并使工农在这些日子里所争取到的一切化为乌有。我们必须懂得怎样退却，我们必须善于等候时机，我们必须利用这一喘息时机来加强力量。

在代表大会上，列宁的政策再一次受到以布哈林、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激烈反对。正如列宁在这次会上所做的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报告指出的：“……我们的党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

3月8日，列宁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案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

在决议通过的第二天，列宁在《不幸的和约》一文中写道：“和约条件的确苛刻得难以接受。但是历史终究会占上风……我们要从事组织，组织和

组织。不管有怎样的考验。未来一定是我们的。”

3月16日，在莫斯科还举行了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也是非常代表大会），以704票对285票、115票弃权批准了布列斯特条约。

列宁在大会上说，已经缔结的和约是屈辱的和约，但是它给我们国家以恢复经济和重建的机会。他说：“我国人民不只是贫困和落后，它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凑合（而不是由于它特殊的功绩和历史命定如此），能够十分荣幸地高高举起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他又说：“……人民既然能创立苏维埃政权就决不会灭亡。”

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9日，起义者推翻霍亨索伦王朝，在柏林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共和国。13日，列宁指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至此，布列斯特和约实际仅存8个月又10天。

列宁的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国际外交谋略史上是一个典型的迂策，或者说是以退为进，舍小谋大术。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史上这种以退为进的迂策不绝于书。《老子》二十二章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矜，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是对“以退为进”行为谋略的精当描述。毛泽东也指出过：“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正而走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刘伯承亦说：“创造弱点，诱敌深入，以迂为直，走迂回路比直路好。”布列斯特和约对于列宁以及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祖国、苏维埃人民来说是极不公正的，屈辱的，不堪忍受的。可是，为了祖国的长远利益，列宁不仅自己要忍受，而且也费尽心思地劝同志们忍受，劝全党、全国忍受。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小”和“大”当然是相对而言），而退后一步自然宽。列宁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退一步进两步”。这实际也是他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目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及苏维埃国家，通过对德情和而韬光晦迹，卧薪尝胆，很快便将失去的东西重新夺回来。历史证明列宁的谋略是无可指摘的。诚如《联共（布）党史》所承认的：

“布列斯特和约的缔结，使党有可能赢得时间来巩固苏维埃政权，调整全国的经济。

“和约的缔结，使得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冲突（奥德两国同协约国在继续进行战争），瓦解敌人的力量，组织苏维埃经济，建立红军。

“和约的缔结，使无产阶级有可能保持农民对自己的支持，为在国内战争时期击溃白卫将军们积蓄力量。

“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教导布尔什维克党，当具备进攻所必需的条件时应大胆坚决地进攻。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列宁教导党，当敌人力量显然超过我方力量时，应怎样有秩序地退却，以使用最大的努力准备对敌人实行新的进攻。”

以饵投所欲 苏德暂缓兵

1939年8月23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签订了一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者任何攻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该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任何一方将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条约还规定双方政府今后保持联系，对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交换情报；对某些问题产生分歧时，双方通过和平方法，友好地交换意见，以资解决。条约有效期为10年，除非缔约一方在期满前一年通知废止，条约将被认为自动延长五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震惊了世界，英、法等国这才感到大祸临头而气急败坏；德国的盟国意大利、日本也坐立不安，怨气冲天……

本来，苏联是未曾想到会同法西斯恶魔签订什么条约的。1939年4月15日，在德国法西斯吞并捷克斯洛伐克（3月15日），宣告英法姑息纵容法西斯的绥靖政策（以《慕尼黑协定》为标志）破产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便邀请英、法外长在莫斯科开始政治谈判，谋求在三国间签订一个为期5到10年的互助条约，以遏制法西斯德国在欧洲的侵略扩张政策，继而制止一触即发的欧洲大战。但直到8月间，英、法两国还在王顾左右而言他，故意推诿拖延，无心同苏联结盟。相反，却在这期间向希特勒继续频送秋波。英国政府甚至准备向德国提供一笔5亿或10亿英镑的军事贷款。

事情很明显，英、法等国正力图把战争推向东方，“祸水东引”，既消灭社会主义的苏联，又确保本土的安全，可谓“一石二鸟”。

斯大林十分明白英、法的用心。他很是忧虑：如果西方国家这一阴谋得逞，苏联不仅是同希特勒单独作战，而且是同得到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支持的希特勒作战。不用说，这种战争是可怕的。

不料此时希特勒向斯大林伸出了橄榄枝。8月15日晚上8时，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奉命进见莫洛托夫，并按照柏林的指示，向他宣读了德国外交部长表示准备到莫斯科来解决苏德关系的急电。

原来，英、法两国虽然向德国大献殷勤，极力怂恿它入侵苏联，德国却偏不买帐。这是因为在希特勒看来，德国与英法的矛盾较之与苏联的矛盾更为直接和更加现实：毕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迫使德国长期处于屈辱地位的，不是苏联而是英法；在欧洲和世界称霸的，不是苏联而是英法。再说此时的苏联已很强大，不经长期准备，是不敢贸然进攻的。所以，从1939年5月起，希特勒德国就一再向苏联进行外交试探，表示愿意放弃反苏立场，承认苏联边界不可侵犯，企图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协议，使德国在向西方发动进攻时免遭腹背受敌之虞。此时，斯大林正试图同英法结盟而遭拒绝，却恰逢希特勒又一次找上门来。斯大林立即想出了一着将计就计之策。

当时，莫洛托夫“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德国大使舒伦堡的絮絮叨叨，表示“热烈欢迎德国想改善对苏关系的愿望”。为了试探对方的意图，莫洛托夫进一步问道：德国政府是否有兴趣在两国之间签订一项互不侵犯的条约？是否准备发挥它对日本的影响来改善苏日关系并消除边境冲突？如果苏

德联合担保波罗的海国家安全的的话，德国以为如何呢？他最后说，所有这一类问题“都必须具体讨论，那样，在德国外交部长来到了这里以后，就不会仅仅是交换意见，而是能作出具体规定。”

莫洛托夫的这些建议，正好是希特勒所希望的东西；而且，他比苏方提出的更具体、更痛快。因为这个条约将使苏联置身于战争之外，从而能使他放心大胆地进攻波兰，而无需害怕苏联干涉。如果苏联置身事外的话，他深信英国和法国是会不寒而栗的。纳粹独裁者很快即无条件地接受了苏联的建议。舒伦堡大使奉命再次进见莫洛托夫，并且通知他：

“德国准备同苏联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如果苏联政府也有同样愿望的话，这项条约的期限可定为25年，期满以前不得废除。除此而外，德国还准备同苏联一起对波罗的海各国作出担保。最后，德国也愿意发挥影响来改进并巩固苏日关系。”

德国政府表面上装作不急于同莫斯科“做交易”，其实是非常急迫的。里宾特洛甫在这封电报的后面加上一段“附言”，作为他个人给大使的指示：“我要求你再一次把这一指示逐字读给莫洛托夫听，并且要求立即知道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先生的意见。为让你心中有数起见，再告诉你一句要绝对保密的话，如果我能在本周末或者下周初到莫斯科的话，对我们将特别有利。”

第二天，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山顶上巴望着莫斯科的回答。但会谈的结果却使纳粹头目感到失望。联共中央和斯大林其实不但知道希特勒在着急，而且无疑也完全知道他为何着急，却不紧不慢地耍弄着他。在德国大使向苏外长读里宾特洛甫的电报的时候，莫洛托夫并不怎么关心它的内容，听完了以后，他就拿出了苏联政府对德国外交部长8月15日第一次来信的书面答复。

这份答复照会一开头就尖刻地数落了纳粹政府以前对苏联的敌视行为……继而笔锋一转：

“虽然如此，如果德国政府现在要对过去的政策实行改变，准备认真改善同苏联的政治关系的话，苏联政府只能对这样一种改变表示欢迎，并且准备在自己这方面修改政策，以便认真改善对德关系。”但是，苏联照会坚持认为，这一定要通过“认真而实际的步骤”来做到，而不是像里宾特洛甫所建议的那样跨一大步。

8月18日晚，希特勒接到这个报告后，在上萨尔斯堡的夏令总部又给舒伦堡大使发出了一封由里宾特洛甫署名的“特急”电报，要他转告莫洛托夫：德国外交部长建议自己“立即动身来莫斯科”，其“将由元首授以全权，来全面地而且最后地解决全部问题”。

当时，希特勒进攻波兰已是万事俱备，急于开弓，可苏联却慢吞吞地大卖“关子”，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神经质地等待着莫斯科的决定。直到8月19日晚上7点10分，那份望眼欲穿的电报才终于来了。就在那天下午4点30分，莫洛托夫受权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德国大使，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草案文给他，并说，如果苏德贸易协定能在20日签字并公布的话，里宾特洛甫就可以在8月26日或在27日到莫斯科来。这位大使在电报中还说，他想劝诱苏联外长同意里宾特洛甫早日访问莫斯科，“不幸，没有成功。”

希特勒再也无时间与莫洛托夫“泡”了，他决定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8月20日下午6点45分，他签名的致斯大林的信以加急电报的形式直传莫斯科：

“在我看来，鉴于我们两国都有建立彼此间新关系的愿望，最好是不要丧失时间。我因此再次建议你在星期二（8月22日）接见我的外交部长，至迟到星期三，8月23日。德国外交部长有最充分的权力来拟定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议定书。鉴于目前的国际形势，外交部长在莫斯科只能逗留一天，至多两天，再长是不可能的。我将十分高兴得到你尽早的答复。”

在以后的24小时中，希特勒一直是处在近乎精神崩溃的状态中。他连觉都不能睡。半夜里，还打电话给戈林，说他心里嘀咕斯大林对他的电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并对莫斯科迟迟不作答复感到不安。到8月21日晚上9点35分，收到斯大林同意里宾特洛甫8月23日来莫斯科访问的复电后，希特勒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1939年8月23日夜，斯大林接见了里宾特洛甫，他们商定了协议的文本，但会议的气氛是冷淡的。陪同里宾特洛甫前往的主要助手高斯说道：

“里宾特洛甫在前言中亲手加进一句有关德苏两国形成友好关系的重要的话。斯大林对此表示反对。他说，苏联政府在被纳粹政府劈头盖脑地倾倒了6年大粪之后，不能突然之间把一项德苏友好宣言拿到群众面前来。因此，前言中的这一句话就被删去了。”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知道，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他们是敌人，在他们之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8月23日这晚，两国外长还是在条约上煞有介事地签了字。据说，双方同时还“在严守秘密的会谈中讨论了划分各自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问题”，结果达成如下协议，即所谓“秘密附属议定书”：

——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所属地区发生领土上或政治上的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应成为德国和苏联两国势力范围的边界。双方承认立陶宛在维尔那地区的利益。

——在波兰国家所属的地区发生领土上或政治上的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一线为界。

——缔约双方是否需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以及这个国家的边界应如何划定的问题，只有在今后政治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中方能予以明确决定。在任何情况下，两国政府都将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东南欧，苏联提请注意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方面宣布，它对这些地区在政治上完全不感兴趣。

希特勒的盟友闻讯后便骂开了娘。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公开表示不同意。这个条约对东京更是沉重的打击，因为日本已经在中蒙边境同苏联作战。据说，他们曾告诉希特勒，日本在8月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进”。在反对德国同苏联签订这个条约的叫嚷声中，日本平沼内阁倒台了。在伦敦，保守党中的希特勒支持者也大发脾气，他们第一次叫嚷要希特勒的命。但是，张伯伦政府依然故我。其后10天中，甚至在希特勒进攻波兰之后，张伯伦仍然企日召集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四国（英、法、德、意），来商讨同希特勒取得协议以解决波兰命运的问题。只是在这种尝试遭到拒绝后，张伯伦才同波兰签订了延搁已久的同盟条约，并且敦促波兰进行抵抗。

然而，直到1939年9月15日希特勒以百万大军向波兰发动闪电式袭击半个月后，英国、法国也没有送来任何有效的援助。只有社会主义苏联真诚地表示愿意援助波兰，却遭到亲德反苏反共的波兰政府的拒绝。9月17日，当德军攻占了大半个波兰、合围华沙并限令华沙当局在12小时内投降之时，

苏联政府照会波兰驻苏大使：

“波兰政府已经崩溃且已无生命的迹象，这就是说实际上波兰国家和政府已不复存在。因此，苏波之间缔结的条约已归于无效……波兰已经成为可能对苏联造成威胁的种种偶然和意外事件的方便场所。苏联政府迄今为止一直是保持中立的，但它不能再以中立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局势了。……苏联政府对居住在波兰境内的同胞——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的命运不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同胞被抛弃，任人摆布而毫无保障。”

这天凌晨，苏军越过苏波边境向波兰东部进军，不仅进驻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而且越过了寇松线。苏联所占领的波兰地区面积为 20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300 万人。接着，9 月 28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边界条约，确定两国“最后的国界”；10 月，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成立苏维埃政权并分别并入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至 1940 年 8 月，苏联有效地建立起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东方战线”。

苏联利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给予的机会，不仅准备了防御，而且也通过战争以外的一切措施来阻挡德国人渗入东欧各国。希特勒后来在他对苏联的宣战书中透露了这一点，并且极为愤恨地列举了苏联人阻挡他的那些行动。诚如 1939 年 9 月 28 日《纽约时报》的电讯所言：“苏联人的行动已经阻止了希特勒对于罗马尼亚所抱的野心。”9 月 27 日，美联社从东欧发出的一条电讯说：“对苏联的尊敬已经大大地增加了；毫无疑问，农民们宁愿要苏联人而不要德国人呆在他们的边界上。”

当时，德军在撕破波兰防线，横扫波兰以后，并没有就此却步，而是继续挥军前进，朝东南到利沃夫，朝东北到维尔那。据说罗马尼亚的“铁卫队”曾经计划举行广泛的暴动，以迎接德国军队的到来。德国军队接近时，卡利奈斯库首相就被刺杀了。靠近波兰边境的一个罗马尼亚城市确实爆

发了暴动，然而一看到河对岸是苏联军队而非德国军队时，暴动就消沉下去了。

斯大林这一战略的实施，无疑使苏联暂时避免了法西斯祸水的冲击，为加强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实力，争取到一年半的宝贵时间。正如丘吉尔当时所说：“斯大林同希特勒做交易一举，……在当时是高度现实主义的。斯大林的首要考虑，就同任何其他国家政府首脑的考虑一样，是他自己国家的安全。”据斯大林后来告诉丘吉尔说，他在 1939 年夏天深信，希特勒就要打仗了。他决定苏联决不能被别人骗到单独对德作战的倒霉局面中去。如果同西方结成靠得住的联盟证明已不可能的话，那为什么不转而联合希特勒呢？他不是已突然来敲门求教了吗？毛泽东那时也指出：“英美法的计划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它们自己‘坐山观虎斗’，让苏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出来收拾残局。这种阴谋，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德国在占领波兰后，即挥戈西向，于 1940 年 6 月攻占法国，接着向英伦三岛实施“海狮作战计划”。英、法“祸水东引”的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苏联崔可夫元帅亦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也打破了日本妄图联合德国，从东西两线夹击苏联的阴谋，使苏联能放手地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反纳粹，主权国家建立新同盟 为和平，美苏英中首倡联合国

1995年10月22日上午，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岛，一阵阵凉爽的海风从大西洋上吹拂过来，将竖立于联合国大厦广场上的185面联合国会员国的会旗吹得飒飒作响。联合国历史上规格最高、最为隆重的会议——联合国50周年特别纪念会在这里正式开幕了，在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上，各国主要领导人和国际组织代表济济一堂，回顾联合国的发展历程，总结经验，对联合国50年来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并对联合国在21世纪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任务和使命提出了大量建议与希望。

联合国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成立的，它的诞生顺应了时代的进步。50年来，联合国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不平坦的道路。

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加拿大纽芬兰阿金夏湾的军舰上，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次会晤。当时战争已打了近两年，纳粹军队席卷了除苏联外的几乎整个欧洲大陆，英国基本上受到重创。美国虽尚未参战，但罗斯福总统意识到纳粹发动的欧洲战争已“发展成为一场走图征服世界的战争”，日本的侵略扩张也已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美国迟早将参战。在这种形势下，英美双方迫切需要加强联合，共同制定反法西斯对策。会议讨论了对付日本可能发动的进攻问题、援助苏联问题及双方的合作问题，并于14日发表了《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联合宣言》，即《大西洋宪章》。宪章宣布：在最终消灭纳粹暴政之后，两国希望建立一个“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以“保证使全世界所有人类都能无所恐惧不虞匮乏地生活的和平”。这一提法后来被认为是战后国际组织的最初设想。

苏联对建立战后和平体制也表现了相当的关注。在1941年9月举行的战时盟国伦敦会议上，苏联代表迈斯基代表苏联政府表示同意《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在该年年底的《苏波友好互助联合宣言》中提出：战争胜利后，“只有通过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组织，将各民主国家联合在一个持久同盟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持久和正义的和平”。

这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元旦，正在对轴心国家作战的美、苏、英、中、印度、波兰等26个国家的代表聚会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宣言》（又译作《联合国家宣言》）。

在宣言中，各签署国政府表示赞同《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保证运用其全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反对其政府正在与之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者”。各国政府还表示，“凡在为战胜希特勒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正在或可能提供物质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均可签署《联合国宣言》。这样，反法西斯的盟国等于接受了要在战后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的设想。

据说会议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曾为宣言的名称大伤脑筋。“同盟”一词曾用过多次，太滥了：“联盟”一词又总令人想起对德、意、日的侵略百般纵容的国际联盟。一天晚上，罗斯福与丘吉尔讨论了几个小时也没讨论出结果，只好去休息。第二天一早，罗斯福穿衣时突然灵感大发，想到“联合国”这个词，他急忙坐上轮椅找到丘吉尔。据说当时丘吉尔正在洗澡，听到“联合国”一词也拍手称好。于是，此次会议的宣言便被命名为《联合国宣言》。

进入 1943 年以后，整个二战形势已发生战略性转折，盟国胜利在望。如何安排战后世界的问题显得更加紧迫，苏、美、英等国加紧了对未来国际组织的酝酿和协商。

1943 年 10 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三国外长会议，讨论签署一项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会议就是否要中国参加的问题展开争论。当时美国总的战略方针是先欧后亚，即先打败德国再打败日本。罗斯福考虑，在美国军主力东移之前，太平洋战场方面首先要支持中国“拖住日本人”。美国坚持中国应享有大国地位，罗斯福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将来中国“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会起到维护和平和繁荣的适当作用”。美国最终说服苏、英达成一致，使会议在 10 月 30 日通过了由美国政府起草，经美、苏、英、中四国签字的《美苏英中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明确宣布，四国政府“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

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成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四国政府第一次共同宣布，一致赞同要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签字的四国代表是美国国务卿赫尔、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

美、英、苏三大国在关于要否组建世界性国际组织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这一国际组织不能重蹈国际联盟的覆辙，它必须是强有力的，足以制止各种侵略战争，这一点也是一致的；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大国在这一组织中必须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对各种重大的决议拥有否决权。这也是三国的共识。但是，丘吉尔却担心英国在这一组织中不能占到优势地位，“夹在美、苏两块大磨石之间，被置于最不舒适的处境”。因此，他积极鼓吹在这一组织内部实行“地区原则”：在一个大的世界组织之中，应该有 3 个区域理事会，其中最主要的是欧洲理事会，另外还有太平洋理事会和美洲理事会，在这 3 个区域理事会之上，成立世界最高理事会。丘吉尔设想以此来达到突出英国、联合美国、孤立苏联的目的。

1943 年 11 月 28 日，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德黑兰会议。这是美、苏、英三国政府首脑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三巨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国际会晤。会议的主要宗旨是讨论未来国际组织的总体设想和结构性原则。会上，丘吉尔放弃了“地区原则”。三国共同表示，新的国际组织应当是世界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12 月 1 日，三国首脑声明：“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以及所有联合国家负有至高无上的责任，要缔造一种将博得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的和平，这种和平将在今后的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

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同斯大林举行单独会晤，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要不要中国充当“世界警察”的问题。罗斯福认为，未来的联合国应由全体大会、执行委员会以及“世界警察”这三个层次机构组成。“世界警察”为最高层次，应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组成。“世界警察”拥有快速处理任何威胁世界和平的事变（包括突发性事变）的权力。

斯大林赞同罗斯福的观点，但是，他却提出，“世界警察”应该由美国、苏联、英国三国组成，中国无权列入。就在 10 月间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期间，当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把审议《美苏英中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列入会

议议程时，莫洛托夫就提出过异议。斯大林的真实意图是要排斥中国，但他让莫洛托夫提出的表面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会议，由三国会议来讨论四大国的声明文件是不合适的。但是赫尔坚持要把中国列为宣言的共同发起国，甚至表示不惜以会议达不成任何协议为代价。最后莫洛托夫作了妥协，答应把中国的地位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美国为什么要如此“抬举”中国呢？这是因为美国要称霸亚太地区，需要在太平洋彼岸的亚洲地区寻找一个帮手，而处于东亚文化圈中心地位的中国当是一个理想的帮手。罗斯福奉行“大国合作政策”，以此作为称霸世界的工具。但是，他要保证美国在“世界警察局”内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否则，“大国合作”可能使他人得利。美国与苏联之间，毕竟存在着社会制度的差异。美国与英国，在社会制度上是相同的，这一点可以保证两国在大多数问题上投一致票，但是，大英帝国曾经是世界霸主，它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拥有自己的利益，这一点又决定了英美两国的利益和意见有时会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丘吉尔因此也曾同斯大林站在一起，反对中国的大国地位，主张应由“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统治世界）。美国提携中国作为进入“世界警察局”的“后起之秀”，提携蒋介石作为世界“四巨头”之一，蒋介石必然感恩戴德，这样可以保证美国稳固地控制“世界警察局”。1943年3月艾登访美期间，罗斯福曾向他托出美国的底盘说：“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将成为抵销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因此，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斯大林心目中，蒋介石只不过是美国的傀儡。他不愿意一个反共反苏的邻国同自己一起并列于“世界警察”的宝座上。

但是，斯大林又不便揭穿罗斯福的心思，因为他还急需美英及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而德黑兰会议的首要议题正是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所以，在这次会期间，斯大林只是委婉地向罗斯福表示，中国的仗打得并不好，而且他不认为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是强大的。他说，欧洲的一些小国不喜欢“四警察”组成的机构，例如，一个欧洲国家或许会对中国有权对它运用某种权力表示不满。

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坚持拉拢中国，斯大林提出了替代方案。他建议组建两个组织，一个是欧洲组织，有美国、英国、苏联，可能再有另一个欧洲国家参加；另一个是远东组织或者世界组织。这样的话，或者是一个欧洲组织加一个远东组织，或者是一个欧洲组织加一个世界组织。方案很周密，言词很委婉，但最终目的是不让中国进入“世界警察”的行列。

然而，倔强的罗斯福仍一再坚持，使斯大林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样，中国便进入了“世界警察”集团。以后，丘吉尔为了抗衡美苏两国，又把法国拉入大国集团，“四警察”成了五大国。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苏、英、中为落实四国《普遍安全宣言》，举行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着手构筑未来国际组织的轮廓。而构筑联合国轮廓的会议在美国境内举行，本身即预示着美国对联合国强大的控制力。敦巴顿橡树园是一个古老的庄园，位于华盛顿郊外乔治顿区的中心。该庄园以前属于富有的美国外交官罗伯特·伍兹·布利斯的家族所有，后来成了哈佛大学的产业，这次被美国国务院临时租用作为会场。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21日至9月28日，苏美英三国代表之间进行会谈；第二阶段从9月29日至10月7日，美英中三国代表间举行会谈。

参加第一阶段会议的美、英、苏三国首席代表分别为：美国副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苏联驻美大使安·葛罗米柯。

由于三国政府的初步建议中有不少地方比较接近，开始时会议进展很快。

会议决定沿用1942年1月26日华盛顿会议使用的名称“联合国”或“联合国家”，把未来的国际组织命名为“联合国”。它将包括大会、安理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四个主要机构。安理会为新组织中维护和平的主要机构；中美英苏及“于相当时期后”的法国应拥有常任理事席位；安理会的决议对所有会员国都有约束力。大会的重要决议应以与会投票之会员国2/3多数决定、其他决议应以简单多数决定等。但此次会议对安理会的投票程序问题及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资格问题未达成一致。

特别是对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资格问题，美国方面按照罗斯福的指示，提出在1942年1月《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的国家，都可以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但紧接着，它就要求均加8个国家也作为创始会员国，这些国家属于所谓的“同联合国家实行联合的国家”，实际上是已经同轴心国断绝关系，对联合国家实施过一定的援助，但没有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这8个国家中有6个是拉丁美洲国家。

苏联认为这是美国企图增设傀儡，葛罗米柯提出，要把苏联的16个加盟共和国都列为创始会员国。苏联其实对此早已作好了应对之策。1944年2月，莫洛托夫经过斯大林批准的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便宣布苏联已对国家体制进行改革，扩大了16个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这些加盟共和国今后可以自由地“与外国建立直接关系”，并在全苏军队的范围内建立独立的兵团。但是，美、英代表却未曾想到葛罗米柯会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将这个宣言煞有介事地予以兑现。

罗斯福当时十分紧张，担心会议有可能因此而破裂。他一方面下令对这件事严加保密，另一方面致函斯大林磋商：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您的代表团谈到，苏联政府可能希望考虑让16个苏维埃共和国分别为新的国际组织的成员。这个意见引起我的很大关注。尽管您的代表团已经表明，这个问题将不在目前阶段的会谈中提出，我感到我必须告诉您，就美国以及无疑就其他重要国家来说，如果在国际组织最后建立和开始工作以前的任何阶段提出这个问题，整个提案肯定会遭受危险。我希望您能在这个问题上使我安心。“现在把这个问题推迟并不会妨碍以后在大会成立时进行讨论。届时，大会有作决定的全权。”

斯大林作了答复，口气是委婉的，立场却是坚定的：“……我认为，苏联代表团就这个问题发表声明是十分重要的。自从今年年初我国宪法作了某种改革以来，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都十分关心友好国家对苏联宪法规定扩大它们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权力一事的反映。您当然知道，举例来说，加入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人口的数量和政治作用上，都要超过某些我们大家都同意应当成为国际组织创始国的国家。因此，我希望能再有机会向您说明苏联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政治重要性。”

最后，双方都同意，暂时搁置这一问题。

从9月29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在会议内部使用的话语中，第二阶段被称为“中国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为首的中

国代表团取代了苏联的位置。这一阶段，中国代表团对苏、美、英三国签署的《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提出了几项补充意见：在联合国宪章中强调，调整或解决国际争端时，应该对正义及国际法原则加以应有的重视；联合国大会应具有进行调查与作出建议的任务，以发展并修改国际法上的规范与原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具有在教育以及其他一些文化问题上促进合作的特殊任务。显然，已进入“五大国”行列的中国，在感情上还是倾向于中小国家的，这些意见的客观效果，是限制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强权政治”。这些意见被会议所接受，列入上述建议案，作为“四强”一致同意的提案提交旧金山会议审查。

1945年初，德国法西斯临近灭亡，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为了协调战争最后阶段盟军的作战计划及安排战后世界事务，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的前沙皇尼古拉行宫利瓦吉亚宫召开了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未能解决的两个问题被提上了讨论桌。

敦巴顿会议结束后，美国国务院曾于1944年底就大国否决权问题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在雅尔塔会议上，根据罗斯福的指示，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对这一方案作了解释。他表示，从美国政府的观点看来，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需要考虑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常任理事国取得一致是必要的。第二个因素是，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极端重要的一点是，对这个组织的所有会员国，不论大国和小国，都应该一视同仁。

“因此”，他解释说，“美国的方案把安理会需要决定的问题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重大问题，如接纳和开除会员国，推荐秘书长候选人，采取行动排除对和平的威胁，军备控制等，这类问题需要与会的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不论它是否是争端的当事国。另一类是所谓准司法性的问题，或称为程序问题，如一项国际争端如果长期存在下去是否会影响世界和平，安理会可否邀请有关国家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和可否对它们提议采用和平的解决方法等，这类问题也需要与会的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但如果某一常任理事国为争端的当事国，则不能参加投票，即丧失了否决权。”丘吉尔当即表示赞同这一方案。

苏联在会前的交涉中，一直反对大国在“准司法性”的问题上没有否决权这一建议。斯退丁纽斯发言的当天，斯大林仍然持保留态度。但第二天，莫洛托夫就在会上宣布，苏联在听取了斯退丁纽斯的报告和丘吉尔的发言后，认为美国方案的目的是赋予大国在实质性问题上的否决权，实行大国一致原则，以保证大国在维护和平方面的团结，苏联可以接受这一方案。

至此，关于否决权使用问题的“雅尔塔公式”达成了。

在此次会议上，英美两国对苏联提出的额外投票权问题达成谅解，支持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即苏联拥有三个投票权。同时英美苏三国还达成默契，若美国提出增加投票权的要求，英苏也支持美国享有与苏联相等的三票。但消息传到美国国内，遭到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不得不在4月宣布不再谋求额外的投票权。这样，美国便只有一个投票权。

会议还决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起草联合国宪章。参加会议的国家应是1945年2月8日前在《联合国宣言》上签字的、而且在1945年3月1日前向共同敌人宣战的国家。会议建议中国和法国同苏美英一起，共同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邀请国。中国接受了这一建议。法国则表示同意参加会议，但不担任发起国。至此，联合国组织的筹备工作

基本就绪。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隆重召开，历时两个月，参加国达50个，正式代表282名。美苏英法中五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分别为斯退丁纽斯、莫洛托夫、艾登、皮杜尔和宋子文。只是、联合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罗斯福在会议开幕前10余天逝世了。

在开幕式上，美国继任总统杜鲁门发表了讲话：

“大会的成员们，在历史上，还没有一次会议比你们今天在旧金山开幕的这次会议更为重要，更有必要。

“我代表美国人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你们是美好世界的建筑师，我们的未来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由于你们在这次会议上的努力，我们将知道在苦难中的人类可能得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这次会议的目的并不是像过去所理解的那样起草一个和约。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来解决领土、疆界、国籍和赔偿等专门性的问题。

“这次会议将集中全力来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建立起一个必要的机构来保持和平。你们将制定根本性的宪章。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问题的实质是成立一个明智的机构来解决国际争端。”

他最后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美满得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永恒的尊严受到尊重。”

发起邀请的四大国的代表团团长也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每人的发言各有侧重点。

4月25日至5月2日为大会一般性辩论，研究、讨论了会议的组织工作。会议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研究前几次会议制定的宪章草案以及各国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会议组织程序规定，一切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决议应以到会及投票者的2/3多数通过，一切程序事项的决议以过半数票通过才能有效。会议决定中、英、俄、法和西班牙语五种语言为大会正式工作语言。

5月3日至6月20日，专门讨论和制定宪章，这是此次会议最要紧的阶段，也是争论最多的阶段。如大会权限的问题、托管的问题，但争论得最多、最激烈的还是安理会的权限和否决权问题。这一回，大国之间的分歧和中小国家与大国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

参加会议的中小国家对五大国在联合国内拥有特权非常不满。他们要求限制否决权的使用范围，最好是从根本上废止否决权。当会议开始讨论安理会表决程序时，会外的私议就转变成会上的公开抗辩，形成40多个中、小国家与大国对立的局面。澳大利亚等国认为大国在安理会享有的权利“是小国和 zwar 不平等的典型表现”，提出多种修正案，并提出23个问题称“问题一览表”，要求四个发起国予以解释。

四个发起国也就如何答复“问题一览表”展开讨论。美国认为自己有把握操纵大会的多数，把大会变成“表决机器”，也有把握在安理会里获得多数票支持，因而既同意扩大大会的权力，也准备缩小大国否决权的使用范围。由于担心大会和安理会都会成为美国手中的工具，苏联代表团在内部讨论时，对大国否决权提出两点意见：决定一个问题是否属于“程序问题”，应该属于否决权的使用范围；一项争端非经全体常任理事国同意列入议程，安理会不得进行讨论。

对苏联的第一点意见，其他三国认为可以勉强接受。对其第二点意见，则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答应，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扩大了否决权的使用范围。美国提出，如果接受了苏联的立场，“整个拟议中的世界组织就将成为一出滑稽戏了。”美国甚至以不参加联合国相威胁，要求苏联作出让步。苏联代表团毫不相让。会议为此陷入僵局。

幸好当时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举行会晤。杜鲁门立即密电霍普金斯，要他直接向苏联最高领导人提出此事。值得杜鲁门庆幸的是，斯大林很快作了让步。随后，四大国即发表了《四发起国代表团关于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的声明》。

《声明》的总精神是，坚持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力。众小国对此虽很是不满，但却徒唤奈何。不过，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还在对日作战），战后各国百废待兴，都面临着一个一致团结，争取与维持和平，重振国家的迫切任务。因此，未就上述问题再作计较，而全身心地投入更为重大的议题里去了。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联合国的框架结构基本上构筑完毕，由此形成《联合国宪章》。《宪章》确定了联合国的四个宗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力根据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的国际问题；构成一个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

为了实现这些宗旨，《宪章》规定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该遵守的四条基本原则：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

根据《宪章》规定，联合国设立六个主要机构；它们是：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

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每年举行一届常会，每年9月第三同的星期二在纽约开幕，一般在12月20日左右闭幕。如有半数以上的会员国或安理会请求，可举行特别会议或紧急特别会议。

大会的职权范围是广泛的，但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权力还是掌握在安理会手中。安全理事会由11个理事国组成，除五大国任常任理事国外，6个非常任理事国由大会选出，任期2年，不得连任。1965年9月起，安理会成员增至15国，即非常任理事国从6国增至10国，其分配原则是亚洲和非洲共5国，拉丁美洲2国，东欧1国，西欧及其他地区2国。

安理会和大会是联合国各机构中的主要机构，负责处理重大的国际政治和军事问题。

联合国的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又在瑞士的日内瓦设有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大会、安理会和其他机构的会议，通常都在总部举行。

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举行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签字仪式在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大礼堂的讲台上插着数面会员国国旗，大圆桌上放着五种文本的宪章，它们分别用中、法、英、俄和西班牙文写成。

第一个签字的是中国代表团，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作为代表团全权代表之一也走上前去，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接着是苏联、英国、法国三个常任理事国。其他国家依照各

自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签字。签字仪式是庄严而隆重的，来不得半点儿

草率和仓促。50 个国家的 153 名全权代表签字，花了整整 8 个小时。

美国作为东道国，最后一个签字。杜鲁门总统随同美国代表团一起参加签字仪式。

6 月 26 日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联合国的“宪章日”。当天晚上，旧金山会议在歌剧院举行闭幕式。

五大国的代表在闭幕式上致词，另有五个由大会选出的国家，巴西、墨西哥、南非、捷克斯洛伐克和沙特阿拉伯，也派代表在会上讲话。杜鲁门总统再次发表演说：

“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坚固的基础，在它上面我们可以建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945 年 10 月 24 日，已有过半数的签字国家批准了宪章并向美国交存其批准书，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1947 年的联合国大会将这一天定名为“联合国日”。

1946 年 1 月 10 日至 2 月 14 日，51 个国家（波兰于上年 10 月 15 日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使签字国由 50 个增加至 51 个）的代表在伦敦举行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联合国正式开始工作。早已名存实亡的国际联盟于 1946 年 4 月正式宣告解散，其财产和档案材料均移交联合国。

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它充分反映出世界的多样性。至今还找不出任何别的政治场所能比联合国大会更充分，更有效地辩论和审议各项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议题。各会员国不论大小强弱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一年一度届会上的一般性辩论，常有上百位的外长、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参加并发表讲话，给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信息和动态。

联合国大会通过对各种重大国际问题的讨论，往往使多数国家的声音成为国际舆论的主导方面，并具有强大的道义上的权威性。大会决议往往是世界局势的一个风向标，表明事态的性质与重要程度，表明各国可以实现合作的程度。大会以它多样化的声音和各种决议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产生积极影响。

战后世界虽然一直未能摆脱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但人类防止了新的大战，维持了 50 年的和平。对此，联合国的作用可以说是明显的。

此外，在非殖民化方面，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方面，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定国际法和国际规范方面，联合国都作出了卓越贡献。不言而喻，这些贡献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通力合作的结果，而联合国创立者们的功勋也是不可抹煞的。

当然，联合国远非十全十美，在作出上述贡献的同时，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少。它曾一度被称作是某个大国的“表决机器”，后来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峙，联合国又变成了“冷战场所”。造成这种状况，既有联合国体制上的弱点，也有特定国际环境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后者。

联合国原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的首脑们（主要是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为了有利于本国在战后世界中发挥支配作用，进而争夺霸权地位而提议建立的，因而在酝酿过程中，三大国首脑各人都有自己精明的小算盘，为使自己在未来联合国中居主导地位而进行穿梭外交与激烈游说。但应指出的是，三巨头们虽然主观上和在当时是在为自己国家、自己民族谋利益，但其创建联合国的举措从客观上看，从根本上看，却是符合历

史潮流的，符合世界各国利益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合国已愈来愈摆脱少数几个大国的控制了。最突出的例子便是 1971 年美国长达 20 余年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议案的最终被否决。

广岛投放原子弹 缘自逼日早投降

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50 周年，1995 年美国邮票公司原本计划于下年 9 月推出一套 10 张一组的纪念邮票，其中一张是核爆炸后的蘑菇云，另一张是美军当年在冲绳登陆的图案。

消息传入日本，立即引起朝野大哗。最今日本人感情上不能接受的便是印有蘑菇云的那张邮票。据说该图案是由广岛、长崎核爆炸后升起的蘑菇云和战后美国在南太平洋无人岛上核实验蘑菇云照片组合而成，邮票下方标有“原子弹加快了战争的结束。1945 年 8 月。”图案中英文字母构成的地球图案的原文是 B29 型轰炸机分别于 8 月 6 日和 9 日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使两座城市遭到毁灭。邮票公司发言人称，这套纪念邮票在选择图案时“曾与美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历史学家交换过意见。”言外之意是，图案选择已得到政府的认可。

正忙于在国会中审议议案的村山首相得到消息

后，当时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对美国此举公开表示不满。他表示，此举有伤日本国民的感情，必须用一适当方式向美传递日本政府的不快。内阁官房长官五十岚广三更直截了当：“由于原子弹的爆炸，日本共有 30 多万人死亡，至今仍有众多的原子病患者挣扎于苦难之中，这一痛苦深深留在日本国民的感情中，务必使美国理解这一点。”《每日新闻》等报刊发表的社论调门更为激烈，主张不仅要求美国理解日本国民的感情，更应该向美提出抗议。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寺田辉介却于 3 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自相矛盾的谈话。他先是说，“从原子弹投下的时间和日本投降的时间关系看，我认为正如美邮票公司所指出的，原子弹的使用加速了日本的投降。”随后他又再次举行记者招待会重新发表谈话说，“日本政府并不认为原子弹的使用加速了日本的投降。”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否如此呢？

1945 年初，苏联红军和英美军队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进入德国本土。5 月 2 日，苏军攻克柏林。5 月 7 日清晨，美国在新墨西哥州南部阿拉莫戈多沙漠的“三一试验场”使用 100 吨梯恩梯炸药，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试验计划的演习。德国人害怕了，当晚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5 月 7 日午夜前夕，日本驻伯尔尼的海军武官藤村义郎中佐和大阪船运公司驻欧洲代表津山重美等人，获知德国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东京发了密码电报。在以后的 8 天中，他们又秘密发了 6 份电报，报告德国投降情况和英、美军队准备从欧洲调至远东的情况，并告诫要尽早寻求和平，切勿错失时机。这一重要情报是藤村和津山与美国战略情报局负责人艾伦·杜勒斯进行一系列秘密会晤后获悉的。

一天、两天、五天……13 天过去了。东京方面未作出任何反应，心急如焚的藤村和津山又给他们的统帅部发去急电，要求对第一份电报尽快作出答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这些电报在日本海军高层引起了激烈反响。海军作战部长、军务局长和高木惣海军少将，强烈主张接受杜勒斯建议，他们自告奋勇，愿意飞到瑞士去谈判。然而，丰田军令部长以及他的幕僚却强烈反对。就这样，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陷入一片争吵中，致使日本在寻求和平问题上举棋不

定，错失良机。

早已想报珍珠港一箭之仇的美国缺乏耐心了。他们开始了更加猛烈的军事攻势。5月23日下午，他们一次就出动562架B—29轰炸机，将包括工业区和居民区在内的日本东京港西侧地带炸成了废墟。36小时后，502架“超级空中堡垒”又飞临东京上空，投下了3260吨燃烧弹，使东京的34.2平方英里的面积被焚。

4天之后，即5月27日，美机又把矛头转向日本的第5大城市横滨。当517架空袭的飞机飞走后，该市85%的地方已成一片火海。把东京、横滨地区炸成废墟后，美B—29轰炸机又集中轰炸大阪和神户两市，不到两个星期这两个城市便被摧毁。在其他各主要城市中，有100平方英里面积被夷为平地，200万幢建筑物（几近全部建筑物的1/3）被削平，致少1500万人无家可归。

面对美国疯狂的武力威胁，最先失去理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元凶之一、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他和他的死党，不顾人民的死活，狂妄地叫喊“血战到底！”紧接着，首相铃木贯太郎在国会上发表了所谓有关当前时局的讲话。这位78岁的首相讲话所提出的论点让听众大吃一惊。他说，“日本并不好战。它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国家。它和美国没有理由要打仗，但是，如果真的打起来，战争将打得很长，结局也是很惨的。太平洋，顾名思义应该是太平之洋，不允许在它的洋面上运送军队。然而，如果这样一个不幸事件果然发生，双方都会受到神明的惩罚。”当他演讲结束走下讲台时，渴望和平的人民愤怒的情绪顿时就爆发出来：轻蔑的嘘声，威胁的拳头和“打倒铃木内阁！”的呐喊声响成一片与此同时，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三一试验场”进行的原子弹试验已进入最后阶段。而关于要不要使用，如何使用原子弹的争论，也在美国科学界及军方、政府的决策层内激烈展开。很多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始终拒绝考虑使用原子弹。提出最明确的保留意见的第一位物理学家是西拉德。他就是1939年要求爱国斯坦向罗斯福上书的主要发起人。他所期望的是美国先于德国拥有原子弹。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希特勒不仅没有原子弹，而且已经垮台。剩下的日本不可能拥有原子弹，因此他认为美国绝不能单方面使用这种杀伤性极大的武器。当他正想把自己的想法转告罗斯福总统时，后者却于4月12日溘然逝世。

虽然美国“曼哈顿计划”提炼出来的铀和钚只够制造三颗原子弹之需，但继任总统杜鲁门依然准备把这些放射性原料全部用在日本身上，以促使日本早日投降；同时也可避免进攻日军的美军进一步的伤亡。毫无疑问，攻取硫磺岛与冲绳岛期间（1944年12月—1945年6月）美国海军与陆军的巨大伤亡是促使杜鲁门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原因之一。根据此时刚刚统计出来的数字，美军在这两次战役中的伤亡人数（7.35万人）已经超过1944年夏天的诺曼底登陆（7.3万人）。

当美军正在硫磺、冲绳两岛苦战之际，美军统帅部已在草拟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由于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对“曼哈顿”计划一无所知，因此准备按传统的作战方式，分两个阶段登陆日本。第一阶段将在1945年9月占领南部，第二阶段在1946年3月攻占东京。据估计美军为此将要付出伤亡50万人的代价。因此原子弹的一些主要研制者如奥本海默等认为，如果原子弹成功地制造出来，并付诸运用，情况将大为改善。

5月28日，在新成立的临时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临时委员会根据奥本海

默的意见，提出三项建议：

1. 对日本使用原子弹；2. 目标应是周围有居民区的军事设施；3. 使用之前不进行任何预先警告。

但在这次会议上，有不少科学家对奥本海默的三条建议持有不同主张。可是，奥本海默没有采纳和支持同行们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道义方面的意见，而完全从政治与战术角度上处理了这个问题。知情者猜测：这很可能是奥本海默认为，在这种高级会议上，科学家们慈善观点根本不会得到支持，也可能是由于他过于陷入当时的迫切问题之中，而缺乏更广阔的视野。不管什么原因，虽然科学家们继续努力以争取不使用原子弹，但这次临时委员会的决定却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三一试验场”正全力进行准备工作。负责监督内爆式原子弹试验的高级科学家小组——称为“牧童委员会”——最后确定了试验的日期在7月20日，后来又提前到7月16日。何以如此呢？现在看来，其目的只有一个，即为新任总统杜鲁门参加波茨坦会议撑腰壮胆。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突然辞世，震惊了全世界。戈培尔在电话中兴奋地对希特勒说：“上帝曾两次把你从野蛮的暗杀者那里拯救出来。敌人1939年和1944年对准的死神，现在却把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打倒了。这是奇迹！”

日本对罗斯福之死更是幸灾乐祸。冲绳日本陆军根据大本营的指示，印了许多传单，把罗斯福之死与冲绳岛上的美军命运联系起来。传单写道：

“我们对于罗斯福总统之死，表示深切哀悼。他的逝世给冲绳造成了美国的悲剧，你们70%的航空母舰，73%的战列舰，或者是沉没，或者是受伤，使15万人伤亡。不仅已故总统，就是其他任何人，听到受了这种毁灭性损失的消息，都会因忧愁过度而去世，导致你们已故领袖去世的可怕损失，将使你们成为本岛的孤儿……”

美国“四面楚歌”。杜鲁门就是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接任总统的。为了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迅速走出困境，杜鲁门上任后不久，就试图通过外交渠道，看看是否有必要举行一次美、苏、英高级会议来讨论战后的前途问题。根据所得情报，他决定提出举行首脑会议。会议地点选择了柏林以南12英里的波茨坦。这里曾经是皇帝的宫殿。会议日期预定在7月15日。

杜鲁门拟定好提议后，心里才踏实下来，并相信自己在会议上能否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意图解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在阿拉莫戈多进行的原子弹试验的力量。他无意公开利用原子弹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但他确信，有了威力无比的原子弹撑腰，他毋须在棘手的外交问题上作出不属美国人性格的让步。

出于上述目的，杜鲁门断然决定：试验日期必须改在7月16日——即波茨坦会议开幕第二天，以配合他在波茨坦会议上的讨价还价。

7月14日，美国阿拉莫戈多沙漠。这天阳光灿烂，天气极好。美国雇佣了15万人、用了3年多时间、花费达30亿美元试制出的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被缓缓吊离地面约100英尺的预定位置上。特种工程部队事先订购了一大批床垫，当原子弹吊到一定高度之后，把床垫铺在炸弹下面，差不多足足堆了20英尺。这样，万一炸弹掉下来，可以落在软绵绵的床垫上，不至于发生意外。

7月15日，这颗在实验室创造出来的宝贝，在人们提心吊胆中度过了一

天。

7月16日凌晨4点，下了一夜的雨终于停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工作一切准备就绪。5时10分，试验场西北20英里以外的康帕尼亚山上，聚集着一大批不直接参加试验的科学家和贵宾以及其他参观人员。而在试验中心附近的一个代号S的坑道里，则挤满了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的物理学家和警卫部队。

试验中心的年轻科学家麦克基本，接受命令引爆第一颗原子弹。

“差一分……差50秒……”倒计时声音在沙漠营地周围发出回响。

在差45秒时，麦克基本合上了开关，投入自动定时操作。在起爆前10秒钟，麦克基本合上了最后一个手动开关。

“十、九、八、七……一，零——！”

第一颗原子弹在一座钢塔顶上爆炸了。

有幸在现场的人们，事后纷纷描述亲眼目睹的壮观景象。

科学家具托·弗里斯回忆道：“这时万籁俱寂，忽然出现一片耀眼的强烈阳光——或者说是像太阳一样的强光。这是一股炽热的、无定形的白光，把沙漠边缘的小沙丘照得雪亮，仿佛要将它全部熔化。”

奥本海默回忆道：“有几个人笑了，有几个人却哭了，大多数人是惊呆了，一声不响。我心中浮上古印度圣诗勃哈加瓦基达中克里布那试图说服王子执行使命的一句诗：‘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波茨坦会议，未能按杜鲁门最初提出的7月15日进行，而推迟了两天，即7月17日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是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的。当时，苏联尚未参加对日作战，故未签字。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参加讨论，但公告在发表之前已得到中国的同意。以后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便正式在公告上签字，所以公告也是四国对日共同宣言。公告因此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法西斯发出的最后通牒——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

公告在7月26日发出。不料日本政府却麻木不仁，置若罔闻。7月28日，铃木首相竟说：“不予理睬，只有完成战争。”铃木挑战的言行又一次把日本推向了不可挽救的大灾大难之中。

面对铃木首相的狂言，杜鲁门总统十分镇静，因为他手中握有原子弹。他准备向日本甩出这最后一张足以令世界颤抖的王牌。而在此之前的7月24日，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也郑重地向斯大林提到“美国已拥有一种具有空前毁灭性能的新式武器”。

杜鲁门说完这句话后，很有興味地等待斯大林的反应。但斯大林并不惊讶，只是说，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希望美国“好好利用它来打击日本”。

斯大林很简短的答话，虽然有些令杜鲁门扫兴，但也让杜鲁门获得一个信息——惩罚日本也是苏联所希望的。同时，斯大林也毕竟知道了美国的军事威力。杜鲁门满意地同斯大林握手告别，此时，他已经下定决心向日本投放原子弹。

杜鲁门总统把使用原子弹看作是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的观点，其实也是罗斯福总统在世时的看法。早在1944年秋，罗斯福同英国首相丘吉尔专门为使用原子弹的问题，签订了一项备忘录：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直至它投降为止。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虽然也希望尽量不使用原子弹，但是考

虑到要进攻日本本土，在九州登陆需出动 76 万多兵力，将会有惨重的损失，要减少伤亡，又不能排除使用原子弹。而海军上将莱希等人则认为，常规炸弹能够结束战争，不必使用原子弹。艾森豪威尔将军私下里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说，日本已经失败了，投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否则会“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

要不要对日本投放原子弹？这个并非儿戏直接影响二战局势的重大问题，杜鲁门起初也举棋难定。归纳起来，当时促使他决策使用原子弹的主要因素大致有两个：一是威慑苏联。因为杜鲁门尚不知斯大林是否准备及时参加对日本的最后打击以便大大减少美军的牺牲？如果斯大林决定这样做，苏联是否企图借机扩充它在远东的势力？美苏在东欧的分歧能否消除？将来如何统治德国？……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却直接关系到美国在战后对世界的争霸——本来，在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曾许诺打败德国之后三个月内即对日宣战，但现在杜鲁门却不希望斯大林兑现诺言。他认为，对付日本，最好是由美国独立行动为上策，选择上策——那么就必须投放原子弹。二是成慑日本。尽管后者的国家和军队都处于困境之中，但日本军国主义者仍然和过去一样不肯投降，决心抵抗到底。1945 年 7 月中旬的一天，美国情报局又截获了一份由日本外相发给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的密电，其中提到“无条件投降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也就是说，日本不会乖乖地听美国的话——无条件接受投降。这份电报送到杜鲁门手中，他瞄了一眼，便把它紧紧捏成一团丢到一边。这无疑加重了他决定惩罚日本的砝码。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即 1945 年 5 月 28 日，在美国核武器临时委员会首席会议上，一些科学家提出反对对日本使用核武器的主张后，美国许多科学家开始对原子弹使用进行道义上的反思。其突出代表是莱奥·西拉德。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希望能改变局势，他写了一份请求书直接送交总统。

这份请求书立即得到了科学界同仁的认同与支持，有 60 多名著名科学家签名，联合呼吁杜鲁门总统不要在对日本提出警告而对方拒绝投降之前，就突然使用原子弹。但这封也许可以改变广岛悲剧的信，被当时热衷于制裁日本的格罗夫斯将军作了巧妙的安排。他一方面允许这份请求书在一部分科学家之间传布，并且在整个曼哈顿计划范围内使科学家感到并没有人对这份请求不满意。另一方面，他安排一条递送路线，恰好使得请求书尚未到达华盛顿之前，杜鲁门已离美赴波茨坦开会。

因此，杜鲁门并未看到这份请求书的内容。就这样，关于使用原子弹的两个主要因素，就完完全全摄入了他的大脑，而反对使用原子弹的因素却是一片空白。这样，蘑菇云毁灭日本广岛便主要是杜鲁门的一种政治手段和外交手段的体现。

8 月 2 日，波茨坦会议结束。杜鲁门总统从柏林回美后，立即决定由美国独立迅速结束远东战争。3 天后，即 1945 年 8 月 6 日，杜鲁门总统断然下令——向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此时，美国空军早已作好了一切准备。

就在 1944 年秋季，当原子弹尚未问世时，在美国空军总司令阿诺德指示下，对很多架 B— 29 超级重型轰炸机进行了重要改装：去掉机关炮。它们的任务就是装载一颗原子弹。与此同时，又集中了 1500 名即将参加投掷第一颗原子弹各项工作的官兵。这些人员全部混编在一起，称第 509 大队。此外，从 12 名飞行员中遴选了 1 名优秀驾驶员保罗·蒂贝茨上校及其他飞行人员。他们都在内华达州的边境地区受训，以熟悉 B— 29 和练习从 1 万米高空向沙

漠中直径为 200 米的目标投掷。

1945 年 4 月底，蒂贝茨和他的人员秘密飞离美国，来到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第 509 大队将在这个 10 公里宽、20 公里长的珊瑚岛上建立基地，供使用的 B—29 机有 15 架。紧接着又有 200 名机械人员到达。最后到达的是一批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全体人员被圈在用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基地内，在一大群秘密警察的保护下开始工作。

1945 年 7 月 16 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型巡洋舰驶离旧金山，26 日到达提尼安岛。舰上运载着一个长 4.50 米的原子弹金属外壳以及一小块价值昂贵的铀 235。这块铀放在一个由两人看管着的、直径 45 厘米、高 60 厘米的铅制圆柱内。

8 月 6 日前，第 509 大队的 B—29 机连续数天飞临日本领空进行训练。8 月 4 日，蒂贝茨和他的机组还进行了一次模拟轰炸试飞。

8 月 5 日下午，原子弹完全准备就绪。技术人员已把那一小块铀 235 固定在弹壳内，“就像藏在一大团棉花中的一颗小小的钻石”。起重机把绰号“小男孩”（象征罗斯福总统）的原子弹装到一辆牵引车上，然后被运送到离试飞飞机埃诺拉·盖伊一公里处。那里早已挖好了一条壕沟。这颗 5 吨重的原子弹被放置在沟内。埃诺拉·盖伊被异常小心地移到壕沟上面，然后打开机身腹部的舱门，把原子弹升起牢牢地固定在舱内。

8 月 6 日 1 时 37 分，3 架气象飞机首先起飞。1 个半小时以后，埃诺拉·盖伊机组共 12 人也上了飞机，各就各位后，起飞的命令下达。埃诺拉·盖伊开始冲向跑道，并加速前进。然而飞机太重了，上面除了 5 吨重的原子弹外，还有 26,500 升汽油。飞机以每秒 80 米的速度全速滑行，即将到达跑道尽头时，却起飞不了。这时，蒂贝茨万分焦急，浑身已被汗水浸透。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用全力把驾驶杆往后一拉，在距跑道终点只有几米远的地方，机头终于抬起。这时是 1945 年 8 月 6 日 2 点 45 分。

广岛 8 月的夜晚异常炎热，人们经常被警报从睡梦中吵醒，这已习以为常了：美军飞机每日每夜要向日本的土地上扔下成吨成吨的炸弹。然而广岛始终幸免，未遭破坏。可就在 8 月 6 日早上当地时间 8 点，响起了一阵警报，广岛高空出现 3 架飞机，其中一架便是埃诺拉·盖伊。9 点 14 分 17 秒，当机上的视准仪对准了广岛一座桥的正中时，自动装置被打开。60 秒钟后，原子弹从打开的舱门落入空间。这时，飞机作了一个 155° 的转弯，俯冲下来，一瞬间，飞行高度下降 300 多米，这样做是为了尽量远离爆炸地点。45 秒钟后，原子弹在离地 600 米的空中爆炸。一团酷似蘑菇的云雾开始上升。强烈的光芒使人双目失明，10 亿度的高温把一切都化为灰烬；放射雨使一些人在整整 20 年中缓慢地走向死亡；冲击波形成的狂风所到之处，所有东西无不摧毁殆尽。直接处在爆心投影点下的人和物像原子分离那样全部分崩离析，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后来才发现在地上有几个似乎是勾勒出来的影子一样的人体外形。离中心远一些的地区，可以看到在一刹那间被烧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残骸。更远一些地区，有些人侥幸活着，但却严重烧伤，一些人的双眼已烧成两个窟窿。在 16 公里以外的地方，人们仍然能感到灼热的气流。

广岛不复存在了。一二十万人死于爆炸中和后来的原子病。

这天，杜鲁门总统即向日本发出另一份通牒——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从空中以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毁灭武器将日本毁灭。

广岛的悲剧却并未使日本立即同意接受波茨坦的最后通牒，即无条件投

降。他们还在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调停上。可是，8月8日，苏联按照它于2月间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对日宣战了。

杜鲁门总统迟迟没有从日本方面收到任何有关投降的确切消息，此时他断定，仅在广岛扔下原子弹还不够。他继而下令，于8月9日在长崎投下绰号“胖子”（温斯顿·丘吉尔的体形昵称）的第二颗原子弹。

8月9日中午12时01分，“胖子”被投掷在长崎市区。这枚炸弹原定的目标是小仓，由于小仓当天低云多雾，遂使长崎遭受灭顶之灾，10万人在核裂变中死亡与残废。

其实，当8月6日广岛落下第一颗原子弹后，8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以第二部长有未精三中将作为委员长，由原子能权威仁科芳雄博士等有关人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即奔赴广岛，调查事实真相。

调查结果足以让日本害怕之极，对此本应立即作出反应，但日本已失去进行迅速决策的能力。待日本作出战败承诺时，时间已推迟在杜鲁门的最后通牒发出的两天之后，即8月8日5时。此时，杜鲁门已下令向长崎释放出“胖子”。

8月9日晚，铃木首相召集军政界12个高级首脑召开御前会议，由裕仁天皇主持。会议就如何回答波茨坦公告进行讨论。阿南等军事将领认为日本尚有能力和抵抗，提出要接受波茨坦公告必须附带四个条件：由日本自己审判罪犯；由日本自己实施裁军；日本领土不得占领；天皇地位不变。但其他人都赞同外相东乡的主张，即“在不包含要求改变（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一事的谅解下，接受这个公告”。最后，东乡的提议被天皇采纳，并于10日通知美、英、苏、中四国，请求接受日本有条件的投降。可就是这样的决定也遭到日本军方的反对，国内已出现叛乱。而杜鲁门则宣布不接受有条件投降。此时的杜鲁门似乎成竹在胸。他坚信日本人不会甘冒第三颗原子弹的打击而固执下去的。而此时，杜鲁门已无原子弹可扔——已买空卖空。而事实则硬是按照杜鲁门的估计进行着：这时，东京谣言四起，说第三颗原子弹即将投放到首都，铃木内阁就要被军事政变所推翻。14日，天皇又一次召集御前会议。尽管东条英机等主战派仍坚持己见，天皇仍宣布了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并向反法西斯同盟国发出最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报稿。电文如下：

“日本政府荣幸地就美国、大不列颠、苏联和中国4国政府8月11日对日本政府8月10日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的照会的复照，通知4国政府如下：

“天皇陛下已下诏，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条款。

“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签署为实施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所必须的各条款。天皇陛下还准备对日本陆、海、空及其所属不管驻何处之所有的部队发布命令，停止战斗行动，放下武器，并发布盟军最高司令部认为在执行上述条款中有必要发布的其他命令。”

8月15日中午，整个世界都从广播中听到了日本天皇亲自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正式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至此，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向世界人民无条件投降了。

随着太阳旗在太平洋垂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束。

对于日本投降过程中原子弹所起的作用，至今争论不已。历史唯物主义者当然是反对唯武器论的，但是同时也不否定武器在战争进程中的重要作

用。我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应当是包括中国战场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通力合作，浴血奋战的结果；武器的因素是第二位的——这，实际也承认了原子弹的确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

杜鲁门决定投掷原子弹，从中国古代谋略来讲，实际就是对“造势夺声”的运用。“造势夺声”语出《孙子·势篇》。其云：“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圆，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其大意是说，善于战胜对方的优秀指挥员，在于造成一种排山倒海的势态，借此来摧毁敌人的士气，攻破敌人的心理防线。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取得跳岛作战胜利后，1945年6月已逼近日本本土，准备登陆作战。他们同英军为此集结在太平洋的军队达200万人，飞机1万多架，军舰1000多艘，气势逼人。与此同时，中国战场也取得决定性

的胜利，苏联红军的正式参战也正在积极筹划中。日本帝国主义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斗争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两颗威力强大的原子弹在日本本土的连续爆炸，便将日本国内的普遍惊恐推向极至。加上尔后苏联百万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率下分四路突入东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波澜壮阔的胜利大反攻，一种日本不投降即必遭亡国灭种之灾的强大声势便由此造成了。日本的投降，正是在这种巨大声势压力下的无可奈何的唯一选择。美国原子弹的威慑，无疑当属于这种强大声势中的重要部分，或者说至少为这种强大声势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如果美国不投原子弹，日本的投降也是被注定了的。但是，在时间上却可能要晚些，美军将会付出多大的伤亡。也不得而知。如前所述，杜鲁门之所以投掷原子弹，还有一个打算，即做脸色给苏联看，让后者瞧瞧美国有多厉害，并以此来贬低苏联参战的意义（尽管未能阻止住苏联参战），加强美国在战后远东地区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后来所说：原子弹与其说是针对日本，不如说是为了“使俄国在欧洲易于驾驭”；“炸弹扔在日本，正是为了在俄国收到效果。”而1945年7月24日当斯大林被告知美国已拥有一种具有空前杀伤力的新式武器后，表面上神情冷静，其实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苏联当然不能输给杜鲁门与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尔后，他迅即召集了五个第一流的苏联科学家，命令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研制出苏联自己的原子弹（终在1949年爆炸成功）。美国对日本及苏联进行的这种核讹诈，明显收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1945年美国对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行动，在国际外交史上开启了用核武器进行恐吓、威慑的先例。由此不可避免地掀动起世界工业化国家的核军备竞赛的狂潮，成为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一项主要内容。即至今天，在国际关系交往中，人们还不得不把拥有核武器当作国力军威强大的一种象征，当作一份十分重要的政治筹码和外交筹码。而历史于此的最初体验或经验，则是美国人给的，是杜鲁门给的。

举独立之旗 走自己的路

1946年夏，当南共联盟总书记前去莫斯科拜谒斯大林时，斯大林曾热情洋溢地将铁托拦腰举起来，并亲切地祝他“保重身体”，接着便是通宵达旦的兄弟般的豪欢。可是1948年，斯大林却突然命令将南共

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铁托也因此被打成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修正主义头子……

1892年5月7日比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出生于克罗地亚西北部的山村里。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作为普通士兵，第二次作为最高统帅，两次都曾在战场上负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南共总书记和最高统帅，率领着游击队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孤军奋战，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拥有80万大军的使德国侵略者闻风丧胆的铁军。

铁托是南斯拉夫第一代共产党人。作为革命家，他是苏联共产党一手培养出来的，在苏共面前是学生，是小弟弟。但是这丝毫不妨碍铁托进行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

1944年9月，南斯拉夫解放前夕，斯大林在莫斯科召见铁托。他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才使会见进入正题。“铁托同志，你们是否考虑过让国王彼得二世回去的事？让他复位是十分必要的。”斯大林一口口地吐着烟圈说。

铁托却闻言色变，不禁脱口而出：“这绝不可能，人民会造反，因为这国王是卖国的化身，在最艰难的时刻，他扔下人民逃跑了。”

会场的空气一时凝结起来。斯大林没有理睬铁托，仍然自顾自地说道：“你不必让他永远在位。暂时把他先接回去，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悄悄地给他背上捅一刀。”

会谈没有结果。晚上铁托下榻于斯大林的别墅。铁托夜不能寐，在月光下散步。他想起了两个月前的一幕：那是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维多利亚王后的别墅里，丘吉尔也是这样向他提出让彼得二世复位问题的。只是丘吉尔提问的方式是那样迂回而巧妙，简直使人无法说出个“不”字。但是铁托还是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两个月之后，斯大林却用不容置喙的口气提出同样的要求。铁托满腹狐疑。

据说在此之前，丘吉尔与斯大林曾在莫斯科就巴尔干半岛如何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的问题有过一次会谈……铁托当时获悉。不禁拍案而起：“我们自己要百分之百，一点都不给他们！”

最终，9月的莫斯科会见，铁托没有答应斯大林的要求，只是应允让王国政府总理舒巴奇等3人进入即将成立的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斯大林于是耿耿于怀，双方不欢而散。

铁托返回南斯拉夫后，苏军便于9月28日发动了贝尔格莱德战役，以配合南斯拉夫人民军解放南斯拉夫。但是苏军在南斯拉夫却不断违法乱纪，影响极坏。一起最为恶劣的事件是贝尔格莱德战役期间，南人民军一名女通讯员前往苏军前线送信，竟被一名苏军上尉在战壕里砍伤后强奸。

事发之后，南共婉转地提请苏方注意这些损害红军声誉的行为时，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理夫将军却提出抗议说这是诽谤。

1948年2月，斯大林突然要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两国领导人去莫斯科会谈巴尔干问题。铁托预料亲自前往必然凶多吉少，便借故推辞，只派副手卡德尔前往。果然，在会谈中斯大林指责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上不同苏联“磋商”，实际上是不听苏联调遣。卡德尔一次次地解释都被斯大林打断：“你们的问题不是错误，而是你们正在执行一条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路线！”

次日，斯大林通知南斯拉夫代表，南斯拉夫必须养成在外交上与苏联磋商的习惯，擅自行动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同时责令南斯拉夫代表以政府名义

签署一项务必就外交问题同苏联政府“磋商”的协定……

铁托深知局势的严重。3月1日，他召开高层的中央会议，摆明南苏冲突的原因和现状，商议对策。大多数人支持铁托，决心顶住压力。却不料中央内部的亲苏分子将会议内容偷偷泄露给苏联。斯大林没想到铁托竟敢公然与他对抗，非常生气，未出几天，苏联就宣布撤走所有军事和经济顾问专家，并公开指责南斯拉夫对苏联“不友好”。

4月初的一天，铁托正在萨格勒布郊区绿树丛中的别墅里休息，苏联大使求见。他带来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代表联共（布）中央于3月27日致南共的信件。信的语调是极其粗鲁与命令式的，信中不仅指责南共背叛马列主义，已不是马列主义政党，而且在末尾竟有这样的话：“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足为一个教训。”铁托当然很清楚斯大林这种提示意味着什么。苏联大使在一旁冷眼观察，傲慢地问道：“何时作答？”铁托努力控制着自己，镇静地回答：“我们将讨论这封信，然后作答。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再见吧。”整个会见过程仅三分钟。

4月12日至13日，铁托主持南共中央全会，讨论并通过了由铁托起草的致联共（布）中央的复信。信长达33页，信中表示，新南斯拉夫领导人正不可抗拒地走向社会主义，但根据本国情况必须走一条“略微”不同于苏联的道路。这把斯大林气得暴跳如雷。

1972年5月12日，铁托在与贝尔格莱德电台电视台记者谈话时回忆了这些往事——

问：据我所记得，苏联大使是在萨格勒布向您递交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的。

答：是的。

问：这件事给您留下的印象如何？

答：噢，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我在那里的一座别墅里接见他。我站在桌后，靠着桌子，读这封长信。我感到很不好受，我极其愤慨，火冒三丈。随后，我坐了下来，但没有让他坐下。我只是用俄语对他说道：“我们将研究并作出答复。完了。再见。”他转身就走了。

我立即坐在桌旁，一口气写成了那封很长的复信。我回到了贝尔格莱德，在旧王宫里，我和同志们讨论了这封复信，而在场的有茹约维奇以及多少有些动摇的其他一些人。

问：您那时对斯大林说“不行”。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回答。铁托同志，今天当您回顾这些事件时，是否可以说。在战前年代共产国际对待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态度所出现的种种情况中就已经存在着误解和同斯大林政策冲突的苗头了？

答：不。我不想说是这样。因为斯大林对我是很不错的。可以这样说，他是想用某种方式把我套住……

但是，事隔不久，四八年交换信件之后，我闻悉，斯大林在一位美国人面前说道：他不喜欢我那种固执己见的态度。

问：是什么时候您第一次感觉到存在着某种不信任或误解？

答：是在四七年，当时他们开始指责我们对他们在这里的专家抱敌视态度。因此，我看出这有点与那个故事相类似：狼责备羊羔，说它把水搅浑了，尽管羊羔是在狼后面喝水的。那时我就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头。

1948年6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公开发表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反苏，

宣布将它开除，并公开号召南共内部的“健康力量”推翻铁托。于是，苏联阵营内各国纷纷抨击铁托是“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头子”、“帝国主义的间谍”……在国内，不知内情的老百姓更吃惊不小，茫然不知所措。

这时，铁托和南共又作出了一项大出斯大林意外的决定：将事实公开，让人民自己来决定谁是谁非，何去何从。6月30日，国内最大报纸——南共机关报《战斗报》全文刊载了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答复。50万份报纸被抢购一空。7月21至28日，南共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2344名代表出席，铁托作了长达九小时的报告，大会一致表示拒绝苏联压力，坚决支持铁托。

铁托深知局势险恶而先发制人，迅速逮捕和清洗了党内、政府内的亲苏分子，以防内部有变。苏联于是再召开情报局会议，宣布“南共已掌握在凶手和特务手中”，称铁托为“匪帮”，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公敌。与此相应，在南斯拉夫与几个苏联盟国的边界上，军事摩擦次数大幅度上升，此后几年每年都在千余起左右。而铁托也不甘示弱，频频在国内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铁托向全体将士宣布：“我们决不出卖国家前途！真理终将取胜！”次年，苏军又有几个师向南斯拉夫边界移动，气氛空前紧张，全世界都在为这个小国家担心。铁托却稳如泰山，安排停当后就去避暑地休养了。苏军见状倒也未敢妄动，战争的空气缓和了一些。

苏南关系破裂后，作为走着与众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独行者，铁托和他的南斯拉夫并不感到孤独。东方不亮西方亮，铁托说：“地球还在转动”。他于是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开始发起不结盟运动，以求得所有不承担条约义务的国家的支 持。50年代中期他开始四处出访，至1968年，他已访问了近40个国家。1961年，第一次不结盟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时，已有23个国家参加，而苏联却特意在开幕当天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苏联的威胁未能奏效，3年以后不结盟会议在开罗举行时，其成员国已达47个。不结盟运动大大提高了南斯拉夫和铁托本人在国际社会的威望，也是对苏联霸权的成功挑战。

与此同时，铁托也积极寻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友好相处与正常交往，对于来自美国的援助，也是来者不拒。铁托凭着几十年的国际斗争经验，深谙大国之间的制衡关系。因此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早就为自己留着后路。同苏联公开决裂前，便已在为自己国家的后路作考虑，并有行动。苏南冲突一经公开化，杜鲁门乘隙间入，急急将1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送到铁托手上，铁托也就大方地收了。这样，苏联的封锁便显得软弱无力了。至1959年，铁托获得的西方援助已达24亿美元。但铁托却始终没有丢掉社会主义的原则。

铁托是1980年去世的。在铁托生前，有记者问他：倘能再获得一次生命，是否另有打算？铁托回答：“我将走同样的路。也许我会把一些事做得更好。”

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所走的道路，是一条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发展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当然并不平坦，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与苏联的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是不喜欢铁托们走这样的路的。但是，铁托却终于力排众议，顶住各种罪名和干扰，披荆斩棘地走过来了。其间独立自主是铁托道路的精髓，是铁托得以在东西方阵营间、在大国间成功地搞平衡、走钢丝所依赖的法宝。正是本着独立自主地发展国家的目的，所以，在国际交往中，铁托从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他的远交近攻、纵横捭阖、一切力我所用的实事求是路

线，使他生前的南斯拉夫实现了立国以来的最大繁荣与昌盛。

铁托的独立自主精神，使苏联愤恨之余，也无可奈何。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赴南斯拉夫，向南共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两国关系开始改善。以后，赫鲁晓夫内外政策的改革，实际大体上是铁托已走过的路。

紫石英肇祸 艾德礼屈兵

1949年暮春时节，在远东发生的一起中英交火事件，曾在英国国会内闹得沸沸扬扬。可是百余天后，却不了了之，中英双方也没因此事而生隙。

英方甚至轻描淡写说：那不是一次交战，只是一个偶然事件。那么，这究竟是一次什么事件呢：其间有何奥妙呢？

“紫石英”号是一艘英国护卫舰，归英国海军远东舰队统辖。1949年4月20日晨，“紫石英”号舰奉英远东舰队司令部的命令，由长江口溯江上驶，准备到南京接替正在该城担任“护侨”任务的英舰“伴侣”号。其时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主力损失殆尽，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正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下，沿西起鄱阳湖口东至江阴要塞的千里长江北岸，积极准备于次日渡江作战。

上午9时，“紫石英”号航行至镇江附近要津三江莹解放军渡江部队炮兵三团阵地前。我炮兵予以示警性炮击。“紫石英”号舰非但不迅速撤离，反而自恃舰快炮利，发炮对射。双方在三江莹附近江面展开激烈炮战。“紫石英”舰终究势孤，难挡解放军优势岸基炮兵准确的排炮射击，先后中弹30余发，失去航行能力，被迫挂出白旗免战，搁浅于我炮兵阵地西南约700米处。

驻泊南京的英舰“伴侣”号闻讯后，即由南京下驶驰援。英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也亲率远东舰队旗舰“伦敦”号及其僚舰“黑天鹅”号等2舰由长江口上驶接应。当日下午1时30分、率先赶到三江莹江面的英舰“伴侣”号，也与我炮兵交火。该舰先中5弹，见情势危急，便全速下驶脱离火网，然后又掉头沿江北岸上驶，利用我炮兵阵地死角突袭，击毁我七连野炮两门。当其继续上驶时，却陷入我一连榴弹炮的迎头痛击，只得带伤溃逃。

梅登海军中将闻报“伴侣”号舰亦为解放军炮兵击伤后，急率“伦敦”号和“黑天鹅”号2舰全速上驶救应。4月21日晨，英2舰通过江阴附近江面，又与解放军江防炮兵遭遇。解放军再次发挥岸基排炮准确射击的威力，连续命中“伦敦”号及其僚舰“黑天鹅”号。梅登海军中将遂急令各舰与解放军炮兵脱离接触，仓皇撤往上海驻泊地。双方炮战告终。

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根据英国海军当局的情报，初步报道了英国海军的伤亡：“紫石英”号死亡17人，重伤20人，60人泅水登岸；“伴侣”号带回死者10人，伤者12人，前炮两门被击毁；“伦敦”号已将死者15人和伤者13人载抵上海；“黑天鹅”号7人负伤。而当时尚在南京的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称英四舰海军人员伤亡为100余人。此外，英舰“紫石英”号负伤搁浅于镇江附近江面后，未能随其舰队主力撤离，实际处在解放军江防炮兵炮火控制区内。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总计伤亡252人，并损失装备若干。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紫石英号事件”。英方则称之为“英舰长江事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之际，四艘英国军舰竟连续同待命渡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种难以想象但竟突然出现的武装冲突，引起世界舆论的严重关注并成为当时国际新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焦点。在英国

更引起了公众对政府的强烈批评和质问，反对党和执政党更是舌剑唇枪，争论不休。

英国官方对“英舰长江事件”的反应是很复杂的。最初只是公布了“紫石英”号被“敌对”的炮火击伤，甚至连炮弹来自长江的哪一边也未指明。4月21日，英国驻南京大使否认他已向北平中国共产党当局提出抗议，只说“沿江部队未接获所期望的命令以停止对这些英舰的炮击。”到了4月26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发表声明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开进长江执行和平使命”。国防大臣亚历山大也说：英舰留在南京有利于供应、无线电通讯和护侨等。前首相丘吉尔则要求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报复”。

“紫石英号”事件的发生以及艾德礼，丘吉尔的讲话，在英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英国国会议员、海军中将泰勒5月5日在下院辩论“长江事件”的一段讲话中说：“你不能走到那些已经摆脱腐朽和帝国主义枷锁而正在奋勇前进的人民面前说：‘……我们将派遣一个使者与你们建立联系，他将会通知你，我们要你们做什么。’”

英国下院关于“长江事件”的辩论非常激烈。很多有影响的议员对4月26日首相艾德礼的声明进行了反驳；对丘吉尔要求派航空母舰“实行报复”的狂言以及亚历山大的狡辩，展开了争辩。

反对党领袖麦克米伦指出：英军舰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已为1943年的条约所废除，至于“国民政府”的同意——那个即将放弃南京且随即迁往广州的政府曾经警告我们说，“往后实行那项承诺是困难的。”

议员们批评政府不该把军舰留在长江。罗伯兹议员指出，英政府在几个月前“曾经送给国民党好些军舰，这些军舰无疑地要被用于内战。”他追溯到历史背景说，“一百多年来英国军舰都常常卷入中国事件中，英国军舰在中国的领水内向中国人开战，到处引起中国人的愤恨。”因此罗伯兹认为，“在强渡长江的巨大军事行动以前几小时，英国政府批准两艘军舰在长江内上行下驶”，“显然是容易激起待命渡江的共军的愤怒的”。

一些议员驳斥派遣航空母舰为无稽之谈。维也特议员说，“空中掩护也是荒谬的，这种办法今天已行不通了。”“过去由于中国缺乏团结，而我们又有武器上的优势，所以一艘炮舰就能在不小的地区内把中国人吓得手足无措了。但现在可不能再这样做了。”麦克米伦概括地说，现在看来，“炮舰观念”似乎是太过时了。

盖莱奇议员对英国报刊电台把“长江事件”归咎于共产党的炮手表示异议，他向国会提出质问说：“假若一艘亲希特勒国家的战舰，在预定进攻日那一天（指诺曼底登陆）驶入英吉利海峡，我们难道不应该把它打得粉碎吗？”

下院的辩论远远超出了“长江事件”而广泛地涉及到英国的对华政策。由于议员党派背景的不同，观点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对英舰当时并无必要冒介入中国内战之险而沿长江航行的问题，多数的意见是批评政府缺乏远见。鉴此，艾德礼首相遂排除了武力报复对策，积极寻求与中共方面和平谈判，政治解决冲突，以摆脱“紫石英”号舰负伤搁浅于人民解放军炮口下的窘境。

4月23日，英国驻南京大使首先派三等秘书尤德（按：即后来的香港总督）来浦口，试图同我军接触洽商救助“紫石英”号事宜。由于浦口不是我

军主攻方向，没有最高指挥机关，尤德未能找到我方有权受理此事的人员。

“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即将事件急电报告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4月24日，中央军委指出，炮击英舰事件已震动世界，指令有关部队迅速查明“紫石英”舰现状（当时只有该舰还留在长江），并报告各部队与英舰作战的详情。炮三团奉命南渡，准备参与处理有关“紫石英”舰问题。

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发表声明，斥责了艾德礼首相及丘吉尔前首相的谬论及狂言。李涛将军申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道歉和赔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并愿意考虑同各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但前提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

5月上旬，毛泽东、周恩来等电告邓小平，决定不扩大事态，争取就地政治解决争端。5月18日，炮三团政委康矛召被镇江前线司令部袁仲贤将军指派为谈判代表，并致函“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少校：“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对于英国海军军舰于4月20日侵犯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之暴行及其所应负的责任，决定经由谈判解决”，并要求对方指派相应代表举行谈判。这就是后来说的“百日谈判”。

“百日谈判”期间，中英代表就善后问题前后举行了10余次谈判，其中伴随大量的信函文件往来。中方立场概括为二点：1. 英方承认错误，向人民解放军道歉；2. 赔偿解放军与平民所受损失；3. 待英方认错、道歉并赔偿损失后，中英再讨论“紫石英”号舰撤离长江问题。英方最初只谈请允英舰撤离问题，并反复强调中英间冲突是“偶然事件”，避而不谈责任等问题。后经反复谈判，英远东舰队司令官布朗特海军上将于7月27日以备忘录形式向中方表示：1. 请允“紫石英”号安全下驶长江出海；2. 承认“紫石英”号未得人民解放军允许进入前线地带，是“招致误会的基本因素”；3. 英舰“紫石英”号撤离后，双方可继续就整个事件的善后事宜举行调查、谈判。布朗特备忘录是近代百年中英关系史上，一个英国将军在中英冲突中第一次向中国方面认错。其立场也接近中方要求。仅此而论，它表明中英百日谈判已有进展。

不过，英方对善后问题始终作两手准备，在与解放军代表谈判之际，又伺机令“紫石英”号逃脱解放军的监视，摆脱被动挨打的处境。7月30日晚9时，长江涨水。“紫石英”号趁此强傍一艘正下行的中国客轮“江陵解放”号，得以在双方交火中逃出长江口。“江陵解放”号则不幸被炮火误中沉没。

在此之前，总前委转中央军委指示，称在此案中，我方在政治、军事上都处在主动地位，国际舆论也对我有利，英方虽狡赖拖延无己，我方不必与之长期纠缠，如“紫石英”号逃走，我沿江部队可不予拦截，而在事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这一命令只限沿江各高级指挥员知悉。而“紫石英”号在停泊期间则从南京获得英国海军所贮油料60吨的补充。这也证明我方有意听其驶离。倘不能获得该项油料，“紫石英”号是驶不出长江的。

总前委在传达中央军委“可不予拦截”指示后，我方又获悉英国派遣驱逐舰在长江口活动，有伺机潜入长江劫走“紫石英”号或配合“紫石英”号逃走之势。于是，中央军委即指出，我方不能在英方的武力威胁下让“紫石英”号逃走。总前委亦重申：如英国舰队溯江接应“紫石英”舰，或“紫石

英”舰擅自逃走，定予坚决打击。但该命令又要求各部队在打击“紫石英”舰时，“也不要以击沉为目的”，“如英舰受伤停驶，我方即可停火，命其驶回原停泊处，以便继续谈判”。

“紫石英”号逃跑后，中英百日谈判也便不了了之。

“紫石英”号事件之所以形成上述结局，从英方来看，首相艾德礼一是慑于国内批评英国对华政策的舆论高涨，而且“紫石英”号进入国、共两军交战区内，本身已是理亏；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已失去战前“日不落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正需要时间来继续恢复经济、拓展外贸，而维持其在中国的巨大投资、航运和外贸利益，维持其在香港的地位，则是其经济政策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在中国新旧政权更替之际，英不愿因“紫石英”号事件与中共交恶加剧，从而导致以后完全丧失在华经济利益；三是已看到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认识到已不能再像1840年那样用炮舰来强闯中国国门。所以，艾德礼便将此事作低调处理，除了反复强调该事件是一场误会而非蓄意外，更摒弃了丘吉尔等的武力政策，以避免事态扩大，并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艾德礼的策略是自知理屈，力弱而退避三舍，以求保住英国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的在华利益。

从我方来看，一则人民解放战争还在进行，须集中力量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二则新中国百废待兴，要求取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少树敌国；三则英国已通过不同途径向中共方面表示愿与新中国保持适度的经济政治关系，因而中共对“紫石英”号事件的处理，采取的是义不容曲（声明我方还击的正义性，驳斥艾德礼、丘吉尔等的悖论）和适可而止的策略，对整个事件的处理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从而缓和并解决了一场原本可以加剧的危机。

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最高领导层与艾德礼的英国政府当时实际都在着眼于中、英双方关系的未来，共同以冷静的头脑处理“紫石英”号事件。半年后，即1950年1月6日，艾德礼政府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因此评论说：“紫石英号事件没有恶化中英关系，其纯粹影响是加快、而不是推迟了英承认中共新政权的步伐。”

投石以问路 持重而待机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政府作鸟兽散，总统府和行政院逃往广州，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可是在此前后，美国民主党新政府国务卿艾奇逊数日间竟连续3次致电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他留驻南京而不随“法定接受国”政府迁移“临时新都”。当时杜鲁门就任美国第33届总统仅3个月，何以在立脚未稳的情况下，置其他两党（州权民主党、共和党。其与民主党在国会形成三党鼎立局面）可能出现的借机攻击于不顾而出此“下策”？这一外交举措，当即在国际间以及中国各方引起了连锁反应……

早在南京解放之前，中国共产党便与美国一些驻华官员，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接触。1948年11月，中共沈阳市市长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伍德开始接触，双方均表示愿相互间更密切联系。美认为这些接触令人鼓舞。以后，双方接触地点移到北平。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北平市长叶剑英、负责工商事务的姚依林，均会晤过美驻北平总领事克拉布，讨论中美政治经济关系前景。人民解放军渡江前一个月，艾奇逊曾指示司徒雷登设法接近中共领导人。所以，美国务院在4月底指示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是有用意的。美国务院认为，司徒雷登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各方面领导人，他的燕大学生，约有半数在中共方面出任各级要职，一旦与中共接触，就会处在老师对学生的有利地位。美国政府令司徒雷登留驻南京显然为中美之间建立较高规格的外交接触不露形迹地留下了一张隐牌。司徒本人也表示愿意“长期留下，以观察共产党的意图”，并向中共提供一个“商讨与美国关系的机会”。

当时，毛泽东在琢磨着司徒雷登留南京的意义所在。4月28日，毛泽东在给总前委和华东野战军负责人的电报中，提及美国方面托人请求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何以会对美国对华新动向予以高度注视呢？原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日近尾声，工作重心开始移向城市和经济领域。扫荡国民党残余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以便为工业化作准备，成为我党面临的两大任务。为此，毛泽东、周恩来等都考虑到能否使美国原来的对华政策转移到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性的人民政权这边来，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有利于两大任务的胜利完成。因此，毛泽东等提出我党对美外交的主要任务是：第一，促使美国全面停止援蒋，防止美国直接卷入中国内战。毛泽东在公开声明和讲话中，一直把“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撤退“在中国的武装力量”作为外国政府主要是美、英政府与新中国建交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其他渠道，向美表示了这一政策意向。第二，争取尽快恢复中美间正常的经济关系，包括恢复中美贸易和中日贸易。姚依林、陈毅、黄华、乔冠华等人在与美国官员的谈话中已指出这点。南京会谈前夕，黄华就受命不要拒绝美国方面修改商约的要求。第三，如有可能，不放弃与美建交的机会。在早，1949年3月，我党的基本立场是“不急于谋求”美国的承认，其基本前提是，认为“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新中国。但4月间司徒雷登留南京及美通过其他途径与我党接触的信息，毛泽东认为是美国方面递过来的橄榄枝。这时，毛

泽东认为中美之间有可能建立罗斯福、史迪威时期我党与美国之间曾存在过的关系。在4月28日发给总前委和有关方面的电报中，毛泽东通告可以考虑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天后，毛泽东又借谴责英国军舰暴行之机，阐述了新中国与外国建交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是公开表明愿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可以说，这一时期我党对与美建立外交关系作了两手准备。为实现这些对美外交目标，对南京会谈我们采取了积极态度。与之相配合，党在宣传中也减少了对美侵华政策的抨击。4月21日发表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还把美蒋联系在一起加以抨击，仅隔几天，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就改变了这一提法，并专章强调保护外国侨民利益。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又以“外国帝国主义”一词替代美帝国主义一词。

此外，4月底，中共中央将黄华由北平调往南京，任命为中共驻南京外事处主任。黄华不仅是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学生，还是他的中文秘书傅泾波的同班同学。

不同的是，1949年美国则主要是从其全球战略来规定其对华政策。随着蒋介石政权崩溃在即，美国已认识到扶蒋途穷，准备与之脱离干系。在艾奇逊主持下，美对1948年援华法案所拨款项下的剩余援蒋军援物资，奉行“拖延启运”政策，并决定不再向蒋政权提供新的军援。凡此种种，说明美国接受我党关于美国停止援蒋等条件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中国共产党所需求的正是美国正在逐步推行的灵活政策。

在制订对我党政策时，美国政界念念不忘分析我党与苏联关系性质。美认为，中苏之间存在“天然矛盾”，随着时间推移和苏联对中国的“野心”日益显露，中苏必然要分道扬镳。美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防止中苏在亚洲结成以美国为敌手的同盟，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41号文件的描述。就是“防止苏联力战略目的统治中国”。为此，美必须建立影响中共政策的着力点，尽量不刺激中共“亲苏仇美”，以求有朝一日利用中苏“天然矛盾”，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还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美国国务院就指示驻华美国外交官员要尽力维持在中国的外文存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41号文件则特别强调经济手段对中共政策趋向可以产生魔力般的影响。从纯经济观点看，美国在华拥有巨大商业利益；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更对中国市场有某种依赖关系：美国商人渴望开拓潜在的中国市场。也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美国政府在1949年2月制订的有关对华贸易政策的NSC/41号文件，规定允许恢复中美、中日间正常的贸易关系，促使中共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和西方。美不在经济领域与中共为难，不以搞垮中共政权力目标。

综而观之，中美双方在1949年所追求的政策目标有许多接近点。在是否停止援蒋和恢复中美经济关系等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不言而喻。在承认问题上，双方都提出了条件和反条件，都不急于寻求建交，但也都不愿意关死承认和建交的大门，这就为南京会谈提供了政治基础，为通过会谈在双方建立某种“不亲密却正常”的“工作关系”提供了机会。

当时毛泽东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大致都认识到并抓住了双方可以接触的共同点、双方都愿意交往的契机。于是，便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外交接触：南京司徒雷登——黄华会谈，这实际是“大使级别”的会谈。

南京解放不到两周，傅泾波以老同学名义，主动给黄华打去电话，沟通

了联系。次日，傅泾波应邀访问黄华，并返邀黄拜访“老校长”司徒雷登，南京会谈的帷幕就是由这两位老同学互攀私人关系拉开的。5月13日、6月6日、6月28日，黄华与司徒雷登3次会谈，这还不包括黄华与傅泾波之间的多次会晤。在这些互访中，双方就美国是否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停止援蒋问题。中美间承认问题、恢复中美和中日贸易问题及其他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司徒雷登向黄华说明，美已在政治和军事等方面从援蒋立场后退，有些还在进行的援助，已超出美国政府控制能力之外，并告美国大使馆将不随国民党残余政权去台湾。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实际是使美蒋外交关系在事实上降格，司徒雷登的上述说明，明显是对中共对美外交的第一任务（就美国而言是第一条件）的间接回答。关于外交承认问题，他解释道，美国的基本政策是不急于承认中共新政权，由中共走第一步。不过，美并未关死承认新中国之门。艾奇逊规定了有条件承认新中国的方针，这些条件是：1.新政权控制着大部分领土和国家机构；2.有能力并愿意承担国际义务，维持公共秩序；3.其统治为其人民所默认。还提出美不把“承认”作为政治武器“扣住不给”。司徒雷登还说美国相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共处，美不关心中国政府的形式，一旦新政府成立，美将依据上述条件决定是否承认新政权。与此相应，美海军也在南京会谈期间撤出了青岛和长江口；而在我党方面，当美提出我们的反美宣传问题时，即表示一俟双方建交，这些问题会很快解决。美也注意到南京会谈期间，我们的报刊杂志，减少了对美国的批评和抨击。鉴于以上情况，美方认为会谈气氛是友好的，这可从司徒雷登发回华盛顿的电报得到反映。

到6月下旬，南京会谈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起因是傅泾波与黄华会谈时，暗示司徒雷登照旧例要到燕京大学过生日。黄当时未予答复。几天以后也即6月28日，黄华邀司徒雷登以燕大校长身份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北平。并表示此行可望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关方面并告知，若北平之行实现，中美之间的许多外交难题可望迎刃而解。

球，就这样由毛泽东、周恩来踢到了美国一边。若司徒雷登能够接受邀请，完成北平之行，其政治意义与外交意义将是具有轰动效应的，而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美国一方都是十分清楚的。毛泽东，周恩来着实将了美国一军。

再说黄华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一事传到华盛顿，立时引起大哗。国务院政策设计室、驻华各使、领馆主要官员纷纷就此发表意见，大体形成了或接受黄华邀请，或暂时予以拒绝的对立两派。而此时共和党人早已对民主党政府与蒋政权脱离于系的政策不甚满意。6月24日和7月1日，一些国会议员两次联名致信美国政府，反对美国承认新中国，在中美间未就重大分歧点达成谅解前，司徒雷登北行必定要冒极大风险。更何况美还想凭借其经济优势作杠杆，诱使我党让步；或组织西方国家“共同阵线”，集体施压，迫使我党接受美国条件，因而担心司徒雷登北行可能削弱美与我党讨价还价的砝码。最后，由总统杜鲁门拍板定案，拒绝了我党邀请。华盛顿时间7月1日，艾奇逊接杜鲁门指示，通知司徒雷登“在现时不要去北平”。南京会谈也由此搁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外交接触就结束了。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其结局，毛泽东、周恩来等与美国方面实际也是有所估计的。

要推动中美南京会谈达成协议，其一个重大困难就是双方互不信任。对于美国援蒋打内战的历史，中国人民是记忆犹新的；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不会很快平等对待新中国的论点，也主要依据对“四十年和二十八年帝国主义侵华史的总结”。美蒋继续勾结，颠覆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在当时也使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警惕，甚至作了对抗美国武装干涉的军事部署。美国则更多从反苏反共立场看问题，最不放心中苏意识形态一致的事实，担心中国共产党啃美国“馅饼”却在政治上支持苏联。司徒雷登多次表示，美国只关心中国对外政策，也就是如何对待美苏的政策。南京会谈时，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的政策意图。司徒雷登称美国的立场是“等一等，看一看”；而黄华则是“少说多听”。杜鲁门要求国务院在与我党交往时，要“听其言，观其行”。无独有偶，周恩来在判断司徒雷登的外交活动性质时，也使用了同样的语言形式。

美国政府拒绝中国共产党邀请看起来失去了中美之间尽早和解的机会，实则是承认一个事实，即中美关系只可以逐步改善，不可能戏剧性地一蹴而就。当然，美国出尔反尔，先要求司徒雷登接近中共，后又拒绝邀请，也证实了我党的基本观点：美国不会很快改变对新中国的敌视立场。这无疑使我们的对美政策趋向强硬。司徒雷登与陈铭枢举行了令他期望、最后又失望的会谈后，也快快启程回国。南京会谈也如昙花一现，无果而终。

1949年春夏之间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南京会谈，实际都采用了“投石问路”的谋略。当时双方都有接触并搞好关系的愿望，又都希望对方能放弃既有立场来屈从自己。但对方对此的态度如何，能否如愿以偿，双方都难以摸底，于是便有了司徒雷登和黄华的“大使级”接触。这如同过河一样，不知“桃花潭水”深几许，便投以卵石，以试深浅。最后摸清双方都不可能放弃根本原则，于是分道扬镳。

在中国共产党这方面，毛泽东、周恩来是善于抓住和利用一切机会，来为我党当时面临的两大任务服务。因之对杜勒斯传递过来的接触信号，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但是，他们未作“单相思”，而是充分估计到应有的困难，作好了最终失败的准备。在美方拒绝邀请后，毅然割席而去，不作强求，以待他时。因为“强扭的瓜不甜”。这谋略就是“条件不利，持重待机”。

板门店停战谈判 三八线划疆南北

1950年6月25日拂晓，由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南朝鲜李承晚政权的军队越过三八线，悍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起进攻，震撼世界的朝鲜战争爆发了。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并肩战斗，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把侵略者赶回到三八线，迫使美国坐到会议桌旁，谈判停战问题。

那么，何谓三八线呢？原来1945年8月10日日本提出无条件投降后，美国急于控制从1910年起就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这个亚洲战略要地，但此时美国军队还远在冲绳岛，鞭长莫及；而苏军已经逼近朝鲜半岛。美国联合参谋总部急令陆军部在10日这天拿出一项阻止苏军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方案。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如果和苏联争速度，派军队去抢地盘，肯定要落在苏联后面。不如在朝鲜划一条界线阻止苏军到朝鲜南部接受日本投降，对美国来说，这条线当然越靠北越好。但又必须使之能为苏联所接受，经过一番斟酌，最后确定以北纬38°线为分界线。早在1896年和1904年，当日本和沙俄企图在朝鲜划分势力范围时就曾提出过这一条界线，但终因日俄双方矛盾尖锐而未能实现。

三八线方案呈交杜鲁门总统后，他马上批准。8月15日杜鲁门给斯大林发去绝密信，征求斯大林对38度线为受降分界线的意见。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同意。这样，没经过任何国际会议的确认，三八线就由美苏两国领导人定了下来。它规定三八线以北的日军向苏联投降，三八线以南的日军向美军投降。实际上，苏联红军在8月10日进入朝鲜后，已经推进到汉城以南地区，远远超过了三八线。美军直到9月8日才在仁川登陆。苏美达成协议后，苏军履行诺言，退到三八线以北。美苏两国以三八线为界分别控制了朝鲜南北。战后，美国企图扶植傀儡政权来控制全朝鲜，自然遭到了苏联抵制。于是美国政府转而采取分裂政策，在南朝鲜扶植李承晚政权。而朝鲜北部则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共和国。于是三八线无形中又成为朝鲜南北政权的分界线。

再说1951年6月，在中朝军队的打击下，美国人不得不与中朝两国坐到谈判桌前。双方商定，于1951年7月10日——15日在三八线上的开城谈判。7月5日，金日成在他的指挥部接见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及助手乔冠华，商议了谈判的一些具体事宜。

中朝谈判代表团由4人组成（后增至5人），首席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还有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相朝少将。金昌满少将（化名张春山）以上校名义为首席联络官，金一波和中国的柴军武（即柴成文）为中校联络官。中朝方谈判的真正领导是毛泽东、金日成、周恩来。李克农、乔冠华通过密码电报每天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同时朝方也每天向金日成等领导汇报，接受指示，用以指导谈判。

美韩谈判代表由5人组成，首席代表为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官、海军中将特纳·乔埃，其他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海军少将奥尔林·勃克，

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亨利·霍治，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官、空军少将劳伦斯·克雷奇，南朝鲜第一军军团长白善焯少将。同时，他们指派了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海军陆战队上校詹姆斯·穆莱和南朝鲜李树荣中校为联络官。

正式谈判的第一次代表团会议，于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时在开城来风庄举行。

正式会谈开始后，对方5名代表，乔埃居中，右手是白善焯与霍治，左手是克雷奇和勃克。中朝方中间是南日，右手坐着邓华和解方，左手是李相朝和张春山。双方代表背后，各坐着人数大体相当的参谋、翻译和记录人员。乔埃抢先开口说：

“我们双方代表都是军人，希望说话能像子弹出膛一样，直率迅速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尔后，他在论述了一番谈判的重要性之后，强调说：“联合国军代表只拥有讨论在朝鲜的军事事项的权限，没有资格谈判有关朝鲜以外地区的各种政治性、经济性问题。还有，在缔结停战协定、军事停战委员会开始发挥有效机能之前，敌对行动依然在继续进行。如果你方同意，请就此签字作为我们谈判的第一个协议，你同意吗？”谈判刚刚开始，就急着签字，未免失之草率。南日将军没理他的话茬，而是郑重地发言：“朝中人民历来主张，现在仍然主张朝鲜战争应该迅速结束。为此，我方认为：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于一定期限内完成，以双方撤离地区为非军事地带。这里的民政恢复至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基本保证。”

紧接着，邓华致词，全面支持南日代表的表述和提议。

本来。中朝双方曾商定，南日为首席代表，谈判会上主要由他发言。这是按照毛泽东、金日成、周恩来的指示确定的。其既照顾了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在策略上又能进退裕如，相机行事。相比之下，美国人对待南朝鲜人就大不恭了：首席代表是美方的，甚至在谈判桌上也把“韩国”代表当摆设。乔埃征求其代表团成员意见时，根本不将白善焯放在眼里，而是越过他写条子给霍治。众国睽睽之下，令白善焯十分尴尬。

随后，乔埃提出了早就同李奇微商定、并经美国及其16个仆从国同意的9项议程草案。

这时已到中午时分，双方代表休会吃饭，同时利用这个时间制定下一步对策，南日、邓华等人将上午谈判情况向李克农、乔冠华作了汇报。

“砰！”李克农一敲桌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立场改变了，9项议题有一半是胡搅蛮缠，撤军和撤离‘三八线’却避而不谈。”“对，我们也不能示弱。”一阵紧急磋商后，决定反击。下午一开谈，中朝方针对乔埃的9项议题提出了5项条款。乔埃经常不等翻译讲完而打岔，后经邓华、解方严肃提出意见，他才有所收敛。

至7月26日经过半个月时间的唇枪舌战终于达成了谈判的五项议程：一是通过议程；二是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三是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四是战俘的安排问题；五是向双

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也就在这天，谈判进入第二议程，但却就此僵持住了：我方代表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美方则竭力反对。

本来，在停战谈判前，美方也是主张在“三八线”停火的，可是后来却一再拒绝。8月10日这天，当乔埃一行一坐到谈判桌前，就突然宣称：“将‘三八线’作为分界线的考虑和讨论到此终结。”“不对！”南日激烈地反驳，“这项讨论还刚刚开始，贵方没有理由拒绝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可美方代表却胡搅蛮缠他说什么他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现在双方虽然相持在“三八线”，但空中、海上他们仍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划分军事分界线时，“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上得到补偿”，无理地要我方后退出1.2万平方公里。这一强盗逻辑，立刻遭到了我方严厉的驳斥。我方代表指出：凡略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把海空军作为独立的军事力量的理论早就过时了。现代战争以及13个月的朝鲜战争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海空军是可以起决定作用的独立军事力量，那么，去年朝鲜战争开始时，美国首先派了海空军参战，为什么没有取得胜利，后来又非派陆军去援救不可呢？美军既然有了优势的海空军，为什么在战争初期退到洛东江，后来又从鸭绿江边一直退到了汉江以南呢？

对方无言以对，又不肯善罢干休，就狡猾地转移了论题，胡说什么在“三八线”东线后撤后难以重新攻取等等。解方当场指出：“我们在这里到底是讨论停止战争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还是在讨论停火一下再打更大的战争呢？”弄得美方代表哑口无言。

接下来，乔埃竟拒不发言，会场一片寂静，只听见人们粗重地喘息和马蹄表嗒嗒的走动声。南日愤怒地目不转睛地瞪着乔埃，嘴里叨着的那只别致的象牙烟嘴，像门大炮似的直指对方。乔埃也不示弱，睁大眼睛回敬南日，并不时拿起面前的两支铅笔轻轻地玩着。

首席代表如此抗衡，其他人员自然步调一致了。一分钟，两分钟，时间在白白地流逝。

坐在参谋席位上的我方联络官柴成文，此时起身走了出去。按照分工，他负责来回传递消息。而季克农、乔冠华等人就在离会场百米远的一间民房里等待，随时处理、指导谈判事宜。柴成文叫了一声：“李队长，乔埃装死狗了……”便把会议情况一一汇报了。季克农想了一下坚定他说：“你赶快回去告诉他们，就这样做下去！”“好的。”柴成文立刻返回会场，写了一张条子交给解方。他看后又转给邓华、南日等人，那上面只有3个字“坐下去”。南日会意地点点头，信心更足了。

这是一幕奇妙的“戏剧”：双方都紧闭着嘴巴，在沉默中互相瞪眼睛，间或有爱吸烟的代表们烦躁地用打火机点烟这样一个动作，再不就是用铅笔在纸上画着什么……

如此“哑巴会”一直开了132分钟。

为了打破在“停火线”上的僵局，双方商定设置专门委员会召开小组圆桌会议。

8月15日，小组会由双方各出两人进行。我方是解方和朝鲜人民军的李相朝，美方是霍治和勃克。

小组会议开始后，美方代表仍然喋喋不休地为他们的“海空军优势补论”寻找各种莫名其妙的根据、妄图不战而侵吞北朝鲜的大片土地。解方立

即回敬说：我承认你们的海空优势，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你们海空军确实有优势。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就把你们赶下大海了，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在另一次小组会上，又幽默他说：“既然你方说你海空军强，我方说我陆军强，我们是否同样可作这样的设想：在停战时，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你们的海空军也不停止行动。这样好不好？”一句话戳穿了敌人的“海空优势”谬论，把在场的人员全逗笑了。霍治也搭讪着笑了，无法反驳，但又坚决不干。

在连续几天的小组会上，美方代表耍尽了花招，忽而嘻皮笑脸，忽而重弹老调，忽而闭口不言，忽而威胁恫吓。对美军代表这套拙劣的把戏，我方早有准备，每次交锋都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仅仅几个回合，美方代表就深感我方实在不好惹。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美方仍是不肯从原有方案后退一步。他们在谈判桌上谈不赢，就狂妄地叫嚷：“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你们今天不给，将来我们自然会有。”对这种威胁和恫吓，我方针锋相对他说：炸弹、大炮、机关枪有什么可怕，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你们在战场上也休想得到！会后，他们及时把敌人准备挑起“大炮与机关枪辩论”的情况电告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朝鲜人民军司令员金日成。

8月18日，美军果然发动了“夏季攻势”。

8月19日清晨，志愿军排长姚庆祥沿板门店由西向东巡逻时遭美军枪杀。

当姚庆祥在非军事区被对方枪杀的消息传来后，朝中方代表十分震惊，立即要求现场调查。次日，朝中代表团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乔冠华念出一副名闻遐迩的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

与此同时，在8月20日的小组会议上，李相朝正式提出：“为了参加警卫排长的葬礼，建议下午休会。并且为了祈祷停战谈判第一个牺牲者的冥福，希望霍治、勃克两位代表参加。”而霍治、勃克怕有认帐的嫌疑，便以需要回去汇报为由匆匆乘上直升飞机溜了。

8月22日夜晚22点20分。一架美军飞机突然侵入中立区盘旋俯冲，投弹扫射。爆炸迭起，火光熊熊。

一起更为严重的破坏停战谈判事件发生了。

敌机飞走后，愤怒至极但不失冷静的李克农决定保护现场，并马上通知对方。很快，一条电讯飞到位山的帐篷村：“22时20分联合国军轰炸了谈判会场，要求立即进行调查。”

美韩方不敢怠慢，联络官肯尼、穆莱两位连同两名翻译急忙驱车出发，于次日1时45分来到开城。朝中方面的联络官张春山以及若干新闻记者正等候在那里。见面之后，张春山单刀直入：“22时20分，贵军的飞机轰炸了这个地区。我们听见了轰炸声……”

“请谈得详细些，炸弹是复数还是单数？”肯尼一出言就有抵赖的情绪。张春山将一块炸弹片递给肯尼：“这是在补给车辆的槽子里发现的。”在朝中代表团宿舍附近发现了4个弹坑。然而肯尼却视而不见，反而装着一副受委屈的样子，说：“怎能确定是‘联合国军’飞机所为？”“假如联络官是一个军人，是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话，你是不能否定所看到的这些东西的。我奉首席代表的指示，首先口头提出最严重的抗议。我通告贵方：我们拒绝参加预定在明天举行的正式谈判，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抗议的权利。”8月

23日谈判被迫休会。美军司令李奇微曾得意忘形地说：“用我们联合国军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的位置。”但是，李奇微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早已作好一切战斗准备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毛泽东与金日成的共同领导下，给敌人的夏、秋两季攻势以迎头痛击，从8月18日到10月22日的两个多月时间，歼敌15.7万余人。

9月27日，李奇微给朝中代表团来信，被迫回到谈判桌上来，但建议将会址改在板门店以东的松贤里。

10月7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李奇微，要求将会场地址移至板门店，由双方负责保护这一会场地址。

10月8日，李奇微来信同意会址设在板门店，并建议双方联络官10月10日会晤，讨论恢复谈判的具体事宜。

从此，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板门店名震世界。

拼命厮杀的敌对双方又坐在谈判桌前了。只是代表团中一些老面孔被新面孔取代了。朝中方以边章五替换了邓华，以郑斗焕替换了张春山为谈判代表。对方也以李亨根接替了白善焯。双方都摆出了准备长期舌战的姿态。

10月25日上午，在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双方重又陷入僵局。中朝方以“三八线”为基数，个别地方适当放松。而对方代表霍抬辩解说：“作战将继续到停战时为止。因之接触线完全可能发生变化，所以将分界线在现在的接触线上固定化起来是不适当的。”李相朝反驳道，“分界线问题作为进入协商其他事项的前提，是具有应当比其他问题优先决定的性质的，所以分界线必须在现在的接触线上决定下来。”“对！”一直在小组会上扮演副手角色的中国代表解方将军强烈支持这一点，“如果不在这项议程上谈妥，以下无法进行。”

谁知霍治胡缠，“假如能保证谈判在明天就能达成协议的话，那又当别论，可是因为还不知道何时才能缔结协定，要是在现在的线上决定实施实质上的停战，这是违反‘作战可继续到签字时为止’这个当初的商定的。”“无稽之谈！如若不在现在的线上决定下来，那么不是和退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样了吗？我们还怎么往下谈？”解方义正辞严地反驳道。

美方在事实和公理面前，被迫放弃了要求我方退出1.2万平方公里的荒谬方案，第二项议程的小组谈判在艰难中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他们又提出了片面要求我方退出1500平方公里的无理方案，妄图唾手占据开城地区。从1.2万平方公里到1500平方公里，单从数字上看，敌人是作了很大让步，然而，开城地区谈判前就在我们手中，而且是谈判的会场所在地。因此，对于美方代表索取开城的企图，我方当然不会答应。

谈判开始以后，美方代表制造种种借口，为他们的侵略方案辩护，都被我方代表一一揭穿、驳倒了。特别是解方的发言，反应迅速，语言犀利，逻辑性强，常使美方代表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美方说，把开城划到他们一边，是为“防卫汉城”。解方当即驳斥：“你们提出索取开城的理由之一是防卫汉城，这种话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了。你们借口防卫，侵占台湾，侵占日本的许多岛屿，这种论据是说不通的。”美方一看这招不行，就颠倒黑白他说：“谈判开始前，开城就不在你们手中。”解方立即揭穿说：“你们太健忘了。讨论谈判会址的时候，你们曾争辩说，你们从来不愿在开城谈判，一定要改变会址，理由是开城在我们手中，于你们不利。如今，时间才过去两个多月，就改变了你们自己原来说的话，又说

不在我们手中，难道当初是信口开河吗？”

美方无可奈何。只得承认开城在谈判前为我方占领，但又狡辩说：“开城之所以被你们占领，是因为我们没有进攻，这表示了对停战的诚意。”解方笑道：“难道你方没有进攻鸭绿江，也是表示对停战的诚意？”美方急了，凶狠狠他说：“要不是因为开城是中立城市，我们原可以很容易把它拿过来的。”解方提高声音回敬道：“请不要忘记了，你们在所谓秋季攻势中，曾企图绕过开城，进犯该城东北，因而使第一骑兵师的大部分士兵丧失了生命。这就是你所说的‘很容易’吗？”经过几场唇枪舌战的较量，美方代表终于败下阵来。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尤其是李承晚，在他看来，开城是朝鲜古都，是开国之城，丢了古都，觉得政治上很难交待，因此再三请求美方在谈判中索要开城。于是，美方在会场内“索要”不成，就在会场外武力夺取。结果，美军“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仅一个多月，妄图武力夺取开城的敌人又被我歼灭1万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美方终于放弃了他们索取开城的无理主张，被迫同意了我方提出的方案，即以现有的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

在划定双方实际接触线的小组委员会和参谋人员会议上，美方总想占便宜，有些高地明明是我方控制，美方代表却说是他们的地盘，而且拿出地图一连指出了十几处，暗地里偷偷派兵企图夺去。解方对此十分气恼，会后转告我方部队，不仅守住这些阵地，而且有些争议的“拉锯”高地也连夜夺回到我们手中。敌人这才不得不在11月27日与我方达成了停战谈判的第二项议程的协议，只是附加了1个条件：如果在30天内军事停战协议签字，则已确定的军事分界线将不再予以变更。否则，将根据停战协议签字时的实际接触线进行修改。

美军原以为，这样一来就会凭借他们的军事实力向实际接触线的北方蚕食。然而，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个“夜郎自大”的梦想，到停战协议签字时，军事分界线不是向北，而是又向南推进了300多平方公里。解方说：“这就是彭总说的‘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的战术所取得的胜利。”第二项议程的谈判，从当年7月26日开始，到11月27日达成协议，先后召开了18次代表团大会、37次小组委员会会议、14次参谋人员会议，整整化费了4个月时间。

停战谈判从1951年11月27日转入第三议程，内容是“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解方原以为，停战的军事分界线这个关键问题解决了，其他有关停火与休战的具体问题，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后来李克农全面分析了解决这项议程的形势、任务以及敌我双方的对策，敌人可能设置的障碍等等，使解方马上意识到，这次谈判将又是一次难缠的“战斗”，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天夜里，李克农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有关谈判的指示精神，最后指出：“原则要坚持，策略要灵活”，“和固有利，拖也不怕”，“只要涉及到朝鲜人民的主权问题，我们决不让步！”李克农将军的这后一句话，深深印在了解方的脑子里，并在以后的谈判中，竭尽全力地为实现这一指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谈判开始后，我方本着公平合理的精神首先提出了五条原则建议：1. 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正规与非正规部队武装人员，应自停战协议签字之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为。2. 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

议后三天内，自非军事地区撤出。3，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五天内，以军事分界线为界自双方的后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如逾期不撤，又无任何延期撤走的理由，则对方力维持治安，对于此类武装人员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4. 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区，亦不得对该地区进行武装行动。5. 双方各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具体安排和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按说，只要有诚意停战，对这五条是无可厚非的。美方代表却抛出了七条主张，其中有一些与我方原则没有多大差别。但关于停战后限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自己国土上修建飞机场和停战后坚持到对方的空中及地面“自由观察”等，我方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对朝鲜主权的侵犯。经过几次的辩论，毫无结果。

为了表达我们解决问题的诚意，解方于12月3日的小组会上，对我方提出的五项原则建议作了部分调整，同时增加了两条新的建议：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力监督这一规定的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督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关于视察的报告。

这两条补充建议，是在不损害朝鲜主权的前提下，对美方的无理要求作出的部分让步，以便尽快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协议。连美联社记者也不得不承认：“共方真正希望在朝鲜停战，是没有多少可怀疑的地方了。”然而，美方代表仍旧死抱着他们的原方案不放，一直磨了九天，才对我方的修订案表态；虽然对个别问题作了些松动表示，但在限修机场等主要分歧上仍不肯让步，百般狡辩、抵赖。面对美方无耻行径，解方再次重申了我方的原则立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朝鲜人民在自己的境内修不修建飞机场，那是朝鲜人民的内政和主权，一切外国势力都无权干涉。美方非要粗暴地干涉朝鲜的内政和主权，那就是有意给停战谈判设置障碍，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美方见狡辩不成，又拿出威胁、恫吓的手段说，要说干涉内政，自开战以来就干涉了，早就用武力限制了你们机场的修建，炸坏了你们的设施，还经常在你们上空监视。你们把飞机场修好了，我给炸掉；你再修，我再炸！解方立刻还击说，“你们这种血腥逼人的好战分子的理论荒谬得不值一驳，你们应该知道，即便在你们使用军事力量狂轰滥炸，大肆破坏的时候，你们也没有干涉得了我们的内政。我坦白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你们使用军事力量得不到的东西！”解方的驳斥、理由充足、正气凛然。美方代表费伦堡则把声音提高了8度：“我们不会同意在停战期间发展军用机场的。现在不会，明天不会，永远不会，地狱结了冰也不会！”接着又以威胁的口吻重弹老调：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条件，“就让大炮、炸弹和子弹去继续辩论！”与此同时，美军不断对我方领空挑衅，甚至侵入我国沈阳、本溪、抚顺等地上空，还轰炸开城中立区我方代表团驻地，并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这一切都被我方无情、彻底地揭露和粉碎了。美军地面部队在战场上的局部攻势，也被我击败。

就这样，经过4个多月的斗争，美方终于放弃了等到“地狱结了冰”，也不愿放弃的限制我方修建机场的主张。

1952年8月5日，双方在除战俘遣返问题外全部达成协议。而战俘遣返

问题，乃是谈判中争议大而又费时最长的一个焦点。按国际惯例。停战后，双方应交换全部战俘。但美国和李承晚集团却炮制所谓“自愿遣返”、“一对一的交换”、“平民顶战俘”等提议，人为地造成遣返战俘上的歧视政策和不平等政策，理所当然地被我方否定。美国于是拒绝遣返我方被俘人员，还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残害，搞什么“甄别”，强迫刺字，按手印，写“血书”，乃至毒打、截肢、杀害，以胁迫他们改变要求遣返的意愿。这样阻挠停战协定的签订达一年半之久。

实事求是他讲，中朝代表团在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整个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或主要方面，都是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掌握并指导进行的。凡谈判桌上的重大问题，都被要求及时报告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以便于他们的下一步决策与指导。当周恩来得知在战俘遣俘问题上不能取得进展后，本想指示通过一定的让步来打破僵局，但他考虑到美方仍在作困兽斗，所以不急不躁，坚持三条原则，即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他归结到一点，即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

1952年10月8日，美军片面地中止停战谈判，又于14日向金化东北上甘岭地区发起进攻，企图攻占上甘岭两侧高地，夺取五圣山，迫使中朝人民军队后退，以造成其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毛泽东、周恩来当然也看出这一点，要求我军在战场上狠狠打击敌人，以打促谈，迫使他们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至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在43天里连续打退敌人900多次攻击，歼敌25000多人。

美国人无可奈何，加之美国新一轮总统选举在即，选民普遍要求和平，国内外的压力迫使杜鲁门总统改变拖延谈判的伎俩，于1953年3月指示美方代表团主动提出了先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

毛泽东、金日成、周恩来敏锐地抓住美方的新动向，同意先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恢复谈判。

周恩来鉴于美国已开始唱低调，停战已有希望，于是提出遣返战俘分两步走的提议：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回国的战俘，而将其余的转交中立国，有关方面必须保证他们的遣返权利得到尊重。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但美方寻找借口反对把暂时不遣返的战俘移交中立国，周恩来考虑再三，同意把他们交由设在朝鲜非军事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一个时期，以保证他们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行使彼遣返的权利。以此为契机，双方终于在1953年6月8日达成了最后协议，使这一拖延已久的棘手问题得到了解决。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还分会内会外两个方面的斗争。新闻斗争就是配合谈判的会外斗争。会有某些不能讲的问题，可用新闻报道的形式来揭露，起到动员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方谈判，孤立敌人，扩大敌人内部矛盾的作用。

在新闻斗争中，我方一方面直接通过我们的通讯社和广播来宣传我们的政策方针，揭露敌人。如曾组织“联合国军”战俘写家信，写通讯，发表照片等，以驳斥美国污蔑我们对战俘搞“死亡行军”的宣传。另一方面我方又利用西方、甚至美国的通讯社、记者来为我们作宣传，因为西方通讯社和记者不是铁板一块。如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敌（澳大利亚人）就比较进步，能进行实事求是的报道，常为我方说话。阿兰就曾揭露合众社总社要求其朝记者搜集、伪造我残暴虐待战俘的报道，致使该记者无法立足，逃逸东京。对阿兰等进步记者，我方优先供给他们第

一手的重要新闻，并通过他们向其他记者提供新闻。阿兰、贝却敌于是成了西方记者事实上的新闻发布人。因为我们提供的新闻都是真实的，这就使阿兰、贝却敌在西方记者中具有很高的威信。说他们提供的新闻从来都是正确的，并且引起西方记者对美国新闻宫经常对他们封锁事实的真相不满。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即所谓“老爸圣诞行动”。1950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后，美联社随军摄影记者弗兰克·诺尔踌躇满志，决心要创建奇功：当美军先锋部队将美国军旗插到鸭绿江畔的一瞬间，最先把这个难得的场面摄入他的镜头。但不料诺尔所在的陆战第一师不久即陷入中，朝两国军队的包围之中。

12月17日，陆战第一师指挥机关与部分主力在大量航空兵与海军舰只的支持配合下，侥幸突围，从海上逃跑。逃跑时，还带走了诺尔的猎狗，却抛下了可怜的“诺尔老爸”。

后来，美联社通过多方渠道，才打听到诺尔已被我志愿军战俘营收容，其心爱的照相机及大量摄影作品等都在逃跑时丢失。于是，在1951年圣诞节前夕，以迪斯福为首的美联社驻东京总分社的几位记者来到板门店，商量着向在战俘营的诺尔传送一架照相机与胶卷，他们说：“如果我们的老爸能够在那边重操旧业，我们美联社可就有了独家新闻，太妙啦……”

计划既已确定，就要想方设法去实施。考虑到实施这一计划有相当的政治风险，必须严格保密。为此，他们几经磋商，决定为这一开辟特殊稿源的秘密计划取个代号，叫做“老爸圣诞行动”。

如何迈出第一步呢？他们首先想到了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和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敌。他俩既懂英语，又懂汉语，在板门店谈判区经常接触朝中方面的高层人物，他们决定冒昧找这两位同行悄悄商量一番，请求协助。

贝却敌等听了“老爸圣诞行动”计划的概况介绍，拍案叫绝，愿意竭力相帮。但贝却敌等并未鲁莽行事。他们先找香港《大公报》驻开城中立区记者朱启平商量。经过后者沟通撮合，没有几天，李克农和乔冠华就表示了明确态度：愿意给予配合，并且向志愿军有关方面打了招呼，给予特殊方便，一路绿灯，不但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把照相器材及时送到诺尔手中，还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把诺尔拍好的新闻照片及时转到美联社亚洲总分社工作人员的手中。

一周之后，一架专业摄影记者使用的德制林哈夫牌高级新闻镜箱，连同—批可以随拍随冲的散页新闻胶片就安然送到了“诺尔老爸”的手中。随同摄影器材一起送达的，还有一张精美的圣诞卡、一封慰问信、一幅诺尔夫人的照片。慰问信是东京的美联社同事们写的，信上说：您拍了照片后，我们将会及时收到及时发稿，美国故乡的民众渴望知道美国战俘的现实真相。这一有意义的工作，有赖于“老爸”的努力了……

诺尔读毕信，不觉热泪盈眶。从今以后，他又有事情可做了！

1951年12月25日，收容西方战俘的志愿军战俘营中，迎来了圣诞佳节。弗兰克·诺尔面对着圣诞树上琳琅满目的彩灯和饰物，面对着丰盛的美酒佳肴，面对着一张张容光焕发的战俘们的脸庞，眉开眼笑，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一名战俘，他抖擞精神，端起了崭新的照相机，开始忙个不停……

他乐呵呵地嚷着：“让我把这个难忘的场面记录下来，送到美国去登报，好叫我们的亲人看看，我们活着，活得挺好。一张照片能顶一千句话哩……”

诺尔按照生活的规定情景，要求大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吃的喝的说的笑的一切如常，不要紧张，不要做作，一概由他来选择理想的镜头。

图片编辑迈克斯·迪斯福接到这批照片后大加赞赏，连呼“诺尔老爸好样的！”他挑选了七幅最精彩的照片，在东京用无线电传真发往美国，立即引起了轰动。美国各大报纸，不仅普遍在头版头条位置用大块篇幅刊出这些反映美俘欢度圣诞节的照片，同时还加发醒目的大字标题：

弗兰克·诺尔大获成功。

——美联社记者在铁幕后面拍到独一无二的照片。

随着诺尔的摄影作品一批一批在西方报刊上发表，通过照片看到亲人形象的战俘眷属越来越多，于是大量书信越过太平洋，送到了志愿军战俘营。

战俘和他们的眷属把诺尔看成了“上帝的使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有位战俘的母亲在信中说：“我相信，是上帝故意安排诺尔到中共战俘营中去的，好让他承担起传播亲属深情的崇高角色，我们感谢全能的上帝，也感谢好心的诺尔。当然，我们更要感谢真诚待你们的中国人。”

弗兰克·诺尔名声大噪。在板门店中立区，他成了人们的有趣谈资；在战俘营，更成了传奇人物。

1953年8月，弗兰克·诺尔被遣返回国。他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中，一共度过了两年又9个月时间。自他获得照相器材以后，其拍摄的新闻照片仅发表的就有好几百幅。这些新闻照片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待遇的事实。西方报刊本来对中国发出的关于战俘生活的新闻照片持半信半疑的态度，通常不愿刊用；因为诺尔的作品印证了事实真相，从此，中国发出的同类照片在西方的信任度和采用率也大大提高了。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在李克农、乔冠华的亲自指导下，朝鲜谈判中的新闻斗争，成功地争取了世界舆论的支持，有力地配合了会内谈判。

1953年7月27日10点整，板门店谈判大厅里一片安静，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从大厅南门进入大厅、分别在会议桌前就坐。签字仪式正式开始。南日大将、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美方即将协定文本送到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位山的帐篷里签署认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则在平壤首相府于送抵的协定文本上签字。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也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按照双方商定，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时间即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至此，一场历时两年零十几天的停战谈判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

朝鲜停战谈判自始至终贯彻了毛泽东“谈打相济”的和谈方针。在我中方代表团组成之际，毛泽东就预见到谈判将是复杂的、长期的，因而要求我代表团不可性急，准备同敌人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勇斗智。即以强大的军事攻势为后盾并贯穿于谈判期间，以打促谈，以谈助打，谈谈打打，谈打结合，以迫使敌人最终在谈判桌上就范，1951年夏、秋，当美帝国主义发动攻势，妄图把军事分界线划在实际控制线以北时，毛泽东即命令志愿军及时发起了金城以南地区秋季防御战役，先后粉碎了敌人疯狂的进攻，迫使敌人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认可“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的这种“谈打相济”的谋略，亦可用“双管齐下”或“多管其下”来概括。因为，除了文、武两条战线外，还济以新闻战，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渠道与方式，给美帝国主义造成强大压力。在具体谈判中，周恩来又向我方代表团授以“互动”原则，即要善于在不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作出一定让步，以打破僵局，

但这必须以对方表现出谈判的诚意为条件；对方有了诚意，有了松动，就要把握时机，以求成功。战俘遣返问题谈判，即是“互动”原则的典范运用。

此外，毛泽东、周恩来在千里之外的北京运筹帷幄，从战略上和大的战术上指挥谈、打两条战线的开展，但在具体执行上，在具体战术上，又将权力完全交给前线指挥员和谈判代表。这就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统而不死”、“御而不揽”的指挥谋略。中国谈判代表团之所以能取得节节胜利，李克农、乔冠华、邓华、解方等之所以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谈判艺术并最终压倒对方，原因之一也就在毛泽东，周恩来能“统而不死”、“御而不揽”。

日内瓦中美会谈 钱学森胜利归国

1955年9月1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达成两国平民回国协议，这是长达15年之久的马拉松式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达成的唯一协议。由此，1955年下半年至1965年底从美国返回中国的科学家有130多人，其中有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多年之后，周总理在谈到日内瓦会谈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1954年4—7月，中美苏英法五国及有关国家在日内瓦举行了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周恩来率团参加了会议，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5月19日，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口头表示，他愿以私人身份就在华美侨问题和在美华侨问题作为中、美之间的中介人。宦乡向周恩来汇报这一情况，周恩来立即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其中包括钱学森这样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对于建设新中国来说，无疑是急需的宝贵人才。于是他指示宦乡：如美方再来试探，可同意经英方中介进行直接接触，视美方态度，确定在何处举行谈判，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学生和科学家被扣问题。5月27日，宦乡根据周恩来指示，口头答复杜威廉。6月1日，杜威廉向宦乡口头转达：美国代表团希望就在华美侨和在美华侨问题与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宦乡请示周恩来后，口头回答杜威廉：中国方面从不拒绝进行商谈。6月4日下午，杜威廉口头告宦乡称：美国代表团指定尤·阿·约翰逊（驻捷公使）为代表、马丁（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为助手与中方接触。建议双方接触地点在国联大厦。杜威廉说，艾登外相指示他作为中介，参加中美之间的接触。宦乡请示周恩来后，口头回答杜威廉：我方由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为代表、柯百年力助手与美方接触；同意双方接触地点在国联大厦；不同意杜威廉作为中介，参加谈判。中美之间的首次外交接触就这样借日内瓦会议之机揭开了序幕。

会谈开始后，约翰逊提出，在华被扣的美国入共83人，分为四类：1. 在华被监禁的美侨，2. 在华被软禁的美侨，3. 要求离华而得不到出境证的美侨，4. 在华被扣留或被监禁的美国原空军人员和“联合国军”中的美军人员以及1953年1月在汕头附近被扣留的美国海军人员。约翰逊要求中方让这些美国人早日离华返美。

王炳南则向美方提出美国政府无理扣留我国留学生的问題。他严正指出：中国现有5000多名留学生在美国，有不少留学生要求回国，但遭美方百般刁难，当他们向美国政府申请离境时，美国政府却通知他们不得离开，甚至威胁说，谁要违反这一命令，将彼判处5000美元以下罚款或者5年以下徒刑，或者同时予以两种处罚，这是毫无道理的。他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扣留中国留学生，并恢复他们随时离开美国返回中国的权利。至于居留在美国的中国侨民，也同样享有随时回国的权利”。

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中方的行动，并提出了具体对策。正如王炳南后来所回忆的：“那时我在总理身边，亲聆教诲，一言一行都可以得到总理的直接指导，凡事都可以依赖总理。”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结束。从1954年9月2日起到1955年7月15日，中美双方改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前后共举行了17次。其间，美方只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只想做于他有利的，却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设置重重障碍，执意阻挠中国侨民和留学生返回祖国。同时，美方也拒绝接受中方愿意为那些想到中国探视美犯的家属给予签证的善意，决定不发护照给任何去中国访问的美国公民。领事级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

为了打破中美外交接触的僵局，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参加亚非会议的八国（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

周恩来的声明大大将了美国一军。当然，其时美国也想找机会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需要安抚国内舆论。7月13日，美国政府即通过英国向我方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经过磋商，中美双方确定将原在日内瓦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并确定我方代表是我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美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的重要报纸几乎都把这件事作为头版头条新闻。有的报纸还被抢购一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成为新闻媒介传播的热点。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日内瓦国联大厦内开始。为了表示中方对这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诚意和所持的积极态度，使中国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7月31日，即在会谈开始的前一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提前释放阿诺德等美国间谍。这是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判决的。这个消息使新闻界因为中美会谈而激动起来的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个美国记者听了此消息，禁不住脱口说：“啊，中国又抢去了主动！”一位法国记者讽刺道：“美国为什么不采取相应措施，抢回主动呢？”

第一次会谈由于中方宣布释放美国间谍，也由于中方代表王炳南和约翰逊已经熟识，因此会谈气氛轻松愉快。最后双方达成会谈议程的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8月2日，举行第二次会谈。约翰逊称有36名美国平民仍被拘留，此事影响美国人民及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随即他将36人名单交王大使。

王炳南大使发言说，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绝大多数的家属都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和在实际上所造成的困难，他们不能自由回返他们的祖国，无法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庭。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所一向非常关切的问题。王大使最后说：

“为了使居住在双方的两国侨民，首先是关于他们回国的问题，能够获得应有的照顾和协助，使有关这一问题的实际情况获得改善，我们建议：

1. 双方相互通报居留在本方的对方侨民情况。正像我们向你们提出了所有现在在中国的美国人的情况一样，我们也希望你方向我们提出在美国的中国侨民（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总数和名单。

2. 你方取消限制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的一切禁令和办法，包括所谓限

期出境而实际上增加了中国留学生返回祖国的困难的办法。

3. 你方向我方补交 1954 年 4 月 8 日你方通知我们获得批准回国的 76 名中国留学生名单。

4. 中美双方分别委托他所选择的第三国代理各自的侨民在对方国家中的事务，首先是这些侨民回国的事务。我们并提出我国委托印度共和国代理我国在美国的侨民的事务。”

王炳南发言以后，约翰逊对美国阻挠我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一事做了辩解，他说：“我国政府授权我向您绝对保证中国留学生并没有被阻碍不得离开美国，如果您知道有任何事例和我所说的不符合，请您告诉我，我将很感激，并将立即进行调查。”

针对约翰逊信誓旦旦的保证和声明，王炳南在 8 月 4 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突然提出了钱学森被阻挠回国的事，令约翰逊颇为狼狈。

钱学森是火箭专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教授，是 1934 年从中国到美国去留学的，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求学，后未先后在这两个学院教书，还曾帮助美国制造了第一枚导弹。他是文职人员，在研究导弹时得到美国陆军上校军衔。

早在 1950 年春，钱学森和他的家属就决定返回祖国。当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曾经几次警告他们，不许返回中国，并且派人监视他们的行动。但是，美国政府的这些干涉并不能阻止钱学森一家返回祖国的决心。1950 年 8 月 23 日，当钱学森一家已经办好行李托运，订好机票即将启程回国时，美国当局突然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说他的行李里有同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可是，同年 8 月 25 日，美联社报道，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里根说，钱学森在该院的工作是纯理论性的，与秘密研究无关。后来《纽约时报》洛杉矶电说，这些行李里面的印刷品，经联邦人员检查后，并无列入秘密的文件。到 1950 年 9 月 7 日，美国当局就以另外一个理由，说钱学森是共产党，将他逮捕，囚禁在圣佩得罗移民站里。9 月 22 日，美国当局命令钱学森交出了 1.5 万美元的保释金才将钱学森放出移民站。保释之后，据合众社报道，联邦当局在 9 月 23 日表示他们没有发现什么钱学森同共产主义有关的证据。可是钱学森仍旧不能回国，经常要听候传讯。他的行动被限制在一个县的范围之内，一步也不许出洛杉矶的县界。

美国政府就是这样，从 1950 年起，以各种借口和种种手段将钱学森博士扣留达 5 年之久。1955 年 6 月 15 日，钱学森和他的夫人蒋英到一个餐馆去用餐。他们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钱学森缠住联邦调查局人员，蒋英借口上洗手间给她在欧洲的妹妹寄了一封信，请她妹妹转寄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信与在一张便条上。信上说：“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信上还说：“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表达了钱学森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陈叔通接信后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转给了外交部，并指示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国进行严正交涉。

这样，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三次会议上，王炳南针对约翰逊所说的美国绝对没有限制留学生回国的谎言，郑重指出：“据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 1954 年 5 月 29 日声明，截至 1954 年 4 月 30 日，持有中国留学生护照的留美学生共计 5242 人。因为从 1951 年 6 月到 1955 年 4 月 1 日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留学生自由回国，违者课以 5000 美元罚金和处 5 年监禁，许多想回国

的留学生部不敢申请。”“本年4月2日，美政府宣布取消对我留学生回国的禁令，但到6月15日，钱学森仍然来信给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要求我政府帮助他回国。据回国同学报告，钱学森被禁止离开他所在的县界。”他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恢复钱学森返回祖国的权利。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约翰逊再也无法辩解，美国也不能再阻挠钱学森等人回国。就在第二天，即8月5日，钱学森得到通知可以离开美国。他们立即动身乘船返回他们日夜思念的祖国。和他们夫妇同船归国的还有22位科学家和6个孩子，其中有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真。他们于1955年9月20日在船上油印了《克里大兰轮第六十次航行归国同学录》。10月1日，这些漂流在外的中国学子在船上兴高采烈地欢度了新中国的国庆节。10月8日，船抵香港，同日即入境回到国内。

在日内瓦，1955年8月8日举行第4次会谈，当时王炳南还不知道钱学森已经得到可以回国的通知，他再次向约翰逊进行交涉。约翰逊答复说钱已被允许离开美国。这样，为钱学森回国事所进行的斗争遂告结束。

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是艰难持久的。周恩来仍直接领导了中方的每一步骤。会谈间，周恩来几次电告王炳南，要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谈判桌上的对手完全可以成为好朋友。王炳南按照周恩来指示，为了解决某个技术性问题并了解对方的态度，而主动约请约翰逊在闲静的山上找一个别墅，吃饭闲谈。约翰逊也数次约请王炳南。几年以后，周恩来还几次问王炳南：“美国人请你吃饭，你有没有回敬？”周恩来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这种灵活多样的处理原则以及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的工作方法，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王炳南。

1958年8月，周恩来又代表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并同时向美国15家重要新闻单位拍发电报，邀请他们的记者来华访问一个月。这一高着使顽固的杜勒斯大吃一惊，也震动了世界。美国新闻界欢呼雀跃，纷纷要求来中国访问。这便使我方在中美会谈中更有了主动权。

为了使中美会谈更快地进入关于台湾地区局势的实质性会谈，国内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核实和处理。王炳南按国内提供的情况，于9月10日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出境；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我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

但是，谈判毕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原则问题上中国是绝不会让步的。当周恩来得知美国要改派参赞同中国大使会谈想使会谈级别降低时，他马上通知王炳南大使：“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意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人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立场坚定，掷地有声。

经过我方努力，9月10日这天，双方终于达成了两国大使的联合声明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对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中美两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政府协助中美平民返回本国。

这个协议是双方在互下承认的情况下，搞的一个各说各的杰作，以后尼克松和周恩来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公报也仿效了这种形式。正如王炳南所言，“这份协议同时也是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前的唯一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我至今读来都能感觉到这份协议上每一个字的份量”。

日内瓦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在新中国诞生后五年，也是美国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人的时间长达五年后，两国政府间的首次外交接触。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尚处于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孤立的状态。周恩来以政治家的卓越胆识和外交家的敏锐灵活，及时地捕捉到美国方面通过英国人表示想解决在华侨民及间谍归国问题的机会，使中美双方政府代表坐到了一起。无论其实质性接触的成果如何，这本身就是一次外交上的突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周恩来正因为能审时度势，才在最恰当的时候抓住可以导致中美外交接触的战机而乘势引导，从而促成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折冲尊俎中，周恩来处处主动，不断将美方的军，使其措手不及，每每处于下风位置。钱学森终被允回国，便是周恩来抓住时机，主动出击的一项重要成果。

求同存异亚非会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1月15日，清脆的电波声从雅加达传向北京，整个世界为之瞩目——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印尼、缅甸、锡兰、印度、巴基斯坦五国总理致电中国政府，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4月18日至24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这个消息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将要参加会议的29个亚非国家，其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各异，甚至有的国家领导人还抱着激烈的反共立场。对中国，则尚有不少国家取着疑惑甚或怀疑态度，如印度总理尼赫鲁。而作为亚非国家之外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多是前亚非殖民地的宗主国），则普遍以一种嘲笑姿态来看待这次亚非会议。美国还企图阻挠中国参加。他挑拨亚非国家说，中国是对远东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中国要夺取亚非会议的领导权……

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邀请电后，立即决定参加。他们仔细研究了中国对此次会议的各种政策和策略。当时，周恩来刚做完阑尾手术，身体欠佳，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指派周恩来前去参加会议，还有些犹豫，但周恩来却奋然请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终于任命周恩来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率陈毅、叶季壮、章汉夫和黄镇、乔冠华等出征万隆。

在前往印尼万隆的途中，周恩来曾险遭晴害。他原拟与代表团部分成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途经香港接另一部分代表团成员上机。可是，因为受缅甸总理吴努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之邀，临时改变计划，于4月7日抵昆明准备飞仰光参加三国总理会晤，未能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11日下午6时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即在飞往万隆途中爆炸。周恩来闻讯后，没有被国民党特务的死亡威胁所压倒，仍然于14日坚持从昆明起飞，在仰光完成会晤后，又于4月16日率代表团主要成员飞抵印尼，准时出席万隆会议。

1955年4月18日上午9时，万隆独立大厦。29个摆脱了殖民统治的亚非独立国家的代表济济一堂，共商亚非地区事务。会议第一天的各国代表发言，大都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但是由于美国的挑拨，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贾马利却诬蔑共产主义是“新式殖民主义”，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也声称亚非人民当前的任务不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而是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他俩还提出什么“共产主义威胁”、“颠覆活动”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其矛头显然指向与会的中国。

当时会议气氛相当紧张，必须迅速作出反应。但是如何反应呢？美国记者幸灾乐祸，多数代表则惴惴不安，担心会议从此陷入分裂而遭夭折。

第二天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发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热烈的充满期待的掌声中健步走上讲台。他的第一句话就大大出人意外：“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下是来吵架的。”

周恩来那亲切、宽容的话一出口，会场里立时便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东道主印尼总统苏加诺当即感到：有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就砸不了！

贾马利、罗慕洛原准备硬着头皮听周恩来批判，但听到的却是如此理解

和温暖的话语，不禁为之动容。会场上原来比较紧张的气氛，也被周恩来和解的话语引向了宽松。

周恩来待掌声平静以后，又从容不迫和充满诚意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下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恩来阐明了中国的立场之后，接着回答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等问题。他说：“我要谈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10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也经历了近30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是数也数不尽的，最后才选择了现在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周恩来说到这里，再次以反问的语气请大家深思：“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为了进一步揭开阴影，他话锋一转，说：“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黑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周恩来的讲话，求同存异，绕过了暗礁，引导会议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最后，周恩来诚恳地欢迎各国代表到中国参观访问，他热忱地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18分钟的发言引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驱散了两天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浓厚乌云，使会议绕过了美帝国主义煞费苦心设置的暗礁，大大缩短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距离。许多国家代表纷纷上前与周恩来握手致贺，赞扬他心胸广阔，大肚能容，且当机立断、力挽狂澜于既倒。此时，连美国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发言是对中国和解态度的最好说明，其外交技巧已登峰造极，它是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

周恩来表明的和解立场在各国代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与会者多很乐观。这便急坏了以美国为首的阴谋破坏者。在他们的幕后挑唆下，4月21日的亚非会议又呈现出不祥气氛。

当天上午11时，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在他下榻的处所举行记者招待会，扬言要台湾“取得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还说对和平共处难以理解，“容易使人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活动联系起来”，公然呼吁让“中国公开地和正式地要求各国的当地共产主义团体解散！”

这时，与会代表又变得忧心忡忡，害怕锡兰总理的“建议性炸弹”投到大会上去。果然，科特拉瓦拉在下午发表了节外生枝的发言，声称亚非会议

应该谴责苏联对东欧各国进行的殖民主义统治。

会议走到了危险的十字路口。

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含糊。周恩来在会上首先声明不同意锡兰总理的一些言论，不过却没有迎头回击，只要求第二天给他答辩的机会。

会后，周恩来邀请会议主席、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陪他去见科特拉瓦拉，询问他在大会上讲的那句话的含义，特别是想了解科特拉瓦拉第二天是否继续采取行动，向大会提出决议草案协议。科特拉瓦拉没有想到周恩来竟然会来访问他。他不安地回答说：“我的讲话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想说出我的心里话而已！同时，我将不提出什么协议或者决议！”

周恩来放心了，临走时向他表示感谢，并向他友好地伸出手去。两个立场敌对的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好像两人早就是亲密朋友似的。

不料4月22日，缅甸总理吴努害怕出现破裂争吵，要求紧急发言，呼吁各国代表在辩论中克制感情，要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帮助会议取得成功！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也紧接着发表简短声明，愿与任何人辩论。会议此时紧张到了极点。各国代表都意识到亚非会议成败的关键已系于周恩来如何答辩了。于是水银灯、照相机、人们的目光都一齐刷刷地投向中国代表团。

周恩来沉着地走上讲台，用极为平缓和冷静的语调开始发言：“昨天锡兰总理报到了新殖民主义，这是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不能同意的提法……东欧国家的人民已经按自己的愿望选择了自己的国家制度。然而，提出一种新的定义或者进行辩论，都将无助于这个会议。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会上相互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将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或共同的愿望。”

周恩来此时是在沙里淘金，于锡兰总理的发言里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他接着说，科特拉瓦拉总理阁下提出，要求一切拥有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应在10年之内给它们以独立，这种积极精神是应该得到支持的。周恩来的态度，使科特拉瓦拉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会上，中国代表团本丁准备讨论台湾问题，但台湾问题还是被提出来了，因为有些国家对当时台湾地区局势持有模糊的看法。周恩来在会下的接触中，向代表们阐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并不要求会议进行讨论。他向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阐明中国的立场说，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第二，造成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谈判解决，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张——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和行动。

在4月23日的八国午宴中，周恩来还向各国记者发表了一个69字的奇特声明，向美国政府作出了友善的表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

周恩来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但又合情合理，以理服人，使各国代表理解到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与促成亚非会议成功的一片苦心。

亚非国家之间，虽然有众多的共同点，但由于各国制度不同、情况各异，分歧不少。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的态度却是：求和平是最大的原则，而实现这一原则可以采取灵活策略。周恩来针对有人不喜欢用“和平共处”的字眼，提出：就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一词吧！众所周知，当时，

我国是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的，可为了求团结、周恩来仍说：我们并不一定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措词，我们同意对五项原则有所增减。接着，周恩来根据对各国情况的调查研究，灵活地提出了七点和平宣言，供各国与会者参考。在周恩来的和解精神带动下，万隆会议终于达成了能为各方接受的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十项原则。

万隆会议尽管是亚非各独立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聚会，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渊源的不同，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拨离间，原本该是充满矛盾与对抗。充满火药味的。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处于中间如若措置不当，势必会使其外交活动陷入被动与孤立地步。针对此，周恩来巧妙而小心地绕过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抗，将与会者的视线引向共同的利害关系。加之他的诚恳和通情达理，使中国外交又一次顺利地绕过了危险的暗礁，走向了开阔的海洋。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所运用的谋略的核心点，就是“求同存异”，而不是“求同立异”，努力去寻找亚非国家的共同点并使之凸现出来；至于分歧，在阐明并坚持我方的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又尽量予以回避和淡化，从而为亚非国家的和平共处开辟出一条可行的现实主义的途径。万隆会议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周恩来“求同存异”谋略的胜利。

中法建交 震惊世界

1958年春，当戴高乐在科龙贝隐居的时候，意外地读到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前总理爱德加·富尔写的一本中国访问记：《蛇与龟》，富尔在书中提出法国应该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59年1月8日，戴高乐出任第五共和国总统，开始奉行与美国相抗衡的“戴高乐主义”。1963年，他在促成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趁着中苏关系恶化之机，将眼光投向遥远的东方，开始考虑与也是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关系。这时候，戴高乐想起了《蛇与龟》的作者。

1957年5月，作为法国前总理的富尔曾来过中国。

富尔首次访华后，由于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对中国的内外政策作了某些了解和研究，他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

富尔除了将他的看法向戴高乐作过陈述外，还向戴高乐周围的一些决策人物作了宣讲。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富尔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一原因，1960年戴高乐曾赋予富尔探听中国政府对法国政府未来的外交承认兴趣如何的任务。1963年秋，当戴高乐决定进一步采取建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的试探行动时，便很自然地决定选派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到中国进行谈判。

与中国建交，这是戴高乐和法国政府经过长期考虑研究之后，决定要写出一篇“戴高乐主义”的风格独特而震撼，世界的“政治文章”中的重要一笔。戴高乐的全球战略方针，当然以维护法国和西欧的利益为重点；但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就需要对他的战略意图从西欧局部到全球范围作出全面的斟酌，以抗衡美国。因此，正确处理法国和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关系，以提高法国的战略地位和加强他的政策优势，便成为戴高乐全球战略中的一项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而不失时机地打通法国同中国的正常关系之路，便成为法国政府要立即着手解决的问题。

为此，戴高乐设想出三种对华建交方案：

1. 无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表示同意。
2. 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3. 近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

按照1963年10月富尔访华时对这三个方案的解释，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个方案。因为他绝不仿效英国拖泥带水的半建交做法，并对英国的不智之举加以嘲讽。但是，戴高乐希望在台湾保留一名低级别的人员，并设法避开正式公开声明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戴高乐是想以无条件承认的方式绕开这个矛盾。戴高乐的意图是，既可取得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实际结果；又可对法国政府内的反华势力和亲蒋分子作点妥协，并给台湾一些安抚；此外在对美、英关系方面也留下一点适当的回旋余地。

当然，戴高乐也了解中国政府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所以又准备了第二

方案，留下可进可退的机动余地。至于第三方案，则表示无意采取。

戴高乐三种方案和盘托出的绝妙之处在于试探中国政府的态度，在讨价还价中完成中法邦交正常化过程，既可以大幅度提高法国的国际威望，给美国以又一次历史嘲讽，又尽可能地“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

1963年8月的一天，戴高乐夫妇在爱丽舍宫邀请富尔夫妇共进午餐。席间，戴高乐要求富尔以法国总统代表的名义再去一次中国。富尔欣然应允。他在动身前拿到了戴高乐致中国领导人的一封信，富尔充当了名副其实的总统信使。

接着，富尔通过中国驻瑞典使馆提出访问中国，并要求：为避开国际新闻界的视线，他这次访问对外公开宣称为纯系私人访问，没有任何官方使命。

中国方面答应了富尔的要求。周恩来指示：以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访华。

周恩来非常清楚富尔此次中国之行的使命和意图，并同毛泽东一起决定响应戴高乐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姿态，积极推动中法建交。

1963年10月22日下午，首都机场。一架大型专用客机徐徐降落，法国参议员、前总理爱德加·富尔携夫人微笑着从机舱走出。

早已在机场等候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迎上前去，同客人热烈握手。

于是，富尔在时隔6年多以后，第二次踏上中国这个美丽而辽阔的国度。

10月23日，富尔抵京的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富尔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张奚若、谢黎在一旁陪同。

短暂的寒暄后，谈话转入实质性内容。

富尔说：“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他认为，我这次访华的使命不宜公开。这并不是想掩盖他对中国的感情，而是因为一旦公开出去，报界就会大做文章，那就不能安安静静地深入讨论问题。不过，此次访华还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戴高乐将军有一封亲笔信给我，信中授权我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富尔当场把信的内容念了一遍，并把信交给了周恩来，说：“你们可以留下看一看，过两天再给我。”

出于礼貌，周恩来接过富尔递过来的戴高乐的信，看了看，随即又把信递回给了富尔，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

周恩来对戴高乐将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方面所采取的一些行动表示赞赏：“这几年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

10月25日，周恩来在西花厅与富尔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这次会谈一开始，富尔就以先入为主的办法，将戴高乐总统交与的对华建交的3个方案提了出来。

10月31日下午5时，北京钓鱼台宾馆15号楼，周恩来与富尔开始了具

有决定意义的会谈。周恩来说：“中国政府认真研究了阁下提出的三个方案。基于中法双方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改善中法两国关系的积极愿望，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方案。”这个方案是：

1. 法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2. 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

3. 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接着，周恩来对这个方案作了解释。周恩来提出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关于是否附加条件的问题上略为变通了一下，即没有要求法方公开声明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而以我单方面照会申明、法方默认的方式代替。但在断交建交谁先谁后的问题上，还留有余地。

让步也要有步骤。周恩来不会一下迈出两步，他先迈出一步，然后要看看富尔的反应。

果然，富尔对周恩来在附加条件上的变通，表示了愿意靠近的兴趣。他说：“经过研究，法方把有条件的承认变为附加解释的承认。戴高乐需要了解中国对承认是怎样解释的。你们的解释完全符合国际法，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承认两个中国。我可以向戴高乐报告，中国的解释不是条件，而是国际法的实施。”

富尔也让了一步。

在以后的谈判中，周恩来既坚持原则，又作了让步，提出了第四种方案，也就是“直接建交方案”。11月2日凌晨，中方将“直接建交方案”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交给富尔。上午11时，周恩来与富尔在和平饭店就这个方案进行最后的研究。

富尔坦率地向周恩来提出：“能否允许法国先同贵国建交，然后再同台湾断交？”

周恩来从国际大局着眼，决定做出程序性让步，他友好地说：“鉴于富尔先生一再要求允许法国先同中国建交而后再同蒋帮断交，我方根据法台关系的实际情况，考虑到戴高乐总统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承诺，在达成内部协议的基础上，允许法国先宣布同我建交，然后再由法方根据由此形成的国际法客观形势，自然地结束同蒋帮的关系，但法方要以书面形式声明这一立场。”

富尔对此表示感谢，又对发表书面声明感到为难，请中方考虑予以照顾。

周总理稍加考虑，又以灵活态度提出妥协方案：在法方确认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条件下，中方单方面发表声明讲清这一问题，法方以默认的方式加以肯定。

我国政府提出的建交方案非常合情合理，其中所以使用了内部默认部分，主要是照顾戴高乐和法国政府处境的一些困难。这一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密切结合的高超的外交艺术，巧妙地排除了来自法国方面的不合理要求，成功地解决了谈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开启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之门铺平了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建交方案，就连能言善辩的富尔也觉得提不出任何异议，只是说，由于他未被授权签署正式协议，他将携此方案返法向戴高乐复命，并立即答复我方。中、法两国政府关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初步

的但又是实质性的重要谈判至此告一段落。

在富尔访华期间，我们给予了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分别接见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单独或共同和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会谈了6次。中国政府采取的姿态和表示的诚意，坚定了戴高乐的立场。

台湾国民党当局从富尔访华起，即加紧活动，企图干扰和动摇戴高乐的决心。1963年12月24日，蒋介石给戴高乐写信，要求澄清法国政府是否准备改变同中国关系的现有方式。1964年1月14日戴高乐复信，信中礼貌地表示对蒋介石本人如何怀有敬意和个人友情，但最后却归结于下面的几句话：“我应该告诉您，确确实实，我的政府不久将同建立在北京的政府开始缔结外交关系……出现在大陆中国并已确立的形势同我们过去所能预计的，是不相符合的。法国不能长期无视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

接着，戴高乐派遣曾任驻国民党当局大使的佩切科夫将军拿着这封复信去台北面见蒋介石。戴高乐想尽量作得周到些，但无意听从蒋介石的劝阻。

美国更是千方百计地向戴高乐施加压力。1963年11月5日，戴高乐接见了美国驻法大使波伦。波伦问：听说巴黎打算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是否确有其事？戴高乐答：什么都不能排除，总有一天应该承认事实并从中得出结论。这时，富尔已去中国，戴高乐告诉波伦，富尔回国后，法国将根据情况进一步研究。

1964年1月7日，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夏尔·吕塞约见波伦，告诉他法国已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几天后，法国驻美大使埃尔韦·阿尔方也受命通报美国国务院，法国政府已在部长会议上作出了同中国建立政治关系的决定。阿尔方还说，法国政府认为，中国正在走与苏联不同的独立道路，他已不再同苏联组成杜勒斯生前说过的那种铁板一块的集团。1月16日，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哈里曼向法国大使递交了表示强烈反对的照会，说什么法国此举违反了“自由世界的利益”，照会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断然拒绝。以后，美国仍一再表示“遗憾”和“失望”，但都已无济于事了。

富尔访华归国后，法国政府外交部即指派官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指定的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继续进行接触。经过几番磋商后，中、法两国政府于1964年1月18日达成协议。1月27日，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声明在30个月内双方互派大使。

紧接着，台湾国民党当局在法国的“代办”向法国外交部发出了“抗议”照会。2月10日，法国政府声明：即将到达巴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使团将是中国的外交代表，因此，台湾当局的“外交使团”便将失去存在的理由。

中法建交后，双方迅速任命了各自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黄镇和吕西安·佩耶。佩耶于5月27日抵达北京，31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呈递了国书，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气氛友好的谈话。6月6日，黄镇在巴黎向戴高乐总统呈递了国书；19日，戴高乐再次会见黄镇，表示希望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

中法关系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中国来说，这是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其政治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两国本身的范围。它对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中法建交后，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也纷纷同中国建立正式

外交关系。原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英国、荷兰也唯恐落后，将同中国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戴高乐自创建第五共和国以来，一直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法国的外交事务，他不仅是杰出的外交家，而且是外交战略家。他为了法国的根本利益，不顾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敢于打破“情面”，敢于为天下先，采用主动出击，长驱直入的方针，速战速决地解决了中法建交问题，从而为法国在东西方关系中争得较大的活动余地。这以后，以奉行独立政策为基本特征的戴高乐主义，不仅在法国延续下去，而且越过边界，对西欧产生了强大影响。

当然，在中法建交谈判中，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最高领导层，亦用积极的姿态以顺水推舟，这才促成了中法关系史上的重大突破。双方因为都抱着诚意，因而虽有分歧，但最终都采取了明智的现实主义立场，互作妥协让步，使之获得成功。

中印冲突我方主动停火 有理有利争取和平解决

1962年11月21日24时，中印边境。正在胜利推进的我参加自卫反击战的各边防部队接到了北京总参谋部用特急电报传达的命令。命令说：

“为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中央决定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我军决定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20公里地区。遵此，现将部队下一步行动部署如下……

总参谋部

1962年11月21日24时”

中印之间约有2000公里的边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过，但在历史上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却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这条边界西段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中段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东段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它一直受到两国人民的尊重。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背着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会外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团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划了一条“麦克马洪线”，企图把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中印两国边界的传统习惯线由此遭到破坏。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野心，不断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蚕食中国领土；与此同时，又连续在边界挑起武装冲突，打死打伤我军军民，在我境内设立哨所。我国政府一直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态度。为了缓解中印边境危机，达到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境争端的目的，1960年4月，我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率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出访印度。

在此之前的2月，当中印双方决定于两个月后在新德里举行边界问题谈判时，周恩来在北京主持拟定了《中印两国总理关于边界问题会谈的方案(草案)》，方案分析了会谈的前景，提出了我方的会谈方针。

4月10日，临行前的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二届第二次会上指出：从原则上来说，我们作三种准备。第一，“作最坏的准备，就是不欢而散，谈不出任何结果来；甚至于里面谈不成，外面是西红柿、鸡蛋来示威。”第二，“没有结果，或者略有结果，我们也没有损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宣布我们的主张，而印度不同意嘛！”第三，“最好的情况，就是达成好的协议，如同中缅、中尼一样。”但是，“按照现在的情况估计，不大可能。”因为印度把话说得太绝对了，“这个180度的弯子，要印度马上转过来，不那么容易。”

去印度前，周恩来有目的地先去缅甸访问，因为中缅双方在年初签署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他想以此向印度先打招呼并作提醒：既然中缅边界和中印边界问题有相似之处，而中缅可以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为什么中印两国不可以照此办理呢？

可是，中国政府的一番诚意与周恩来的一片苦心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理解和回报。

1960年4月19日下午，印度首都新德里上空阴云密布，细雨霏霏。弥漫升腾的水汽犹如浓厚的雾霭，笼罩着整座城市。国际机场上的各色信号灯，也失去了往日的绚丽光彩，远远望去，是一片朦朦胧胧的光晕。

17时30分，周恩来、陈毅率代表团从仰光飞抵这里。周恩来走出机舱，环顾机场，下意识地感到此次谈判前景不妙，因为在机场迎接的基本上是各国驻印外交使节，再加上表情跟天气一样阴郁的尼赫鲁和他率领的屈指可数的政府官员。

在机场的欢迎仪式只进行了25分钟，便匆匆结束了。很快，迎接中国代表团的车队沿着空荡荡的大街，驶向来宾下榻的总统府。

从4月20日到25日，周恩来同尼赫鲁会谈7次，累时达20小时以上。但由于尼赫鲁态度强硬，毫无转圜余地，会谈变成双方各自重复阐述各自的观点。原本特别擅长从分歧中寻找共同点的周恩来费尽心思，也才凑拢起包括“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等6个共同点；但待中印发表联合公报时，尼赫鲁连“双方边界存在争议”这个客观事实也不愿承认。最后写入联合公报的只有两条协议，一是双方官员会晤审查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二是在审查期间，双方应避免在边境发生摩擦和冲突。事后周恩来对一位记者说：“我一点也无法使尼赫鲁松动。我想他已下定决心了。”

谈判结束后，为了使各国外交使团和舆论界对中印双方立场有进一步的理解，周恩来曾提议和尼赫鲁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但遭到拒绝。周恩来于是决定单独行动。

4月25日晚7时20分，周恩来、陈毅率代表团全体成员在总统府圆柱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用睿亮的双目扫视了一下会场，然后开始了45分钟的讲演，他的语音沉稳，略带沙哑，却极富魅力。台下的记者在笔记本上“唰唰”地记录着。

周恩来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后，情真意切地说：“中国、印度，都有着5000年的古老文明，印度的圣河佛殿、经典颂文，曾经给中华民族的成长注入过丰厚的营养；中国的四大发明，特别是造纸术和火药，也为印度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做过贡献。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和平相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战争。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有辜负列祖列宗的遗憾，对下贻害后世子孙。”

可是，尼赫鲁和他的军人们并未被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所打动。两年以后，即1962年的10月12日，尼赫鲁下达了将中国军队“清除出去”的命令。印度国防部长、自诩为“当代拿破仑”的梅农，也叫嚷说：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条枪。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毛泽东遂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战。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了这场正义的自卫反击战。在战争指挥上，许多重要的作战电报都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有的当事人回忆说：“自卫反击战的指挥部设在中南海西花厅。反击战期间，总理每天都要询问战事，出门归来第一件事就是问反击战的情况，并随时与前线取得联系。”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在讨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作战原则时提出：自卫反击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从政治上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一次紧密服从政治、外交斗争的军事行动。为此，周恩来等认为：“打是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好不能和，打过火了也影响和。”“打了不撤也有理，撤了更有理，撤了还要准备再打。”

自卫反击战从10月20日正式开始，主要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进行。战争后期，11月17日，周恩来给亚非20多个国家的首脑写了一封长达20

多页的致函，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原则立场，表达了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的愿望。

11月20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进行了一次对话；

“一边是军事仗，一边是外交仗，都要争取主动。我看打得差不多了吧？”毛泽东问。

“总参送来的报告，部队士气高昂，东、西两线都推进得很快，已经到达传统习惯线，歼灭敌人5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

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基本上是歼灭战。”

“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周恩来带着商量的口吻说。

“这叫做‘见好就收，以观后效’嘛！”毛泽东向着周恩来会心一笑。

到11月21日，我军歼灭了入侵的印军大部，残部逃回印境。（据印度国防部1965年发表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印度陆军损失的数字，为死亡1383名，失踪1696名，被俘3968名。）11月21日，在周恩来授意下，我国政府发表声明，从次日零时起中国军队单方面实行停火，并开始分阶段主动后撤，撤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以北地区。

11月22日晨，在新德里的报纸上，印着一行醒目的大标题：“中国单方面宣布就地停火，并马上撤兵。”

内政部长夏斯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国人宣布就地停火了！”

在总理府，尼赫鲁得到的消息要早于报纸。他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当然明白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图。

不久，中国政府又宣布了关于战俘的处理决定：1.分两批释放全部战俘；2.于12月19日交还缴获印军的武器装备。这表明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也创造了和解的气氛。外电对此反映强烈，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世界罕见的战争”。战后，周恩来多次约见印度驻华代办班纳吉，阐述中印边界真相和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又以外交部副部长黄镇为自己的特使，前往缅甸、锡兰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阐明中印边界的历史和现状，并分别写信给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交换意见；还分别邀请参加科隆坡会议（由阿联、加纳、缅甸、锡兰、柬埔寨、印尼参加的讨论中印边界冲突解决办法的会议）的6国代表来北京会谈，交换意见，寻找解决的办法，等等。

遗憾的是，这以后印度并未认真吸取教训。中国军队后撤后，印军自1963年开始，又逐步向前推进，继续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大片领土。对此，中国政府仍以维护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为重，继续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30多年来，尽管中印两国进行了多轮会谈，但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中印边界问题仍无长足进展。

但是，中印边界战争后，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和政治地位却一落千丈，不结盟运动几乎瓦解了。他原已年迈的身体又遭诸病缠绕，精神沮丧。公开化的批评和攻击与日俱增，有人公开叫他下台……1964年1月8日，在布巴内斯瓦召开的国大党年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尼赫鲁突然中风，左侧瘫痪。1月26日到4月2日，在征得尼本人同意后，秘密为他的健康举行了宗教祈祷仪式。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的心脏病猝发，在家中去世。死时76岁。

1962年11月24日，也就是在我国宣布“主动的停火、主动的后撤”后的第四天，周恩来在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详细报告了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我们对印度的政策，并回答了人

们关心的十大问题，从中解释了我方政策，在谈到“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时，周恩来讲道：“我们的策略总的要‘有理、有利、有节’。这六个字的原则，要掌握得非常之纯熟，非常之熟练。印度对我们挑衅这样久了，我们才发动自卫还击，这才更有理，也就更有利，现在给这两次大打击、大暴露以后，我们又节制住，主动停火、主动后撤，这就是有 1963 年 4 月 24 日，周恩来又对前来调解中印冲突的埃及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谈到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

（一）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

（二）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决不会先对人家不好。

（三）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我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

（四）“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这时候，将发生两种可能：一种是有远见的人会考虑这不是软弱可欺，应该谨慎；另一种是有人可能视我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

周恩来还说：“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中国政府对中印边境问题的处理，自始至终贯穿了毛泽东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六字策略以及周恩来的四点哲学思想。它们应是马列主义同中国传统智慧的卓越的结晶。

古巴导弹危机 美苏各自让步

在号称“美国后院”的加勒比海地区，有一个名叫古巴的国家。1962年10月，美、苏双方几十艘舰艇、上千架飞机、数百枚核导弹在以此为陆、海、空上紧张对峙，一触即发。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竟发出悲叹，称自己不知“还能再看到多少次日落”；美国总统肯尼迪甚至说是“人类的末日”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则抖擞精神，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式……

1959年初，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古巴人民推翻巴蒂斯塔亲美独裁政权，成立了社会主义的古巴革命政权。两年多后，美国派遣雇佣军于猪湾登陆，干涉古巴革命，结果被卡斯特罗打得落花流水。这使新上任的美国第35届总统约翰·肯尼迪大丢脸面。美、古之间从此成为冤家、死对头。于是，肯尼迪下令泰勒将军起草一份绝密报告，包括颠覆古巴政权、暗杀卡斯特罗、美军全面入侵诸项内容，随后又制定了代号为“獾”的详尽的颠覆计划。

卡斯特罗很快感觉到形势危急，于是派自己的胞弟、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前往苏联，向苏联首脑通报美国的颠覆阴谋，请求援助。卡斯特罗深知苏美两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现实，古巴已作为美国身边的一个叛逆者受到威胁，苏联决不会坐视不管。

在莫斯科，尼基塔·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劳尔·卡斯特罗一行，他们认定社会主义的古巴正面临美国入侵的威胁，已处于生死关头。如果听任美帝国主义恣意为摧毁古巴，那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将威信扫地。于是赫鲁晓夫慨然应允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包括古巴所要求的导弹。

那么，赫鲁晓夫为什么会贸然向古巴提供导弹呢？他后来在其回忆录里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在我访问保加利亚期间，我想到了在古巴装置核弹头导弹的主意。而且要在美国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动前不给他察觉这件事。我知道首先得和卡斯特罗谈一下，说明我们的策略以便取得古巴政府的同意。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秘密地装置导弹，如果在导弹已经装好可供发射之后才为美国发现，美国人在试图用军事手段摧毁我们的设备之前就得仔细考虑考虑。我知道美国能够毁掉我们的某些装置，但不是全部。如果有四分之一，甚至只有十分之一的导弹能够留下来——即使只留下一、二个大的导弹——我们仍旧能够击中纽约，而纽约势将所剩无几。我不是说纽约的人会死光——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是一大部分人将不会存在了。我不知道究竟要死多少人，这是应该由我们的科学家和军事人员来计算的问题。他们专门研究核战争，懂得如问计算像纽约这样规模的城市遭受一次导弹袭击的后果。但这都是题外之事。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古巴设了导弹就可以抑制美国对卡斯特罗政府采取轻率的军事行动。除了保护古巴，我们的导弹也可在达到西方所谓的“均势”中起些作用。美国人用军事基地包围我们，用核武器威胁我们，而现在他们就会知道当敌人的导弹对准着你的时候是什么滋味，我们干的也不过是小小地回敬他们一下。现在正是让美国人知道自己的国土和人民遭受威胁是什么味道的时候了。

“在保加利亚期间，这些想法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我踱来踱去；深思

着该怎么办。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人，我精神上的苦恼只让自己知道。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在古巴设置导弹的想法逐渐在我心中成熟起来。从保加利亚回莫斯科后，我继续考虑此事的可能性。最后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我说在古巴问题上我有些想法要谈谈。我讲了上述的全部设想。我是从卡斯特罗刚刚击退反革命入侵的角度提出我的观点的。我说如果指望无可避免的第二次入侵也像第一次那样计划和执行得都很蹩脚，那就太傻了。我警告说如果发生另一次入侵古巴，菲德尔就会被打垮，并且指出我们是唯一能够阻止这种灾难发生的人。”

当然，对外，赫鲁晓夫则指示有关部门的宣传，应强调提供给古巴的武器均属“防御性”的，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塔斯社发表公告说：苏联导弹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本土打击世界任何地区的目标，无需在境外建立导弹基地。与此同时，“奥斯姆克”号和“波尔塔瓦”号两艘苏联货船，经过精心掩饰，神不知鬼不觉地驶入了哈瓦那港口，船上装载的正是可以打击美国的中程导弹。

再说肯尼迪得知卡斯特罗派人去了苏联，又见塔斯社如此这般的剖白，以为乃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到底苏联给古巴提供了什么样的武器，是否包括对美国有致命威胁的导弹，肯尼迪自己也捉摸不透。8月29日，在古巴上空飞行的U—2型侦察机报告说，地面发现新的军事设施和苏联技术人员。10月14日又报告说，已探明正在修建导弹发射基地，有一枚弹道导弹出现在发射场上。肯尼迪闻讯几乎不敢相信，令飞机反复侦察核实。10月16日，侦察飞机带回的数千张照片确实无疑地证明：古巴军用机场上停着可携带核炸弹的苏联重型轰炸机。已发现的导弹在16枚以上，射程超过1000公里。据赫鲁晓夫回忆说，“当时已装好的导弹已经足以摧毁纽约、芝加哥和其他大工业城市，不用提华盛顿这样的地方了。……美国还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面临过如此现实的毁灭性威胁。”

不用说，此时的白宫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肯尼迪立即召集政府高级官员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对古巴进行封锁，但在公开场合却称这个行动为“海上隔离”，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封锁”一词。

10月22日晚7时，肯尼迪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严峻指出在古巴存在着苏联的进攻性导弹和战略轰炸机，它们可以有效地打击西半球的大多数重要城市，已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明显威胁；政府将下令美国海军对古巴实行全面隔离，全球美军进入战斗状态。美国政府还发出最后通牒，强烈要求苏联必须撤走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和轰炸机。肯尼迪的讲话震动了全国。不少人感到大难临头，惊恐万状，不知政府能否化险为夷。那些不满现状、浪荡不羁的嬉皮士们，则猜想天下即将大乱，会有好戏可看，兴奋得奔走相告。10月23日，肯尼迪还下令美国海军拦截和检查开往古巴的船只，特别是苏联船只。在与古巴只有一水之隔的佛罗里达半岛，军港、兵站和空军基地一片紧张与繁忙景象，核导弹潜艇纷纷进入发射水域，满载核炸弹的B-52轰炸机随时准备起飞。美洲上空战云密布，全世界为之惊恐不安。

面对战争威胁，古巴共产党总书记、政府总理卡斯特罗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静。他在电视上发表了1小时20分钟的讲话，谴责肯尼迪的“海盗行为”，号召全民总动员，武装起来，准备迎击入侵者。遍布哈瓦那街头的红色标语上画着威武的手持机枪的战士，正向人民召唤。卡斯特罗说：假如美国这条吃饱的鲨鱼把古巴当做一条可以随时吞噬的沙丁鱼，那它就错了。

那时各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纷纷表示支持古巴。中国的年轻人中流行一首古巴歌曲，歌词唱道：“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而美国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盟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政府则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苏、美两国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安理会吵得一塌糊涂，只好休会了事。与此同时，苏联还命令全部苏军进入战斗准备。苏外交部也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挑动战争……。

卡斯特罗未想到的是，这场导弹危机到头来演变为美苏两国的对抗，古巴反倒被搁在一边了。对抗最紧张的阶段，美国 16 艘驱逐舰、3 艘巡洋舰、1 艘反潜艇航空母舰和 6 艘运输舰从佛罗里达到波多黎各划成一个弧形，组成封锁线。800 架 B—47 型轰炸机、500 架 B—52 型和 70 架 B—58 型轰炸机已关闭炸弹舱准备起飞；90 架 B—52 型携带 25 至 50 兆吨当量的氢弹也运上了发射台。

其时，从加勒比海到墨西哥湾，从北边的佛罗里达海峡到南部的向风海峡，所有通道都被美国海军控制，古巴与外界之间被划出一片辽阔的隔离区。然而大西洋海面上。苏联船只正若无其事地朝古巴方向行驶，波罗的海舰队也正升火待发。部分苏联船只已经逼近封锁线，毫不理睬虎视眈眈的美国军舰。

24 日，一艘苏联潜艇带着两条苏联货船大模大样闯入封锁区。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当即下令：阻止苏联船只，如有必要可用小型深水炸弹攻击该潜艇。战争一触即发，全世界紧张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肯尼迪却通过其弟罗伯特·肯尼迪以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赫鲁晓夫递交了一封亲笔信。据赫鲁晓夫回忆说，肯尼迪总统恳求赫鲁晓夫主席接受他的要求并且请他考虑到美国制度的特点。即使总统本人非常反对发动对古巴的战争，但是会有一连串无可挽回的违反他意愿的事情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总统直接向赫鲁晓夫主席呼吁，希望他帮助解决这次冲突。如果这种局势再继续下去，总统就不能肯定军方是否会推翻他而夺取权力。因为美国军队可能会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赫鲁晓夫说，当时他并没有忽视这种可能性。“我们知道肯尼迪是一个年轻的总统，也知道美国的安全的确受到了威胁。我们早已感到总统会有对军队失去控制的危险，而现在他本人向我们承认了这一点。肯尼迪的信迫切地重复了美国人的要求，要我们把导弹和轰炸机撤出古巴。从信件的语调里我们可以感到美国的紧张气氛的确快要达到极点了。”

如果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信诚如赫鲁晓夫所描述的那样，那么，这也可视作肯尼迪的一种讹诈手段。据《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英译者与编辑者斯特罗勃·塔尔伯特的介绍，当时并“没有什么证据说明总统是由于害怕军队接管权力而采取行动的。”

但当时赫鲁晓夫确实是准备让步了。他虽然将核导弹运进古巴，却只是为了吓唬一下美国佬。可是，如果美国“战争贩子”真正破罐子破摔，发动战争，岂不是弄巧成拙，违背初衷了么？在那些日子里，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们考虑再三，终于在 10 月 26 日由赫鲁晓夫向肯尼迪写去一封亲笔信，称“我们都是正常人”，不会发动战争，同意撤出导弹和轰炸机，条件是：“总统要向我们保证美国军队或任何其他军队都不入侵古巴。”古巴导弹危机便这样以双方的让步而宣告结束。

当卡斯特罗得知这个结局时，正在同格瓦拉谈话，一种被抛弃、被耍弄

的感觉使他暴跳如雷，当下便破口大骂，用脚猛踢墙壁，并将一面镜子打得粉碎。随后在哈瓦那大学的一次内部讲话中，还怒气冲冲地骂赫鲁晓夫“没有种”。大学生们则高唱一支现编的歌：

“尼基塔，尼基塔
你给了人家的东西
你不该又收回啊！”

这以后，在美国海军直接监督下，苏联船只装载着拆卸下来的导弹和发射器材缓缓地驶离古巴。古巴导弹危机以苏美双方的让步而告结束。使全世界也松了一口气。

戴高乐奉行独立外交 法兰西退出北约组织

1966年3月7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从巴黎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英国首相威尔逊、联邦德国总统艾哈德和意大利总统朱塞佩·萨拉盖特发出了内容相同的信。信中写道，法国政府决定在本土充分行使主权，将不再参加北约“联合”司令部，因此也不再向北约提供部队。4天后，法国外交部便把上述决定以照会形式正式通知了北约14个成员国。

整个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立时像打翻了一锅粥，陷入从来未有过的混乱之中……

戴高乐的青少年时代一直为圣女贞德的爱国主义与路易十四鼎盛的波旁王朝以及震撼了古老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帝国的威名所激动。不过，戴高乐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来不曾见过这些令人自豪的日子。他只能从“圣母院的夜景”、“凡尔赛宫壮丽的黄昏景色”、“阳光照耀下的凯旋门”、残老军人院穹顶下“瑟缩地颤抖着”的敌军军旗中领略历史上的法兰西的声威！自英国以及德国、美国的先后崛起以后，法兰西便或依傍于它们的光环之下，或偷生于其阴影之中，再也未能高挺起过胸膛，像祖上一样旁若无人地独步天下了。

戴高乐决心重铸法兰西的辉煌。

1958年12月1日，68岁的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59年1月8日，他在巴黎爱丽舍宫宣誓就职，获得重振法兰西大国地位的权力。紧接着，他便向以美英为盟主（实为美国）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发起了挑战。因为法兰西的荣誉决不能容许在这样一个对世界格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军事同盟里充当小伙伴的角色。

早在1958年6月，当他从科龙贝隐居地重返政坛（接任政府总理）之初，就对所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客人——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说，北约组织应该由美、英、法三国共同领导，而不是美、英构成的“两头领导”。他还告诉麦克米伦，法国要制造自己的核武器。

1958年7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来到巴黎，他对戴高乐说，美国知道法国正在制造原子武器，与其法国花那么多钱自己去搞试验，不如由美国提供现成的原子武器，不是更好么？戴高乐回答说，假如美国肯卖，法国当然愿意买；但问题是，美国能够答应这些武器一旦卖给法国就完完全全、毫无限制地属于法国么？戴高乐的反问切中要害，杜勒斯语塞了。因为美国根本就不打算帮助法国拥有原子武器。

这年9月17日，戴高乐即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及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发出正式信函，宣布鉴于法国在安全问题上承担的责任，它应当直接参与大西洋联盟的政治和战略决策；而这类问题过去却只限于美英两家共同决定；随着原子武器的垄断权将不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不久将拥有它），法国更有理由加入北约的最高权力集团。戴高乐提出，联盟的领导权应该属于三家、否则、法国就不再为北约的发展负责，并根据条约的第十二条保留对北约进行改造或退出的权利。戴高乐建议的核心，是要在北约理事会内确立一种“三头政治”的领导体制。

美英先后拒绝了戴高乐的建议。同年 12 月在北约部长理事会会议上，戴高乐的建议也遭否决。

戴高乐一旦下了决心，就绝不会停步不前——特别是他在 1958 年 11 月—12 月的大选中获得成功，拥有了新宪法赋予的特别权力以后。

1959 年 9 月 2 日，艾森豪威尔在赫鲁晓夫将访问美国之前来到西欧，同戴高乐在巴黎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更使戴高乐觉得美国总统满脑子考虑的都是美苏关系的问题，似乎宇宙万物都要围着它转；在西方阵营中最重大的现实便是美国的现实，其他事物都只不过是次要的。

然而戴高乐并不认为，只要美苏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不在话下。他请艾森豪威尔懂得，美国没有权利包办西方所有国家的对苏关系事务。

在核武器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则重提杜勒斯说过的话：美国可以向法国转让核机密，条件是法国同意美国享有控制权。

戴高乐依然坚持：由法国自己掌握这些武器，才会接受转让。他进一步指出，法国一定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和苏联都拥有彼此相互威慑的手段，但它们各自的盟国却没有这种手段，一旦打起来，谁能保证这些原子弹不落在欧洲战场上呢？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无论从地理、政治、战略上看，法国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是以前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的。有鉴于此，法国不能接受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的安排，在核武器方面也必须在英美法三个核国家直接合作的范围内协调原子弹的使用和控制。

1960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3 日，戴高乐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正式访问法国。法苏接近使西方舆论界联想到了 19 世纪的法俄联盟，美国则感到了一种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的不祥之兆。因为那意味着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将发生动摇，起码不能仍像战后初期那样。可是，戴高乐要做什么事情，是不需要美国批准的。在这次会晤中，戴高乐提出应该“在欧洲的范围内依次地推动缓和、谅解和合作”，因而“从大西洋直到乌拉尔在欧洲人之间建立起来往、联系和那样一种气氛”。在这里，戴高乐显然无视美国在欧洲的存在，使美国大为恼火。

1960 年 8 月 9 日，戴高乐再次致函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提议 9 月在百慕大举行三国首脑高级会议，以讨论与建立三国合作体制的有关问题。9 月初，戴高乐收到艾森豪威尔的一封长信。后者在信中逐一批驳了法国的论点，表示：如果法国在拟议中的三国高级会议上以欧洲大陆的发言人自居，那就会削弱美国 and 联邦德国的密切关系，美国是绝对不赞成的。当然，对会议的召开，艾森豪威尔原则上表示赞成，却建议推迟在 12 月举行。麦克米伦的复信同艾森豪威尔的如出一辙，虽然简短些。两封信再次说明了英美“特殊关系”的作用。举行这样的会议，对法国是毫无意义的。戴高乐于是再不提三国首脑会议了。

1962 年中，戴高乐到法国中部视察期间，在利莫日发表讲话强调说，法国在履行其对北约义务的同时，不会让任何别的国家牵着鼻子走，它将在联盟内部实行自己的“意愿”、“行动”和“政策”；法国的目标是“建设我们的欧洲”，而不再是“两个大国”的欧洲。

戴高乐断定，美国绝对不可能允许法国与美国同等地分享在大西洋联盟的领导权。

1963 年 1 月，法国否决了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第一次申请。戴高乐认为，如果把英国纳入欧洲共同体，将不啻在共同体内安插了一匹美国的

“特洛伊木马”。他曾经亲自向麦克米伦发问，英国既然同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而且又可以从广大的英联邦特惠区买到廉价的农副产品和原料，它怎么能够安分守己地作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呢？戴高乐直统统地问麦克米伦：“你们一直吃的是廉价的加拿大小麦，新西兰羊肉，爱尔兰牛肉和马铃薯，澳大利亚的牛油、水果、蔬菜，牙买加的糖等等，现在你们愿意购买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么？”戴高乐对英国毫不留情，他否决了麦克米伦政府的第一次申请，四年以后，戴高乐又一次地否决了威尔逊政府的第二次申请。

戴高乐一方面排斥英国，另一方面则争取联邦德国。在他的外交战略中，法德关系问题占据着重要地位。他认为，既然德国已经一分为二，历史不会允许再出现另一个俾斯麦或希特勒，那么，法国就应该同毗邻的联邦德国结成同盟，以推动西欧联合的车轮。阿登纳则似乎看守了戴高乐的心思，同时也确信联邦德国绝不能没有一个友好的、可以相互倚重的邻居。在1958年9月，即戴高乐重新上台不到四个月，戴高乐和阿登纳在朗布伊埃举行首脑会晤。到了1963年初，戴高乐和阿登纳在巴黎签订了全面合作的法德条约。法德的合作关系，对于奠定西欧联合的格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戴高乐和阿登纳为他们身后的历届领导人作出了样子，在涉及西欧的重大问题时，法德两国总是先进行磋商。

在同苏、德修好以后，戴高乐即加紧了撤出北约军事组织的步骤。在此之前，戴高乐实际已在开始迈出撤退的步伐：

1959年3月，即他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的第3个月上，即下令法国地中海舰队撤出北约军事组织。

6月，拒绝接受美国在法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

1963年1月14日，宣布拒绝肯尼迪“多边核力量”计划。

这之后，1963年6月21日，决定把法国大西洋舰队从北约军事组织中撤出。

1964年5月4日，从北约海军司令部撤出法国军官。

1965年5月，宣布将不参加北约的军事演习。

9月9日，戴高乐举行就任总统以来的第12次记者招待会，第一次暗示法国可能于1969年退出这个组织。

1966年2月2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法国将从现在起到1969年4月4日（北约诞生20周年）止的这段时间里，对于北约的合作关系的现行措施进行反复研究，以便“重建起某种尊重主权的正常局面”，使法国所属的“土地、天空、海洋和武装力量”都只接受法国的管辖。

1966年3月7日，戴高乐决定将他酝酿已久的重大计划向欧美诸强（实际是针对美国一方）予以摊牌：公开声明将退出北约军事同盟。3月29日，法国政府公布了一张具体实施的日程表：

——1966年7月1日起，法国的驻德陆空部队不再受北约司令部管辖，但仍将根据1954年10月23日关于外国军队留驻联邦德国领土的条约继续驻扎下去。同一天，法国人员从北约司令部撤走。

——7月23日，法国在北大西洋防务学院的高级人员和学员在本学期结业后撤走。

——1967年4月1日，北约最高司令部和中欧司令部总部从法国领土迁走。

美国曾经试图争取法国把北约两个司令部总部迁出法国的时限宽限一年，但未获准。

到了1966年10月1日，法国正式退出了北约军事委员这时，戴高乐已是76岁的老人了，却依旧雄心不减，斗志高昂！

戴高乐在他的晚年回首往事时说他最感欣慰的，莫过于在大国角逐中为法兰西民族赢得了荣誉，把法国独立自主的观念锤炼得更加牢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里第一个敢于向美国说“不”的国家领导人。他的退出北约军事组织的举措，给美国霸权主义基础以猛烈冲击。曾任美国驻苏、驻法大使的查里斯·波伦讥讽戴高乐的这种独立自主政策是“我行我素”。其实，这正是戴高乐主义的精髓，是戴高乐为争取法国摆脱美国控制，走自己的路的一种基本谋略。

当然，在那个岁月里，在西方世界里，戴高乐是孤独的。正如他自述的那样：“每当我正确的时候，全世界就都来同我作对。”“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来讲，我的命运就是孤独。”

1970年11月9日，火红的枫橡树落叶纷纷。戴高乐长眠于科龙贝墓地的一口橡木棺材里。不久，著名传记作家马尔罗便将他访问戴高乐的记录整理成书出版，题名为《砍倒的橡树》。书名撷取维克多·雨果诗意：

“噢！为赫丘利焚身而砍倒的橡树，在黄昏里发生何等狂暴的轰鸣！”

戴高乐逝世以后，曾盛情邀请他访问中国（原拟于1971年访华）的毛泽东从遥远的东方向戴高乐夫人发来唁电，向这位“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尼克松识相，从越南撤军 打不赢就走，为捞点面子

1968年夏，美国新一轮总统竞选进入紧锣密鼓阶段。理查德·尼克松认真考虑了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以及越南战争给美国带来的严重后果，制订了比较现实的竞选纲领。8月8日，尼克松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指出：“美国政府的第一项急务是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尔后，他又在竞选演说中，指责民主党政府过去“专心注意亚洲”，主张现在应当“开始较多地注意欧洲”，“从那些我们摊子铺得太大的地区削减我们承担的义务，这样就能够把侧重点放在优先地区。”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尼克松一直宣扬只有他能够就地导致越南和平，而且是光荣的和平。这些主张大大迎合了选民的心理，成为他竞选的有力武器。

1968年11月5日，尼克松以31785480张普选票战胜民主党候选人汉弗莱，当选为第37届美国总统。这时，他便需要坐下来和他的同僚们认真研究如何“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以兑现竞选诺言了。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制定出三种方案供他选择：

（一）升级方案。主张摆出威胁态势入侵北越，这样可把北越军队牵制在非军事区沿线。同时，在海防港布雷以削弱北越的海上供应线。另一方面，放手追逐共军于老挝和柬埔寨境内，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包括炸毁灌溉大堤和使用战术核武器。对此，尼克松认为，这种升级方案将使他的政府一开张就引起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而它所带来的美军的巨大伤亡则将引起美国人民的更大愤怒；同时还将推迟甚至破坏美国同苏联和中国发展关系的任何机会。所以否决了这个选择。

（二）撤军方案。公开宣布迅速而有秩序地撤出全部美军，从而结束战争。这样，共产党方面有可能做出响应，在最后一个美国兵撤离后，归还美国战俘。但是，这样仓促的撤退会使南越阮文绍政权丧失支持而迅速崩溃。所以，这个方案也被否决了。

（三）能实现撤军，又能保持南越独立的谈判解决办法。尼克松倾向于这种办法。

自1962年开始，美国便开始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里，而且越陷越深。倘不能迅速自拔，不仅会面临国内外的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对抗，而且还会对美国长远的战略利益产生严重破坏。因此，尼克松于1969年2月下旬就职伊始，便出访法国，向戴高乐总统求教。戴高乐沉默良久未置一词，后来才说，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应该是同时进行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谈判，直接同越南对话是取得进展的最好办法，并且还要规定一个撤军的时间表。他也不赞成美国过分仓促地撤出。

戴高乐的一番点拨，使尼克松的关于越南问题的解决方案更成熟了。他在《真正的战争》一书里是这样回忆的：

“我一九六九年上任的时候，美国对越南的战略显然需要作根本的修改。我的政府决心制定一种能结束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卷入并能使南越胜利的战略。

“我们的目标是：

——改变从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八年期间战争‘美国化’的状况，集中力量实现越南化。

——优先开展绥靖活动，以使南越人更能够扩大对农村地区的控制。

——摧毁敌人在柬埔寨和老挝境内的庇护所和供应线，以减少入侵的威胁。

——用一种不会使南越垮台的方式从越南撤出五十万美军。

——谈判停火协议和一项和平条约。

——表明如果河内违反和平协议，我们愿意并决心支持我们的盟国；向南越保证，它将继续得到我们的军事援助，就像河内从它的盟国苏联以及在较少程度上从中国得到军事援助那样。”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总统在第一次赴南越访问途中，在关岛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的“尼克松主义”。尼克松说，他的“主义”的核心就是这样一个前提：“遭受威胁的国家应当承担保卫自己的主要责任。这并不是说美国军队不发挥军事作用，而是说，遭到威胁的国家必须要愿意承担提供人力的主要责任。”因此，尼克松在撤军以后，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实现战争的“越南化”。

紧接着，尼克松发表电视演说，建议大部分外国军队——包括美国军队和北越军队，在签订协议之后的一年内撤退，一个国际机构将监视撤军并监督在南越的自由选举。当时，胡志明主席的态度很坚决，提出美军单方面撤出和阮文绍下台是进行认真谈判的先决条件。

于是，尼克松便加紧了对和平声势的制造。1969年6月，他宣布立即从南越撤军2.5万名，以此向北越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尼克松委托一个名叫让·桑特尼的法国商人，给胡志明捎信。信中软硬兼施，甚至说，“在我们共同致力于把和平福音带给勇敢的越南人民的过程中，我们是乐于合作和开诚布公的”；同时，又要让·桑特尼转告对方，如果到11月1日这个最后期限仍无重大突破，美国将不得不采用“后果重大的武力措施”。

这次北越有了反应，建议由基辛格和春水进行秘密会谈。第一次会谈是在巴黎里沃利大街让·桑特尼的一套公寓房间里进行的。但双方不过是重复阐述既定的政策，没有新的发展。

1969年9月3日，胡志明主席去世。尼克松遂在范文同担任总理之前，打出又一张牌，于9月中旬宣布将在年底以前从越南再撤出3.5万人。

在尼克松正在将“越南化”加和平攻势以实现体面撤军的设想付诸实现之时，从1969年冬到1970年春，美国大学、新闻界和人民团体逐步联合起来，爆发了激烈的反对越南战争的大示威。在野的民主党也趁机嘲笑与攻击尼克松的撤军计划。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富布赖特就指控尼克松政府试图用“越南化计划”来拖延战争。

对此，尼克松给自己写下三条对应的纲领：“不要慌乱——不要动摇——不要反击。”他希望把越南战争再坚持两年，最终迫使越南接受谈判的条件，以赢得体面的和平，从而替两年以后即1971年底至1972年的大选增添一个大筹码。

1970年初，基辛格在巴黎同越南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和春水的秘密会谈仍无进展。这以后，柬埔寨发生了朗诺军事政变。尼克松趁此机会征兵侵入柬埔寨，但遭到国内外的强烈谴责。两个月后，即1970年7月1日，尼克松不得不将全部美军撤离柬埔寨。

1972年3月，越南共产党军队发动了全面的、猛烈的春季攻势，解放了越南中部沿海的平定省。尼克松下令国防部，调集一支由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特混舰队，从海上进行炮击；另外出动B—52轰炸机空袭北越，以牵制越共部队在南方的攻势。同时，对供应越共部队武器的苏联施加外交压力。基辛格向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说，是苏联支持越共发动规模庞大的进攻。多勃雷宁则虚与委蛇，表示一俟4月24日在巴黎恢复秘密谈判，越南共产党的代表就将采取积极态度。他还邀请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以便在首脑会议前先同勃列日涅夫讨论越南问题和其他议项目。

尼克松感到越南战争已处于最后阶段。他私下同人谈及越南战争时说：“我得出结论，没法打赢这场战争。当然，我们不能那么说。实际上，看来我们只好说些相反的话，这完全是为了保持一定的讨价还价的本钱。”

为此，尼克松进一步加强了对北越的轰炸，于5月8日下令在海防港布雷并把轰炸地区从北越南部扩大到河内、海防等心脏地带。这就迫使北越方面不得不取消了原定于4月27日的会谈，以示抗议。这以后，尼克松派基辛格前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会谈，希望苏联能对越共施加压力，以实现战争降级或实现最后的解决，但遭到后者拒绝。勃列日涅夫只是同意把美国的建议转达河内。

尼克松鉴于同越南的谈判已经中止，便又宣布封锁北越的一切港口并布雷，妄图切断支援北越的军事供应。

经过三十多月的僵持，1972年8月，基辛格和黎德寿恢复在巴黎的会谈。会谈比预订期限增加一天，就在这一天有了突破。黎德寿提出一项新建议，基本上同意美国的要求，即停火，然后美军在60天之内从南越撤退，并由双方释放战俘。北越不再坚持排除南越阮文绍参加联合政府，而同意代之以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由南越政府、越南共产党和中立派代表组成。建议中还有一条：美国为补偿北越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应对北越提供经济补助。不料，这时阮文绍却站出来反对美国已同意的协议草案。这样，美国也就不可能按预定时间在10月31日签字。尼克松遂打电报给范文同，要求把签字日期推迟到11月20日。与此同时，美国放松了对北越的轰炸，希望以此用“诱饵”。11月14日和11月20日双方终于在巴黎有了两次会谈。

在11月20日的会谈中，基辛格提出更动协议60多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是坚持北越从南越撤出一些部队。黎德寿拒绝这些更动，会谈暂时破裂。尼克松又恢复了对北越的大规模轰炸。双方在同年12月重新谈判，亦未达成协议。12月14日，尼克松再次决定恢复并加强对北越军事目标的轰炸。轰炸于12月18日开始。尼克松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一步是必要的，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虽然这是非常困难的抉择，但是，要求采取这一行动的是战争的现实，而不是缺乏见识者的主观愿望。轰炸打破了谈判僵局，北越人回到谈判桌旁”。经过如此反复的谈谈打打，1973年1月，基辛格和黎德寿重开谈判。

1月23日，双方在巴黎达成协议，同意1月27日开始停火。协议条款的基本内容是，停火后，敌对双方控制各自的地区。美国只要能暂时保住阮文绍傀儡政权，就有台阶了。

至此，美国的“越南战争”整整进行了十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侵略战争中，美国支出的军费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死伤50万人，远远超过了三年“朝鲜战争”的损失。“越南战争”严重地伤害了美国经济的元气，造成

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从此进入“滞胀”阶段。苏联则利用“越南战争”时期而奋力发展经济，扩充军备，特别是核军备，从而自1974年起，形成苏攻美守的局面。幸亏尼克松终于在1973年初在越南实现了“体面和平”，及时地结束了战争，否则，后果会更加不堪设想。

尼克松在战后的美国总统中，其政治眼光与战略判断力应该属于最“优秀”者之一。他懂得美国的战略主攻方向不在亚洲而在欧洲，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越南而是苏联，因此在他的任期内要结束“越战”，从亚洲抽出身来以对付苏联。此外，他也从“朝鲜战争”、以及法国与美国先后进行的两次“越南战争”中认识到，远离美洲的美军亦很难同一个善长游击战、丛林战的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长期周旋。诚如他在《真正的战争》里所说：我们国家没有打持久战的良好条件。……舆论不会继续支持一场拖延不决而没有明显进展迹象的战争。当战争是在远隔重洋的地方进行时，更是如此。二千五百年前，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写道：“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胜利正是美国人民没有得到的东西。因此他能识时务而及时地让美国退出战争，没有让前两任总统所犯的错误继续下去。这叫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当然，他作为堂堂超级大国的国家元首，又须维护国家的体面。于是采取谈谈打打，以打促谈，诱逼结合，且战且退的策略。让战争结束于双方的谈判桌上，而不是单方面的败走麦城。这可以叫做“光荣撤退”吧！

乒乓充使节 小球转大球

1971年4月初。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这里举行。但崇尚宁静的日本人似乎未予多少关注。他们照常徜徉于温馨的樱花树下，流连在朵朵白云与片片红霞间，倾听着伊势湾涛声依旧……突然，来自西岸大陆的一条消息却使他们如闻惊雷：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

于是，这些矜持的日本人心灵里立时像打翻了五味瓶儿。他们敏锐而精明地迅速掂出这条消息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份量。

“事变”最初始自美国乒乓球队队员、圣莫尼卡市立学院学生格伦·科恩与中国乒乓球队队员的交往。4月4日这天，长发披肩的格伦·科恩独自在路边等候汽车接他去体育馆。中国乒乓球队乘坐的大轿车恰巧经过，出于道义，停下来将他捎带上同行。不料科恩却与中国队的著名选手庄则栋攀谈起来，后者竟当场向科恩赠送了一幅1尺多长的杭州织锦表示友谊。这件事使中国队领队很是不安。是啊，中美两国互相敌视了20多年，还从未在公开场合有过这种接触。如果听任下去，会不会闹出什么严重的政治事件？但硬行阻止，亦使他觉得不妥。更令他惶恐的还不止于此：这天，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格雷厄姆·斯蒂霍文竟然在比赛间隙，主动过来搭讪，希望中国邀请他们访华。这位中国领队一回到驻地，便急急向国内发回电传，如实报告，请求指示。听到这个消息，国家体委等即向中央打了一个报告——那是个不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其实，他们均有所不知：美国乒乓球队的行为，正是中国高层早已预料到并希望的。原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直从华盛顿发出含蓄的信号，表示美国准备与他现在所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他一直称“共产党中国”或“赤色中国”）恢复某种联系。

尼克松在1969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时的演说中，曾含糊其词地谈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的新政策。12天后，他在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又说：“本政府正在试探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接着，使作环球旅行，其间的一个重大目的，就是寻求打通中美关系的渠道。

1969年2月下旬，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出访欧洲，他在法国凡尔赛的大特丽爱浓宫与戴高乐总统会谈。那天，他跟戴高乐站在路易十四当年的客厅的大窗户前，一边看着窗外花园的美景，一边谈到苏联，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谈到中国。谈话中他发现，戴高乐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戴高乐曾爽直地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3月底，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葬礼时，尼克松正式请他把自己有意改善中美关系的口信捎给中国领导人。

8月1日，尼克松在拉台尔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举行秘密会谈时说：“我认为，要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又说：“中美两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进一步，他又要求叶海亚把他的想法转达给中国最高一级领导人。

叶海亚说：“我很欣赏您的见地。不过，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依我看，

不是一两次对话就能够成的。当然，我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好友，当尽力而为。”

一条通向中国的“叶海亚渠道”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8月3日，尼克松到达布加勒斯特，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同齐奥塞斯库会谈时，又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在我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齐奥塞斯库亦爽快地答应下来，并告诉尼克松，中国人信仰坚定，说话算数，通情达理。

又一条通向中国的渠道——“罗马尼亚渠道”也建立起来了。尼克松渴望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口信，通过这两条渠道，源源传向北京。而随后出现的一件事情，至今回忆起来都令人捧腹——

1969年12月3日，在华沙波兰文化宫的一个餐厅，举行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因为铁托总统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使南斯拉夫既与东欧共产党国家、又和西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个由南斯拉夫主持的展览会，就成了在华沙外交界少有的东西方外交官相聚的场合。美国驻波兰大使在这种场合，当然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这天，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在人群中，看到了穿中山装的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径直朝他走去。雷阳见状，赶紧后退。斯托塞尔穷追不舍，雷阳只好向主人告辞，带着翻译，走出大厅，下了一段楼梯。斯托塞尔又追到楼梯，用波兰话喊了起来：“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

翻译应了两句，望望雷阳。雷阳不打算跟美国人谈下去，立即下了楼梯，钻进小车驶回大使馆去了。

几位眼尖的西方记者都注意到了这个小插曲。第二天它就传遍了世界。

斯托塞尔急于找雷阳接触，事出有因。原来不久前斯托塞尔到白宫对总统作例行的礼节性拜会时，见到了基辛格。基辛格请他在华沙设法接触中国使节，说美国想恢复中美华沙会谈。据说，此后基辛格又一连给他拍了三封电报，明确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接触中国外交官。大约是斯托塞尔觉得没有接到自己顶头上司国务院的指示，他竟对基辛格的电报置之不理。所以，基辛格在最后一封电报里，不客气地说：“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派愿意照办的人来办。”斯托塞尔这才着急了，于是发生了12月3日他迫不及待地追雷阳的插曲。

至于雷阳，当时一定是对斯托塞尔的这种超乎外交礼仪的异常做法感到无法理解。要知道那时候“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正响初中国大地。造反派已经砸了外交部党委，而外交部长陈毅正在被揪斗呢！那时除可以同阿尔巴尼亚等极少数国家的人关系亲密点以外，驻外使节们私下里是不敢轻易同其他国家的人进行接触的，更不用说对方还是头号帝国主义分子呢！

雷阳未敢与斯托塞尔对话，但却立即将此情况电告国内。周恩来看了电报，禁不住笑了。他批评外交部领导工作不细，情况发生变化后没有通报我驻东欧使馆人员。于是，外交部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电告雷阳邀请美国驻波兰大使到中国使馆来做客、谈天。

一星期后，就是1969年12月11日，斯托塞尔被邀请到中国使馆做客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驻外使馆第一次邀请美国人。

这亦确乎是件出人意料的事情。斯托塞尔接到邀请后可以说是“受宠若惊”。他立即答复说，他将高兴地、小心地从后门进入中国大使馆。雷阳说，

不，你完全可以走正门。斯托塞尔真的乘着小车驶到中国使馆大门口，堂堂正正地从正门进去了，并在“融洽”的气氛中会见了一周前还回避他的雷阳代办。

雷阳宴请斯托塞尔 40 天以后，即 1970 年 1 月 20 日，中断了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又举行了，而且，破天荒地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会谈。而其间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当天中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可是，几个小时以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出来修正他的说法。他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敏感的外交界人士当然注意到，这是新中国自 1949 年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首次用这个正式名称。麦克洛斯基反复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次。

中美大使级会谈，自 1954 年 8 月 1 日开始（先在日内瓦，后改在华沙），延续了 15 年，不过是反反复复地讨论台湾问题、归还债务问题、收回资产问题、在押人员释放问题、记者互访问题、贸易前景问题……讨论了 134 次，毫无结果。

如今，第 135 次中美大使级会谈除了地点是第一次改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之外，在程序上、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新变化。但是当周恩来读到斯托塞尔的发言稿时，从文中两句不那么显眼的話中，发现了新信息：“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到北京去同你们的官贝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你们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或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基辛格看到雷阳的发言稿，也发现了两句颇有新意而又相当含蓄的话：“我们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这些会谈可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级进行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

1970 年 2 月 20 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第 136 次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奥妙和委婉的发言，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一个使节去北京的建议。尼克松深受鼓舞。

接着，尼克松又于 2 月 22 日收到了叶海亚总统的一封信。信中，叶海亚有把握地告诉尼克松，美国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行动已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中国人。叶海亚还说，中国“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场涉及两国一切分歧的实质性对话。”

尼克松十分高兴，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良好；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他以前想象的怒气冲天、头脑们硬的领导人。他当即授命基辛格复信给叶海亚，请他向北京建议，开辟一条比华沙会谈更适于秘密交换意见的渠道。（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巴黎秘密通道”的渠道。它是 1971 年 7 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与周恩来会谈时确定下来的。）

1970 年 10 月 1 日，尼克松在向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发表谈话中，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问中国：“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去。”

尼克松的话已说到这个程度了，豪爽的毛泽东也立即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欢迎他来华访问。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尼克松此时的心境。到 60 年代末，世界格局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尼克松在 1971 年 7 月 6 日（当时基辛格正在秘密访华途中）于堪萨斯城的讲话里所指出的：“从经济角度来说，

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国家，也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当然还有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前途。”但在美国的心目中，主要对手仍是苏联。另一方面，美国发现对中国长达 20 年的封锁和孤立非但未把中国拖垮，反而促使其日益强大。因而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毫无意义的冷战渐生厌倦之情。尼克松认为，倘要打破与苏联的军事均势，就必须迅速结束这种冷战，使中国同西欧、日本一样成为美国的重要伙伴，借以制约苏联。再说，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对于美国急于推销的庞大的技术成果集群与商品集群来说，亦产生了愈来愈强大的诱惑力。至于尼克松本人，也需要以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来增强其连任总统的筹码。

应当说，形势发展到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中、美两大国已到了互相需要的时候了。其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边界领土的争端，中国同苏联、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很僵。周恩来曾对外国记者讲：“假设一下，苏联军队直接开到黄河北岸，美国人开到长江南岸（大概是从台湾或印支出发的），日本占领山东省的青岛，而印度也参加进来占领西藏”，中国四面临敌，顾此失彼，将会是一幅相当可怕的图景！所以，毛泽东同周恩来不约而同地都感觉到：中国的外交政策需要作出重大调整，应转而从地缘政治、国家利益的角度而下能再拘守于“两大阵营对抗”与“推进世界革命”的旧模式来考虑外交问题了。只有这样，方能尽早解除国家所受到的铁桶似的包围。当然，要解除包围，关键还得在中美关系与中苏关系问题上作文章。而自 1969 年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多达 40 多个师的百万大军正屯集于数千公里长的中苏边境线上，双方剑拔弩张，关系一时难以松动。这样唯一有希望的办法便只能是从中美关系寻找突破口了。而只有将美国这个过去 20 年里的头号敌人化作朋友，才能增强自身优势，以遏制苏联咄咄逼人的势头，使世界战略格局进入平衡状态，进而带来中国同包括苏联在内的周边国家关系的缓和。但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行的。要实现外交战略上的这一重大转变，必须中美双方都有诚意才行。当然，这也需要中美双方的高层人士的空前的战略胆识以及善于捕捉对方讯息的敏锐的领悟力和应变力。现在来看，当时中美双方的领导人这方面都表现得十分出色，均可堪称顶尖的战略家和艺术大师。

到了 1970 年 10 月，当尼克松向美国《时代》杂志发表了那一通在有生之年赴华访问的谈话后，即受到毛泽东的回应。

11 月 13 日，毛泽东接见了来访的叶海亚总统。12 月中旬，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访问中国时，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尼克松的信由这两个渠道传到了中国。

12 月 9 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来到白宫基辛格的办公室里，拿出一个信封。大约是为了保密和万一遇到意外时留有否认的余地，信件不署名，也没有任何抬头，全部内容都用笔写在一张印有蓝杠杠的白纸上。希拉利说，他没有被授权可以把这个文件给白宫留下来，只是被允许由他读给基辛格听。他慢慢念，基辛格把全部内容记下来。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

在具有无线电及卫星通讯手段的当代，却采用 19 世纪的外交方式——由一名信使传递、宣读手写的照会，这看来近乎可笑，但又是必须的，只能如此。

基辛格当即草拟回信，经尼克松批准，亦交给希拉利。回信中说，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提议由美中双方代表在巴基斯坦会晤，商谈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

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相互交换信件的办法，成了一种程序，一直进行了好几个月。

后来，毛泽东似乎不满足于这种“小脚女人走路”式的方式了。1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第一次明确地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

毛泽东说：“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

“名副其实的马拉松会谈。”斯诺说。

“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主席愿见他么？”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毛泽东说着，幽默地伸出一个指头，对着斯诺：“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话，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毛泽东和斯诺这次谈话，一谈就是5个小时，几乎是他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

在这之前——10月1日庆祝国庆游行时，斯诺还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并且站在毛泽东身边。他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第一个美国人。第二天经同恩来过问，《人民日报》在版面上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经过特别处理，照片上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这应当是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不过当时竟被尼克松和其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71年4月5日，深谙毛泽东战略意图的周恩来在接到国家体委等关于名古屋“事变”的情况以及“不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建议报告后，当即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同他都很警觉地意识到一个打破坚冰的契机就在眼前。经过一个不眠之夜的反复思考，他们终在4月7日凌晨作出决定：批准中国乒乓球队与美国同行的友好交往，并由中国领队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一天，已经是第31届世乒赛的最后一天。

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一着棋一时令世界舆论惊讶不已。而由格雷厄姆·斯蒂霍文率领的美国队13名队员，此时也是既高兴又纳闷。因为这是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的——虽则他们表示出访华的愿望，实际是不敢奢望变成现实的。

4月7日上午10点半，斯蒂霍文在得到中国领队的口头邀请后，立即请示美驻日使馆。阿明·坎宁大使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个人意见当即送白宫。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决定接过毛泽东、周恩来这一招，批准乒乓球队接受邀请并向世界公开宣告。尼克松感到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而基辛格则隐约

感到他面对的是两位旷世外交巨擘。当然，毛泽东、周恩来为了使中美双方都保持一定的体面，又同时向加拿大队、哥伦比亚队、英国队和尼日利亚队发出了邀请。但是，国际舆论都明白，上述四队只是陪衬，因为他们的国家都同中国有着外交关系。其时，整个世界都在焦急地、百感交集地期盼着美国队的北京之行。

1971年4月10日，格雷厄姆·斯蒂霍文和美国队全体成员一道，怀着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直飞北京的历史性航程，与中国乒乓球队及其他四队一起，同机离开日本列岛。两个多小时后，他们在北京首都机场着陆。此时的北京，正是茸歌燕舞、繁花如海的季节。热情的中国人，正以泱泱大国的周到礼仪，欢迎着这批踏空而来的勇敢的美国朋友。14日，周总理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队及其他四国乒乓球队。周恩来绕场一周，与每支球队的领队依次握手寒暄，然后坐在话筒前向大家发表讲话。他针对面前这些“对中国有点生疏”的美国客人，随口引了《论语·学而》中的一句：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经翻译一译出，开初很是拘谨的美国人顿时松弛下来，全场气氛变得活跃起来。大家天南海北，随意提问，周恩来也一一作答，且妙语连珠。他又一次地向着美国客人说：

“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周恩来还请美国乒乓球队队员们回去后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会见间，格伦·科恩这位“嬉皮士”运动的关注者竟突然想考一考眼前这位豁达大度而且应对如流的中国政府总理。他劈头发问道：

“总理对目前在美国青年中流行很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评论？有什么看法？我很想了解这些。”在场者都颇感意外，因为要让一个与美国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

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人来对隔绝已久，而且是作为“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社会中的怪异时尚作出评价，确乎是太难了。不过，周恩来则对格伦·科恩提出的问题似乎很有了解，而且也表示出其并不赞同“嬉皮士”运动的鲜明立场。但是，他继而话锋一转，开始以一种青年朋友的姿态、促膝谈心式的语调说开来：

“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形式不一定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验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这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方式，是周恩来人际交往的一贯风格。它使周恩来能够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将同对方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

科恩听了周恩来这番话，不由得连连点头称是。他认为周恩来看到了“嬉皮士”运动后面的深层次原因。科恩插话说：“这是一种新的思想，没有很多人熟悉它；可能有少数人熟悉。”不过，周恩来却并不止于此。他接过科恩的话继续阐明说：

“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

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如果自己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改。”

周恩来一席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而又平等亲切的话语，在科恩及全体美国乒乓球队队员心里，荡起久久难息的涟漪。科恩回国后，立即使成了一个致力于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推动者。而尼克松总统，则在4月下旬美国队一回到华盛顿，即于白宫南草坪迅速接见了他们，仔细听取了斯蒂霍文等传递的中国方面的友好信息，并当场要求美国乒乓球协会向中国乒乓球队发出于本年内回访美国的邀请。

美国乒乓球队在中国，被当作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对他们全部活动的安排和宣传，都是周恩来亲自过问的。正如基辛格后来评论的那样：“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

同年7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问中国。

翌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总统乘坐的“七六年精神号”专机降落于北京首都机场。仁立在飒飒寒风中的周恩来大步趋前，同尼克松总统实现了被国际舆论称之为的“世纪性握手”。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同尼克松举行了认真、坦率的会谈。7天后，《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这两个分处大洋两岸，紧张对峙达20多年的世界大国，终于携手破除了坚冰，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共同目标扬帆起航。

同年9月25日到30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也接踵访问中国，与中国方面共同宣告结束“中日之间不正常状态”，正式建立起外交关系。

后来，尼克松在他的那部著名回忆录《领袖们》中感慨道：中美关系正常化时代的到来，中美外交上的突破，“首

先应该归于一个人，就是周恩来。”

中美外交上的这种突破，以后被国际关系史研究者们冠之为“乒乓外交”。它在中国方面的主角，其决策人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而其实践者则是周恩来。在中美建交前夕，我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从表象看，这仅仅是双方体育界的一次民间友好往来，并未多少政治色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精心安排策划的一种非常隐藏的却暗示性极强的信息传播。“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个公开邀请的举动所包含的政治内涵，也只有尼克松、基辛格最能心领神会。它象征着中国已经正式承担起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后来，基辛格曾评论“乒乓外交”说，整个事情都是周恩来的杰作。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风云中，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出发，敏锐和及时地识读出美国方面传递过来的解冻信号，坚决而不失体面地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契机，巧妙地运用一只小小银球的力量，去击破中美两国长达20多年的僵持对立的间壁，从而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引起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 success 突破，为中国逐渐赢得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

“乒乓外交”是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毛泽东与最杰出的外交家周恩来晚年合作的一部经典之作。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利用“乒乓外交”去疏通中国与美国这两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的普通青年、普通人民间的思想文化交流的渠道，架构起思想文化交流的桥梁；并在这种疏通和架构中，充分体现出其无法抗拒的人格魅力。

基辛格秘密访华 两大国关系正常

1971年7月8日，星期四。从越南、泰国和印度访问返程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一行飞到了巴基斯坦新建的首都伊斯兰堡。这天，基辛格及其随员，先到大使馆与使馆人员共进午餐，随后又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会晤。黄昏时分，叶海亚在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举行宴会。宴会一开始，巴基斯坦方面负责接待的外交秘书舒尔坦却十分遗憾地告诉大家：尊贵的客人“偶感不适，肚子疼了。”接着，叶海亚亦宣布：“我原定在这个美好的时刻举行盛大国宴，为我们尊贵的客人基辛格博士洗尘，因为博士先生偶感不适，只好抱歉改期。”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客人恢复，我安排他到北边群山里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

基辛格当时神态迟疑地表示不同意。叶海亚马上恳切地劝说，终使基辛格接受了安排。……

一幕颇似2000多年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绝妙好戏由此开场了。

基辛格巴基斯坦之行其实在掩世人耳目，真正目的是奉尼克松之命秘密访华。众所周知，尼克松一向是坚决反共的。那么，他上台不久，又缘何要急急地向其被称为“赤色中国”或“共产党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频送秋波呢？——这，正是尼克松超出历任美国总统的过人之处。尼克松比较清楚地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5年中，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进入70年代，世界格局已呈现出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五极”均衡的态势。与此相应，美国的外交行为，也应当建立在“均势外交”的基础上，才能较好地改善美国的争霸地位。落实到对华政策的改变上，尼克松提出了三点理由：第一，利用中苏矛盾，以接近中国作为对苏施加压力和牵制的杠杆，诱使苏联对美国让步。第二，同中国取得谅解就很难结束越南战争。第三，鉴于中国力量和影响的增长，中美对立的时间越长，美国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利于美国稳定亚大地区的形势，更难集中力量对付主要对手苏联。早在1967年10月，尼克松就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对于亚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须紧迫地抓住中国的现实。”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二年，即1970年2月，在向国会提出的第一个外交政策报告中又坦陈道：“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显然，尼克松渴望在总统任内结束美中隔绝达20年的不正常状态。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个人的角度来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尼克松都急切地感到变革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而1971年4月中，当第一支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来接见的美国体育代表团——乒乓球队回国后，尼克松便迫不及待地和白宫南草坪上接见了他们。从他们那里，他得到从毛泽东、周恩来那里传递来的更多的讯息。他也跃跃欲试地翘盼着北京向他的政府直接发出的明确的邀请。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4月27日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

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的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本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这个口信使尼克松欣喜不已，但他对“公开接待”感到为难。他认为直到自己出访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之前，事情必须绝对保密，否则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破坏全部工作。事实上，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已经向记者公开声明：他不同意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政策，甚至大叫乒乓球队访华是上了当，是个错误。

尼克松花了两三天时间与基辛格讨论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起先考虑到布鲁斯和诺奇，后来觉得他们都和越南战争搅在一起，可能引起中国的不满，故作罢；而让国务卿罗杰斯去，又恐难保密。最后，尼克松觉得，只有基辛格是最可靠的人选。对此，基辛格十分高兴。后来基辛格曾开玩笑：

“理查德·尼克松真有胆量，他派我一个人去，到时无法同国内联系，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卖掉啊！”

加利福尼亚州，阳光下的金色之州。尼克松是担任总统的第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人。他当选总统后，在这里的圣克利门蒂设置了“西部白宫”。基辛格也在附近的棕榈泉搞了一幢私人住宅。5月上旬，尼克松总统批准基辛格去。“休假”，基辛格就飞到棕榈泉的私人住宅里躲了起来，名义上是“休假”，实际上是甩开日常工作，避开新闻界的耳目，积极准备去中国访问。

基辛格从华盛顿带来了一大包关于中国的各种书籍，还有他的助手们为他准备的一大本一大本的关于中国的资料。除了研究这些资料，他躲到这里更重要的目的，是秘密安排取道巴基斯坦与中国代表会晤的具体计划。

5月3日，他曾经通过秘密渠道向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约瑟夫·法兰传去了一个信息：“为只有总统和我知道的非常敏感的原因，总统希望你找点个人的……借口，立即返回美国，以便你能和我会谈……”

法兰大使向国务院请了一个假，说回国办点“私事”，就按基辛格约定的地点，飞往洛杉矶来了。

5月7日上午，班机抵达洛杉矶。法兰还没出机场，就被一位自称是基辛格朋友的人领上一架私人小飞机，不久飞到棕榈泉。基辛格正在私人住宅里等他。基辛格笑着十分满意地跟法兰握手：“你好，大使先生，总统也会感谢你的到来。我们谈完后，马上送你回洛杉矶飞机场。”本来就为这次神秘召唤感到迷茫的法兰，更加愕然了。基辛格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了法兰。法兰可是吃惊不小。当他知道基辛格与中国人谈判将由他做具体安排时，深为总统和顾问的信任感到喜悦。

基辛格说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具体计划：“我将从华盛顿出发作一次‘了解情况’的出访。我将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伊斯兰堡和巴黎。我的飞机上不带新闻记者。我在预定停留的地方都不举行新闻发布会，但是都举行了解情况的会议。……我将于星期五上午到达巴基斯坦，由你出面张扬一下，安排我一整天的活动，既在大使馆也在巴基斯坦政府露面。如果叶海亚总统同意，他可以请我到合适的幽静的地方度周末。我将让我的飞机停在飞机场一个显眼的地方，然后，我将乘一架预先停放在机场的飞机到中国去。在我不露面不超过36小时以后，我将引人注目地重新露面，然后飞往巴黎。你看，我计划中的这一切能办得到吗？”

法兰充满信心地说：“能办得到。”

谈罢话，基辛格将法兰送至屋外。基辛格那个朋友已经笑眯眯地等在院子里。基辛格跟法兰握别的时候，笑着提醒他：“你记住，你到棕榈泉这儿来过的事是无案可查的。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也不知道。”那个朋友朝他诙谐地双手一摊，耸了一下肩膀。

送走法兰以后，基辛格草拟发给周恩来的回信。信中说：“……为了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的秘密会谈。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

5月9日，基辛格在棕榈泉“休假”结束回到华盛顿。第二天尼克松看罢给周恩来的回信后，批准照发。

这以后，尼克松如坐针毡般地等待北京的回复。直到5月31日，美国才收到叶海亚总统的口信；两天后，即6月2日黄昏时分，基辛格方从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手上接过通过外交邮袋传递来的周恩来的回信。他紧张得手有点发颤。那两页纸的信上写道：“……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喜悦的心情难以形容。他送走了希拉利，赶忙走到正厅去通知尼克松。这时总统正在宴请外宾。基辛格焦急地在厅廊里来回踱步。大约9点半钟，总统出来了。基辛格急不可耐地说：“来了！来了！周恩来的复信来了！”

总统读了信，禁不住眉开眼笑。基辛格望着尼克松：“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两人都兴奋异常。尼克松拿出一瓶未开封的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与基辛格对饮，同贺这个“颇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尼克松兴冲冲地举起杯对基辛格说：“亨利，祝贺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说：“我们为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吧！”

“波罗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1971年7月1日晚8时，基辛格一行乘坐一架波音707军用战术指挥机，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基辛格的随行人员包括主要助手温斯顿·洛德，他年纪轻，笔头快，博学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他是职业外交官，会讲中国话，曾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过；亚洲问题专家理查德·斯迈泽，公认的国务院主要的日本问题专家；还有特工人员约翰雷迪和里·麦克劳德。他们此行是以公开出访亚洲四国，而秘密飞往北京为使命的。

飞行两天，7月3日到达西贡，7月4日到曼谷，7月6日抵新德里。在

访问会谈中，自有官员簇拥、新闻记者围绕。下一站就是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了。按照已经公布的行程表，他们应该在巴基斯坦停留 48 小时，大致相当于在印度停留的时间，但为了执行秘密任务实际上需要 72 小时。那么延长的 24 小时将以什么为借口呢？基辛格早想好了办法——一到伊斯兰堡就装病称肚子疼，还要装得越疼越厉害。没有想到，还没有离开新德里，基辛格真的肚子疼了。他自我解嘲地对洛德说：“我这个凡人，如此放肆他讲假话，上帝要惩罚我了。”洛德也急了：“天报应，弄假成真了。明日你到伊斯兰堡还拉肚子，波罗计划岂不吹了？”

基辛格苦笑一笑：“只好咬咬牙，强顶过去。”

戏到这里才只演了一半。第二天——7 月 9 日凌晨，基辛格戴上一顶大沿帽和一副墨镜，在舒尔坦的带领下，悄悄离开宾馆。他走得太匆忙，甚至忘记了带上换洗衣服。

去机场一路顺利，不巧的是，这时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基斯坦的特约记者贝格正好在机场。他一眼就认出了基辛格，不禁大吃一惊，忙问机场负责人，而那位负责人无意中泄露了天机。

贝格喜出望外，扭头就走。据说，他当即向伦敦的报社发了一条急电：“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 7 月 9 日凌晨 4 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 707 飞机飞往中国。”但伦敦的值班编辑不敢相信，以为贝格喝醉了，他随手把这份电搞插到废稿签上。

而此刻伊斯兰堡还在“演戏”。一队没有基辛格在内的迎送基辛格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山间别墅。舒尔坦还特意请了一位连基辛格照片都没见过的巴基斯坦医生来给贵宾看病。叶海亚不露声色地组织军政高级官员去别墅看望基辛格，而舒尔坦则十分抱歉地一一挡驾，说贵宾正在休息。

7 月 9 日，北京时间 12 时 15 分，基辛格一行乘坐的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叶剑英、黄华等前来迎接。从基辛格当时在南苑机场的表情看，心情是忐忑不安的。他那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膛肌肉紧缩，没有一丝笑容。

客人被安排住进钓鱼台国宾馆 6 号楼。第一顿饭是叶剑英举行的盛宴，使基辛格不免大吃一惊。他从来没见过这样丰盛精美的宴席。

下午 4 点钟，周恩来来到钓鱼台，基辛格和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接，他们排成一行，各个垂手站立，表情僵硬，似乎有点手足无措。

周恩来微笑着握住基辛格的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

“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基辛格说着，把自己的随员一一介绍给周恩来。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应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本来紧张、拘束的客人，一下子变得活跃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

会谈开始了。基辛格先是十分谨慎地打开材料汇编的厚皮封面，按事先准备的密密麻麻的讲话稿，干巴巴地念了起来，他甚至从 1784 年美国商船“皇

后”号到达广州黄埔港说起。念着念着连基辛格自己也觉得太枯燥，干脆丢下稿子随便说了。当说到中国对他们来说是“神秘的国土”时，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大概也正是这种神秘感，使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吧？

周恩来谈到两国的分歧，谈到台湾问题，又说到他大致同意尼克松7月6日在堪萨斯城讲演提出的当今世界存在“五极”的观点。

“五极”？基辛格愣住了。原来他在旅途中未得到通报，还不知道总统又发表了新观点。周恩来敏锐地发现了，真诚地为对方介绍了他们总统这次讲话的内容。这使基辛格十分感动。

这次会谈到晚上11点20分才结束，双方把时间花在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彼此谈笑风生，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甚至对那个必须做出决定的——尼克松访华问题，双方都表现得若无其事。

然而，当基辛格回到自己的卧室时，心情是沉重的，因为他只能在北京停留48小时，只剩下明天一天了。

基辛格只能在北京逗留48小时，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同样感到紧迫。第一轮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马上带着王海容、唐闻生、熊向晖，到毛泽东那儿汇报，听取他的指示。毛泽东却将基辛格来访的事搁在一边，首先要熊向晖汇报“参谋总长”黄永胜的检讨情况，而且询问得十分具体。至于同基辛格会谈的事，毛主席说：“我看，台湾问题事小，世界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7月10日上午，黄华陪同客人参观故宫。基辛格与黄华一边参观，一边交谈：“总统跟我不止一次地设想我们会谈的情景，以为你们会大声拍桌子叫喊着打倒美帝，勒令我们立即滚出台湾，滚出日本，滚出东南亚，不然就不能坐下来谈判。”基辛格说。

黄华听了哈哈大笑：“真的么？”

洛德说：“我证明，博士的话是真的。”

大家在青铜狮子前合影留念。走热了，都只穿衬衫。基辛格整理了一下衬领，脸上露出神秘莫测的一笑说：“我们在紫禁城里照相，‘台湾’却和我贴得那么近……”美国人都哈哈大笑。黄华诧异，不知是什么意思。斯迈泽朝黄华耳语：“他忘了带衬衫，穿了霍尔德里奇带来的台湾产的衬衫。”黄华这才发现，基辛格穿了件又肥又大的衬衫，显出一副狼狈相，也开心地大笑起来。

下午第二次会谈，讨论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以及国际形势问题，双方观点尖锐对立，气氛显得紧张。晚饭后讨论到尼克松访华问题，气氛缓和了。下半夜由黄华与基辛格讨论并起草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报，比较融洽。

7月11日上午第三次会谈。黄华提出的联合公报草案，由于设身处地考虑了对方的观点，基本上为基辛格所接受。双方同时发表公告的时间，也采纳了美方提出的时间：7月15日。之后，讨论今后联系的地点，双方都赞同定在巴黎，由尼克松总统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法大使黄镇接头。

基辛格此行的最后一次午餐是十分愉快的。紧张的气氛烟消云散。叶剑英在送行的宴席上也露出了笑容。

基辛格与助手们兴高采烈地飞回巴基斯坦，除了带走双方认可的联合公告，还带回了中国人送的中国菜、毛泽东著作英文版及这次访问的照相集。

基辛格回到伊斯兰堡，又大事张扬一番，随即乘机飞往巴黎。在机上，按预定代号给尼克松发了电报，报告访问成功。

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舒尔坦后来说：“基辛格去时忧心忡忡，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判若两人。”

再说美国。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这两天，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一直沉浸在兴奋喜悦与焦急不安相交织的心情中。

7月13日7点刚过，尼克松就走出别墅，来到直升飞机起落场。等了一会，天空中传来螺旋桨的声音。基辛格回来了。

7月14日，尼克松让基辛格与洛德为他准备一篇同公告一起发表的讲话，将两年来的策划、工作和期待最后凝聚为400个字。

7月14日太平洋时间下午2时45分，西部白宫按总统指示发出了一个通知，说5个小时以后总统要发表一篇“事关国家大局的重要的”简短公告。傍晚，尼克松和基辛格乘直升飞机飞往洛杉矶，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傍晚7点整，尼克松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晚上好！”总统开始讲话了：

“我要求占用今晚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作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刚念完《公告》，电视镜头马上转向在场的评论员。这些人都怔住了，个个显现出目瞪口呆、大为吃惊的神态。

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都吃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尼克松心中像受到一股股暖流的冲击。他喜气洋洋，好像过节一样。这天深夜，尼克松和基辛格喝得脸红红的，乘直升飞机回到圣克利门蒂。国务卿罗杰斯向尼克松汇报，电报已开始像潮水一样涌来，祝贺的、批评的、建议的、提要求的……

公报发表3个月后——1971年10月22日，基辛格又一次访华，继续为最高级会议进行预备性会谈。此次北京之行，代号为“波罗二号”。这次来华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具体安排，主要是谈判尼克松访华的公报，并进一步推动政治和解。

10月23日，基辛格一行，轻松地在主人陪同下去尼克松将要参观的地方——长城、明陵和颐和园游览。

10月24日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过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周恩来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的基本分歧，不能用外交语言掩盖这些分歧，伪装一致。很显然，周恩来更喜欢简捷明了地阐述两国政府的观点，即使有些观点是不可调和的。而基辛格竟也十分赞赏和佩服周恩来这种中国式的独特做

法——确定一项合理的解决办法，一步就跨到底，然后坚持立场不变。

10月25日，双方会谈经美方修改的、我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在讨论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阐述观点有理有据，基辛格无言以对，只好转动着铅笔。周恩来这时豁达地说：“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100年，是表明我们有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基辛格觉得这是有世纪眼光的巨人的话。他不得不佩服周恩来，佩服毛泽东。然而，他也不得不强调：“美国不能抛弃老朋友。”

基辛格意识到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退让，也意识到明天离开北京的时候，这个关键问题没有一个大约的结果，将使他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他侧头看了一眼洛德，使了一个眼色，将洛德扯离座位，两人到会议厅另一侧的角落去商议。他们嘀咕了好一会儿，回到谈判桌上来。基辛格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原来绷紧的脸已经放松了。他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稍稍停顿，他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也绽开了笑容，称赞地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

10月26日，天还没全亮，只有4点多钟，中美双方又继续讨论公报，修饰文字。这就是以后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的框架协议。只有关于美国和台湾有防御关系的那一段未作决定，但是双方的立场已经接近了，准备留待尼克松访华时进行讨论。

基辛格访问北京期间，联合国大会正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问题进行表决。尼克松指示基辛格在国外多呆一天，不要赶在表决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时回到国内。这次美国没有公开反对我国进入联合国，但提出了“两个中国”的方案，即台湾蒋介石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具有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10月25日，联合国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开除台湾、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决议。

接下来，尼克松即加紧了访问中国的准备工作。那一时期，中国问题成为尼克松大脑思维的一个大热点。几乎每天，他都要跟基辛格在一起研讨有关中美关系的种种问题。他搜集了大量资料，甚至把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也找来看了两遍。他还对法国大作家马尔罗的名著《反回忆录》中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本世纪20—30年代革命活动的描写，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他在出访中国的前几天，还特地请这位年事已高的法国名人来白宫作客。

马尔罗对尼克松说：“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最后一幕，你去中国跑一趟是值得的。”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总统离开华盛顿，取道夏威夷和关岛，开始了历时12天，行程20400英里的旅程。2月21日11时27分，尼克松乘坐的“七六年精神号”总统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拉开了中美首脑历史性会见的宏伟大幕。这个时间是尼克松精心安排的。此刻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点半，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舱门打开了，走出来的只有尼克松和他的夫人。他的随行人员，包括罗杰斯、基辛格，全部留在机舱里。这也是总统特别关照的。因为他特别重视

第一次和周恩来握手，认为电视转播时要突出这个重要场面，镜头里美方只能有总统一个人。他说这是为了纠正 1954 年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

尼克松走下舷梯、离地面还有三四层台阶，就向周恩来微笑着伸出了手。他和周恩来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钟。为了使总统之行和双方协商处于秘密状态，机场显得既冷清又简单，毫无通常的炫耀与隆重。在驱车前往市区的途中，周恩来对尼克松说：“您从大洋彼岸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们已经 25 年没有联系了。”

尼克松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 18 号楼。这是接待国家元首的最高级的一幢楼。

午宴刚结束，周恩来便来找基辛格，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玩笑，而是严肃地、直截了当地说：“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基辛格没有料到毛泽东接见安排得这样快。

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当尼克松、基辛格，还有洛德，走进书房时，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但他并不避讳他说：“我说话不大利落了。”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主席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 20 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弥补回来呢？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对这次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会见作了如下生动而详细的记述——

“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主席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当谈到这次来访时，毛泽东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

“我说到蒋介石称主席的‘共匪’时，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他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我回答：‘你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同毛的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即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

“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 ‘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 ’周大笑。 ‘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

“ ‘像我这种人’，我说， ‘还有匪帮。 ’

“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 ‘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 ’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 ‘他们说，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

“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 ‘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

“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 ‘他读的书太多了。 ’

“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 ‘不过你气色很好。 ’我回答说。

“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 ‘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 ”

这一次会晤进行了 65 分钟。毛泽东的话，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但尔后基辛格才恍悟到，他实际上已将《上海公报》里中国政府所要阐明和坚持的主要东西，都融会在这次谈话里——这是后来直令尼克松、基辛格佩服不已的。

在尼克松来访的第一次晚宴上，祝酒词、致答词自不必说。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答词的结尾引用了毛主席的诗词，他说：

“ 毛主席写过：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

“ 现在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伟大境界的高峰，缔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

尼克松总统居然引用毛泽东的诗句来阐述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对世界各国的电视观众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世界确实发生了改变！

尼克松在北京度过 5 天，经历了紧张的秘密谈判、游览和出席公众活动。在同毛泽东会见以后，同周恩来前后会谈了 4 次。除了双方关心的大事以外，两人就像老朋友聊天似的谈了许多与公报无关的事。尼克松不仅对周恩来思想的高度敏锐、谈判的高超艺术十分钦佩，也对他处于 70 多岁的高龄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周恩来去钓鱼台拜会尼克松，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等在楼厅门口迎接。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为周恩来脱掉了呢子大衣。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摄下后，霍尔德曼安排在电视转播中连续播放好几次。有家报纸评论说： “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这次中美双方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周恩来和尼克松之间是两国首脑的会谈；罗杰斯和姬鹏飞具体讨论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问题；基辛格和乔冠华则会谈公报内容。在尼克松等参观游览时，基辛格、乔冠华一直躲在钓鱼台宾馆，逐字逐句地研究公报的每一句话。最棘手的仍然是台湾问题。

公报总的构思已经定下来了，主要是对台湾问题的措辞，双方分歧巨大。我方坚持美军必须无条件地撤出台湾，美方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会谈三

天，双方坚持不下。第四天终于有了突破，双方都修改了个别词汇。毛泽东、尼克松分别批准了。2月25日在尼克松的答谢宴会之际，只花了15分钟，双方就达成了协议。

尼克松到了杭州，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他一心想着明天到上海就可以向全世界发布公报了。基辛格也兴致勃勃。而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看了公报稿，却嘀咕不理想。随后罗杰斯送交总统一份材料，列举了专家们的种种修改意见。

在大功告成之际，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又横生波澜，把尼克松几乎气疯了。

在刘庄宾馆里，尼克松走来走去，脸色都变了。他又气愤又痛苦。他既不便向中方提出重新讨论，又不能带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左右为难。最后只好对基辛格说：“亨利，你再找乔冠华谈一谈吧！”

周恩来听了乔冠华的汇报，也听了给罗杰斯当翻译的章含之的汇报，心里一直琢磨这件事。他了解美国国情，清楚白宫和国务院的矛盾。他想到毛泽东接见尼克松，罗杰斯没能去，正想到上海后要特别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周恩来在电话里向毛泽东汇报了。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又严厉地加上一句活，“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又开了一次夜车，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公报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基辛格后来称它是中美关系的“试金石”，是向全世界表明变化着的地缘政治关系的象征，也是指导未来中美政府机构会谈的指南。直到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前的7年期间乃至今天，上海公报都一直是指导两个大国关系的唯一文件。它在中美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的鸿沟上架起了桥梁。为两国寻求并行不悖的重大外交政策创造了机会。毛泽东在那次接见尼克松过后，即高兴地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其实，这对于尼克松的美国政府，又何尝不是这样！1972年2月27日，在《上海公报》签署后即将离开中国前夕，尼克松在宴会上祝酒说：“我们今天所发表的联合公报概括了我们会谈的结果。这个公报明天将成为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但是，我们在那个公报中所说的话，远不及我们在今后为建立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过去分隔我们二十二年的敌对状态的桥梁而做的事情来得重要。”他举杯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这时，尼克松是颇为自得的。他后来在《真正的战争》一书里甚至提出：“一九七二年中美和解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地理政治事件。”

尼克松无疑是这次“最引人注目的地理政治事件”的美方导演与主角。而这场堪称世纪性的历史剧的一个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双方直到1971年7月15日向世界公开宣布尼克松将访华之前所进行的节目都是在极端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此，7月15日的那次公告竟被世界舆论惊呼为“尼克松冲

击”。这同时也使美国在亚洲的亲密盟友日本因措手不及而大为光火，认为发生如此重大的政策转向，至少也应当告诉他们一下。对此，尼克松后来在《真正的战争》一书里解释了他当初的谋略：“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保密是绝对必要的，无论是同盟国打交道还是同敌人打交道，莫不如此。没有保密——以及关于保守秘密的保证——几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希望办成。……要是这一行动走漏了风声，那就会危及就中国问题采取的整个主动行动”。在这里，尼克松运用的谋略同中国古老的智术——“深藏若虚”很是贴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良贾深藏若虚。”司马贞索隐：“良贾，谓善货卖之人，贾音古；深藏，谓隐其宝货，不令人见，故云若虚。”深藏的手段，有利于中美双方的顺利接触、了解，彼此都不受来自第三方力量的干扰。而一旦时机成熟，深藏的宝货揭晓，则会令世界为之瞠目结舌了。在具体实施中，则采取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法。元人无名氏《气英布》第一折说：“孤家用韩信之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攻定三秦，劫取五国。”意谓表面上采取一种明显的行动以迷惑对方，暗地里采取另一种行动，以达到目的。尼克松遣基辛格借道巴基斯坦秘访中国，正是仿效中国古人韩信的用兵之策而创造出的 20 世纪外交史上的一大佳作。难怪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还赞扬尼克松在最高级外交中的经历是“一项真正的历史性成就”。他说：总统首先提出同中国交往的设想，几个月里为推动这一设想殚精竭虑，“独自冒着国内政治的风险”，令人钦佩。参议员肯尼迪更声明说：“现已建立起来的通向北京的桥梁将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期的一个持久的里程碑。”

中国重返联合国 得道多助得人心

1971年11月1日,纽约当地时间上午8点。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像玻璃房一样的联合国总部摩天大楼高耸在铅灰色的天幕中。

12名身着蓝色制服的联合国卫兵,携带131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国旗,照例迈着整齐的步伐,像往常一样步出联合国大厦。他们从联合国会址周围按字母次序排列的一排旗杆北端开始,依次升旗。几分钟后,走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保留的旗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2年以来,联合国总部前院那杆属于中国的旗杆上,一直挂的是台湾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但这面旗子,从1971年的10月26日清晨起,便在联合国消失了。

6天之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升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落在两位美国黑人青年身上。他们一个叫威拉德·博迪,24岁;一个叫乔治·鲍德温,

28岁。当他们将一面长1.2米,宽1.8米的崭新鲜艳的尼龙红旗系上旗绳,被30多位新闻摄影师和记者摄入镜头时,或许并未意识到,他们在这个时刻同五星红旗一道,已被庄严地载入联合国的史册。这是第一面由联合国秘书处在美国定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它标志着联合国从此结束了被美国操纵无视中国存在的荒唐历史,标志着8亿中国人民的代表堂堂正正地进入了联合国的殿堂。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时,正值联合国第四届会议筹备召开之际,而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却没有接到大会的入场券。

1945年6月26日,当中共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时业已形成的国际关系准则承认,一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为此,1949年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声明只有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与事实的根据。在此,出席本届联大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绝对不能也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

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外长再次致电罗慕洛和赖伊,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理会各会员国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的首席代表。电文并请他们答复以下两个问题:1.何时开除国民党政府的非法代表团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2.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国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8月,当第五届联大筹备召开之际,周恩来外长再一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通知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五届联大的中国首席代表,请他立即办理中国代表的入会的一切手续。

中国政府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正当要求,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答复,但是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进而影响到了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

数年之前,为彻底消灭法西斯而并肩战斗的美国和苏联,在此时已分道

扬镳，形成了各自为营的两大世界阵营。作为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诞生的新中国政府，它所奉行的“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自然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当新中国政府提出重返联合国的要求后，美国自然要为此设置重重障碍了。

与此相反，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苏联政府对于新生的中国最早给予支持，并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付出了努力。1950年1月10日，苏联驻安理会的代表马立克在得悉周恩来外长8日的声明后，立即提出一项提案，要求安理会作出开除国民党政府的决议，并郑重声明，在这项决议未做出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虽然苏联的努力迫使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蒋廷黻退出会议主席的地位，但由于美国的阻挠，1月13日，这项提案未获通过。为表示抗议，苏联代表当场宣布：在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被开除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对在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参与下安理会做出的任何决议都认为是非法的。随后，苏联代表团愤然地退出了安理会议事厅。

苏联的举动，犹如在安理会投下了一颗炸弹，马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首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言，它的退出，将意味着联合国的活动陷于瘫痪，而且，假如苏联另行组织联合国——这一点它完全可以做到，那就意味着联合国将处于分裂状态。赖伊必须尽快对此表明态度。3月8日，赖伊向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关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法律方面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对两个敌对政府并存的中国，联合国接纳代表的依据，是要看“哪一个在事实上据有使用国家资源及指导人民以履行会员国义务的地位”。为此，他建议召开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或外长参加的安理会特别会议，讨论解决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为此，从4月22日到5月中旬，赖伊先后访问了华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对中国代表问题进行调停和斡旋。苏联对赖伊的行动给予支持，并表示将回到联合国；巴黎和伦敦也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在赖伊访苏期间，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与他进行了会谈。在出访结束后，赖伊向各会员国发出公函，强调国际形势的严重性，而这一严重性“在中国代表权问题获得解决以前，要取得重大改进是不可能的”，呼吁国际社会重视这一问题。

望着苏联代表愤然退场的身影，美国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倘若赖伊的忧虑成了现实，美国在世界的“老大”地位将会产生动摇。因此，美国总统杜鲁门即指示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格罗斯立即发表声明，一方面表示要对苏联的提案投反对票，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个程序问题，对此不能行使否决权。美国的策略其时是进可攻，退可守：既然承认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个程序问题，在确认这个程序的过程中，美国可以对此进行操纵，而一旦操纵失败，则可以将国民党政府当作“马前卒”加以抛弃。对此，当时驻美的国民党政府大使顾维钧一语道破天机：“美国之所以认为是程序问题，显然是为了想留有活动余地，万一情况发生变化，美国在承认中共问题上需要改变政策的话，它便可以自由行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南北战争。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宣布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使得新生的中国硬被拖入了朝鲜问题的争端。这时，联合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联合国难以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谈判。为此，作为中立于东西两大阵营之外的印度进行了斡旋活动。

7月13日，尼赫鲁总理在事先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分别致信斯大林和艾奇逊，建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由苏、美、英、中等国通过在安理会内外的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斯大林对此表示极大的支持，而杜鲁门则断然拒绝，导致斡旋活动搁浅。

这年9月，五届联大召开，印度代表再次作出努力，向大会提出接受中国参加大会的提案。苏联对此表示支持，并向大会提出两项决议草案：1.大会决议国民党集团之代表并非代表中国，不得参加大会及大会各机关工作；2.大会决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参加大会及其机构之工作。虽然大会成立了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七国特别委员会”，但它所作出的决议却规定，在未作出结论之前，仍允许中华民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与其他国家的代表拥有同样的权利。这项决议，不但使印度和苏联的努力付之东流，而且意味着中国代表权问题将再一次被拖下去。

但是，这种拖延的局面已引起一些国家的反感。这年的12月，美英在华盛顿的会谈中，英国首相艾德礼就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向杜鲁门提出了忠告：

艾德礼：英国人不同情蒋介石，对所谓的福摩萨（即台湾）问题不感兴趣。美国应考虑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以换取中国从朝鲜撤军，并同时考虑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艾奇逊：台湾对美国远东防务是相当重要的，如把它交给敌人，美国的岛屿链条防线将会断掉一节。

艾德礼：台湾终归要还给中国人的，这是美国应该正视的现实。如果美国真想解决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这一问题的话，最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如果中国是联合国的一员，反而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因为在联合国内谈比在联合国外谈要好得多。这样，西方也可能少丢点面子。

杜鲁门：现在联合国有一个苏联已经让西方感到棘手，中共若进入麻烦将更多。况且，即使中共进入联合国，中美关系能否比现在更好？

艾德礼：即使中美关系不会比现在更好，两张否决票（指苏、中）与一张否决票有什么两样？会更坏些？应该说，英国对美国的忠告是正视现实的。但是美国却对此置若罔闻。在会谈后的公报中表明，“美国现在反对并将继续反对中共代表在联合国的席位”。在1951年11月举行的六届联大上，美国以所谓“中国侵略朝鲜”为借口，操纵大会通过决议，“延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并将这一决议延续达十年之久。

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议题，这是对美国多年来阻挠联合国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一大突破。在1960年以前，美国以时机不宜为理由，采取“拖延讨论”手法，阻挠联合国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从1961年起，美国改变手法，一面表示“赞成”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一面又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权这样一个只需要简单多数即可通过的问题，作为需要2/3的多数才能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继续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

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美国政府一些要员已经看到，美国在中国联大代表权问题上“最后失败的结局”将“日益明显”。美国出席联大的代表团成员的发言暗示了方针上的重大改变。10月25日，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说：“美国反对以牺牲中华民国来接纳北京政权进入联合国”，他明确他说出了后来形成的“双重代表提案”的实质：“反对驱逐台湾，不反对接

纳北京”——这个制造“两个中国”的主意，最初源起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1970年6月19日向尼克松总统递交的一份备忘录。罗杰斯分析，美国在联合国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

罗杰斯的担心很快就得到了证实。1970年11月25日，第二十五届联大出现的支持驱逐国民党的代表已达到51票，反对的已降到47票。这是自1950年联大表决恢复中国席位问题以来出现的第一次赞成票超过反对票。它预示着美国在联合国内顽固推行的孤立中国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和缓解危机的需要，尼克松自1970年底开始寻找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渠道，开展了被当时苏联所称的“笑脸外交”。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转折关头。

作为对美国主动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回答，毛泽东在周恩来建议下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1971年4月6日，中国报纸突出报道了美国队将前来北京访问的消息。这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不同制度、不同观念的各国一流政治家和外交家，都不约而同地为这个“外交杰作”而喝彩、倾倒。

4月27日，白宫得到周恩来总理对尼克松1月5日信札的答复。在这封写于4月21日的信中，周恩来重申：“如果中美两国的关系要从根本上恢复，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所有的军队。”为解决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举行两国高级负责人的会谈。为此，可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7月9日至7月11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的特使第一次秘密出访中国，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双方发表的公告说，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华。这条轰动世界的消息，对美国盟友心理天平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6月1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所持的态度，他不想在7月中旬以前作出决定。显然，尼克松担心这个问题破坏北京之行的成果。

其实，就在基辛格访华之前，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真地制定了一个“双重代表权力案”，准备联合日本佐藤政府向第二十六届联大提议：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但也“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但是，不久，美国政府就已感觉到，这个提案的通过有难以克服的困难。最重要的一个现实就是：当时许多国家和美国一样，决心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会投票“驱逐台湾，接纳北京”。再说，这个方案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都坚决拒绝接受它。所以，要使这个方案获得多数赞成票就相当困难了。

8月5日，周恩来接见詹姆斯·赖斯顿时，曾把美国提出的联大那个妥协的建议客气地放置一旁。他笑笑，简洁他说，这个建议是自相矛盾的。接着8月6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又用一种非常婉转的态度拒绝了美国的这个建议。他告诉《纽约日报》的记者，中国不会照这个方案接受它在联大的席位，他说：“我们可以在联合国外面再等一年，两年，或者不管多长时间”。中国并不急于重返这个不尊重她主权的联合国。

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根据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意见，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一封信和一份备忘录，正式公开了美国在联合

国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制造“两个中国”的主张。

对此，中国政府表示“绝对不能容忍”，于8月20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同驱逐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出联合国，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决不允许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

1971年10月25日夜，从纽约市中心灯火通明的联合国总部会址，传出了一片欢呼声和鼓掌声。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挫败了美国提案，在表决中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下边的表格，记录了从1950年至1971年（除1964年没有讨论提案外）历年联大讨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情况：

年份	支持中国的票数	追随美国的票数	弃权票数
1950	10	37	8
1951	11	36	4
1952	7	41	11
1953	10	43	2
1954	11	42	6
1955	12	41	6
1956	24	46	8
1957	27	47	6
1958	28	43	9
1959	29	43	9
1960	34	41	22
1961	37	47	19

（此表“追随美国的票数”，未把台湾计算在内）

1971年10月25日的联大表决结果，是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之外的。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10月24日，基辛格在再次访华同周恩来的最后一天会谈中，曾问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第二天晚上，即传来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喜讯。26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二十六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三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影还笼罩在中国土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

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泽东给周恩来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那时，外交部国际司由最冷清的司于一夜之间变得特别重要了。

“乔老爷”就是乔冠华。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周恩来还委派高梁带领一支6人组成的先遣队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特别感到扬眉吐气，为之振奋。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起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当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去对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他的这份发言稿，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审定。

10月28日，周恩来与《朝日新闻》后藤基夫会见。这是周恩来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席位后首次向新闻界发表的谈话。他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语：“临事而惧”，就是说，中国人要以体现信心的谦虚开始工作，慎重又慎重，不能粗心大意。对此，外电认为，这就是周恩来叮嘱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当切记的工作态度和风格。

11月9日，代表团从首都机场登机离京。受到4000多人欢送。当时锣鼓喧天，红旗翻飞，场面非常热烈。乔冠华团长一直咧着嘴笑，不断地向大家挥手，显得潇洒豪迈。最不寻常的，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送行。一位国家总理来送副部级的团长，这是破格的。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和这个拥有50多人的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握得很用劲。这也是破例的。这说明周恩来十分重视这次远行。代表团成员都感到国家的重任在肩。后来，法新社在报导中说，“今天的场面带有一种家庭的气氛”。

顺便交待的是，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后却没有像一般初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一样，搞隆重的首次升旗仪式。1971年11月1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虽则是第一次升起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广场，却未出现鼓乐齐鸣，人头攒动的热闹场景，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中国政府方面要求这样做的。因为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四个发起国之一，作为一个从1949年10月1日起开始新的历史的主权国家，理应享有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只是，这权利被长期无理地剥夺了。所以，根本不存在中国需要“重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应当迅速恢复中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既然联合国有些会员国在政权更

迭，甚至改变国名后，都不曾影响在联大的席位，中国的代表权更迭，也应该按通常的做法行事。这样，中国的升旗仪式便显得十分平静。而这，正说明了中国政府的意志和主张得到了尊重。

在这之前，联合国的行政官员们着实烦恼了几天。10月25日夜，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决议之后，措手不及的联合国秘书处没有准备好中国的五星红旗。他们第二天一早赶忙向美国一家制旗店定制。当天就制作好了。可是，官员们拿到旗帜后又不知挂在何处——他们不清楚，中国国旗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国旗行列中是按代表中国的“C”，还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字母“P”来占据它的位置？

131根旗杆中的一根因此就空了将近一周。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中国人的答复。

10月31日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接到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的电报：“我收到了你1971年10月29日的来电。我荣幸地通知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名字的按字母次序排列问题，请按开头的英文字母C排列，即CHINA，PEOPLE'S REPUBLIC OF。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升上了联合国国旗列自北端起的第23根旗杆，飘扬在智利国旗和哥伦比亚国旗之间。在这之前，许许多多美国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联大代表，从来没有见过这面红旗。

又过了10天，即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30分，第一个联大中国代表团迈进了总部的大门，他们是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副代表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女）、邢松鹤、张永宽。这时，大厅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纷纷前来表示祝贺和欢迎。

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随后，57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致了欢迎辞。科威特代表亚洲国家说：“10月25日的夜晚发生了在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的史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联合国终于决定纠正了它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捷克代表苏联和东欧国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到联合国，是为这个组织的活动创造更广阔的基础的一个决定性的前进步骤。”荷兰代表西欧国家说，现在联合国进入了新的时期，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无疑将使联合国在处理我们所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时能有更大的权威。”布隆迪代表非洲国家说：中国代表回到联合国，“似乎是国际上新的力量均衡的黎明”。

在各国代表致欢迎辞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大讲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沉着地取下眼镜，用中文缓缓地宣读着一篇2600字的发言。整个会场一片静寂，所有的人都在屏气凝神地倾听。他们突然发现，这位几天来坚持“微笑路线”的中国人，并不处处“温和”，他以“国际讲台上非常少有的坦率和诚实”，表明了北京将来对联合国的政策以及对外政策的轮廓。

乔冠华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中国的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的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随后他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指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任何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联合国的事

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中国支持一切被压迫国家争取独立自由、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支持亚非拉国家维护民族利益、反对外来经济掠夺的斗争；中国要求裁军，特别是核裁军。

乔冠华的直言不讳使一些人感到震惊，另一些人感到气恼。

共同社记者称乔的演说“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它的反响将波及全世界。

11月2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出席了安理会会议，开始履行中国作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职责。与此同时，联合国各个专门机构也根据联大决议精神相继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这些机构的合法席位。随后，中国陆续恢复了在这些机构的活动。

中国代表团恢复自己的合法席位所阐述的主张，也是中国后来在联合国各项工作中一贯坚持的立场。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

1995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第24年，也是由中国参与缔造的联合国诞生50周年之际，21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乘着中国民航的飞机飞越太平洋，来到金风送爽的纽约曼哈顿岛参加联合国纪念活动。

下机后，江泽民立即乘车赶往联合国总部，参加中国向联合国赠送“世纪宝鼎”的揭幕仪式。

中国政府赠送的“世纪宝鼎”重1.5吨，高2.1米，象征21世纪；两米见方的鼎身上有56条夔龙纹饰，象征着华夏炎黄子孙由56个民族组成，都是龙的传人；浮雕兽面，云纹填底，古朴典雅，气宇轩昂。宝鼎矗立在联合国总部北边花园内，周围有绿草鲜花相衬，一泓碧水映照，显得既古老庄重又英姿勃发。江泽民把为宝鼎揭幕作为纽约之行的“开台锣鼓”，表明中国高度重视联合国的作用，也表达了几亿中国人民愿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10月22日傍晚，江泽民在下榻的广场饭店二层的“冬宫”会客厅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的专访。与美国其他各大电视台相比，公共电视网新闻报导比较客观公正，因而在美国广大民众尤其其中、上层人士中有着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力。

采访开始之前，主持人伊丽莎白·法恩斯沃丝女士同江泽民进行了轻松的交谈。她问江泽民以前是否来过纽约，对这个大都市印象如何。江泽民回答道：“我对纽约并不生疏，在1980年和1983年曾两次来过这里。纽约有其繁华的一面。可我也去过美国的其他一些城市。我喜欢‘硅谷’胜过纽约，或许这与我以前在电子工业部工作有关。”

在半小时的专访中，江泽民坦然自信、条理清晰地回答了主持人提出的有关台湾、人权、经贸以及即将举行的中美首脑会晤等一系列问题。采访结束后，江泽民在美国中国电视（CTV）有限公司总裁苏珊·拉尔森女士的陪同下来到隔壁的房间，同在那里通过闭路电视观看采访的钱其琛副总理和曾庆红、刘华秋等代表团其他成员以及作陪的一些美国大企业负责人会面。

10月24日下午，林肯中心成为举世瞩目的政治焦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这里举行双方第三次正式会晤。会晤分成小范围和大范围两阶段进行。

在高大宽敞的会晤大厅内，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握着右手，面带微

笑地接受记者的拍摄。这时，一个美国记者突然向江泽民主席提问：“你希望从克林顿那里得到不再让台湾‘总统’访美的承诺吗？”江泽民不慌不忙地答道：“我们将在会谈中讨论这个问题。”

美国的大批记者进场后，又有人向两位首脑提了几个问题。一位美国记者问克林顿这次会晤是否是为了挽回双方的面子，克林顿回答说：“不是。美国和中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保持建设性的对话能给双方带来实在的利益。”

就中美两国领导人为了两国关系的前途进行小范围谈判之际，离他们不远的另一间大厅内，中美两国的新闻官也在为如何公正地安排大范围会谈的拍摄工作进行紧锣密鼓的“谈判”。按照美方的设计，中美双方的摄影师只能站在会议厅的一角拍摄从对面侧门进入的两国领导人，这样，当双方人员在会谈桌前对面落座时，中美记者摄入的是美国领导人的面孔和中国领导人的后脑勺。在场的我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摄影师认为这样做太不公平，因而坚持要求站在面对会谈桌的中间位置拍摄，以便能将双方人员的面孔都纳入画面。我代表团新闻官杨秀平女士据理力争，终于说服她的美国谈判对手米歇尔小姐接受了中方建议。

中美首脑小范围会晤原定半个小时，结果延长到一个半小时。大范围会谈又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美方重申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各项原则中的承诺，双方拟在环境、重大国际问题、经贸合作、军事交往、恢复对话等领域加强对话和磋商。

当天晚间，双方发言人都称，这次会晤是“坦率的、友好的、积极的、有益的”，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与指挥下进行的。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外交部为中国重返联合国，一直坚持不懈地斗争了 20 余年，将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阵线予以逐渐突破与瓦解，终使支持中国的票数从 1950 年的 10 票上升到 1971 年的 76 票。可谓“铁杵磨成针”。当然，中国外交的这种突破除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正确运用外，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土地地位的日益重要、影响的日益扩大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正义、反对霸权。这就是“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的道理。

从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那天起，我国就充分利用联合国舞台展开更为广泛而积极的外交活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伴随着国力的日益增长而扩大。江泽民 1995 年的联合国总部之行，正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发展的一种实践。

中日邦交正常化 友好条约代代传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 3500 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高达 1000 亿以上。按照国际惯例，要求日本进行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但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还是先把镜头扯回到 1972 年 9 月 25 日晚间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吧！是晚此间灯火通明，觥筹交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正在为首次访华并与中国进行恢复邦交谈判的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举行欢迎宴会。周恩来高兴地举起酒杯，发表了如下一番祝酒词：

“首相阁下，你来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对此，田中首相也作了答辞，他说：

“我深信，即使我们在立场、意见方面存在小异，但只要日中双方达到大同，按照互谅互让的精神，消除意见分歧，是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的。”

田中的答辞接着便出现了一处明显不妥，他说：

“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怎么能轻描淡写成“麻烦”？周恩来听到这里，脸上掠过一丝不快。在场的其他中国官员也态度严肃起来。田中虽有些觉察，却不及多想，继续按照讲稿说下去……

次日上午 10 时 15 分到中午，首先由大平和姬鹏飞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举行第一轮外长会谈。

这是起草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的实质性会谈。出席这次会谈的人员，日方除大平外，还有吉田健三亚洲局长、高岛益郎条约局长、桥本恕中国课长、栗山尚一条约课长等共九人；中方有姬鹏飞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交部顾问张香山、亚洲司长陆维钊、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等六人。田中首相访华时，日外务省准备了三个方案。日方准备在举行外相第一轮会谈时，无保留地把日本的意见全部摆出来，席间，高岛条约局长对第一方案作了说明。对于中方提出的在联合声明里写上“结束战争状态”的话，高岛指出，这已由 1952 年“日华和平条约”写明；如果中国实在要坚持这一点，中国可以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

那么，“日华和平条约”是怎么一回事呢？

1950 年 6 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以及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冲击，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1951 年 7 月，美国关于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

但是，美苏在邀请中国海峡两岸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权参加和会，

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时间)，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单独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说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

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

1951年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置国家民族利益和主权于不顾，于1952年由原来的持有异议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单独同日本缔结了所谓“日华和平条约”，并放弃全部战争赔偿。

正是鉴于这种历史背景，1972年9月26日，周恩来指示姬鹏飞外长，在谈判时要求日方以适当方式宣布废除“日华条约”，并强调说，“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要写在一起”。可是，高岛却搬出什么条约理论，始终反对在《联合声明》里写上“结束战争状态”一类的话。

中方还要写进“中国放弃赔偿要求权”的意思。还是这个高岛，又振振有辞地跳出来说什么中国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问题，也已经在“日华和平条约”中解决，“要求权”这个说法实难接受云云。

26日两国外长会后，姬鹏飞当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当天下午，举行日中首脑第二轮会谈(第一轮会谈是25日下午举行的)。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义正辞严地指出：

“高岛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

田中角荣看周恩来如此气势逼人，涨红着脸回答说：“不，这不是高岛个人的意见，是日本政府的意见。”

周恩来对此未加理睬，将话锋一转重提田中前一天宴会上的致词说：

“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讲‘添了麻烦’。这句话好像是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那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可以说是‘添了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

田中角荣不示弱，软中带刺地反驳说：“日本可不是这样。你说没关系，我给你深深鞠个躬，说声‘实在给您添了麻烦，以后我注意’，就完了。”

双方足足论战了两个半小时。周恩来最后严肃指出：

“日方提到蒋介石放弃要求战争赔偿，这使我们感到惊讶和愤慨。蒋介石政权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他在和日本签订所谓和约时宣布不要赔偿是

慷他人之慨，而我们是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赔偿要求的。……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高岛先生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面对周恩来总理正气凛然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苦思冥想中，大平正芳冒了一句：“伏兵奇出，困难重重，真不好办，我们未料到的事，却突然成为要解决的问题。”

高岛益郎拍着脑袋，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周恩来这是在用孙子兵法！”

田中角荣很感兴趣地问：“请详细讲讲！”

高岛益郎拿出一本《孙子兵法》，翻到“军事”篇念道：“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这是什么意思？”日本人都大惑不解。

高岛益郎解释说：“周恩来采取的是治气与治心相结合的谈判谋略，就是先把对方谈判代表团中的一个人说成‘坏蛋’，彻底搞臭，使对方内部发生矛盾，让形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发展！”

众人听了都感叹不已。晚上，为了确切了解中方的意图，日方临时商定大平和姬鹏飞再次举行会谈，高岛同外交部顾问张香山进行接触。日方根据从姬鹏飞、张香山等人那里获得的感觉，开始起草妥协方案。

在日方采纳中方的意见中，有一条是“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当初，日方觉得“既然有了联合声明，就可以不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了”。但周恩来在举行第二轮首脑会谈时即针对此指出：“田中先生，这不单是为了你我友好下去，而是为了中日两国子子孙孙和平友好下去。”

9月27日上午8时许，田中一行离开迎宾馆，由姬鹏飞陪同前往万里长城游览。这时，大平趁机把高岛起草的日方妥协方案要点交给姬鹏飞，并对他说：“这是日本的最后方案”。

中方会作出什么答复呢？田中惴惴不安。他又暗自镇定住自己：必须做好思想准备，谈判有可能破裂，如果谈判破裂，势必影响田中内阁的存在。

下午4时10分，田中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始第三轮会谈。事先，日本的妥协方案已通过姬鹏飞送到周恩来手里。

田中认为，这一轮会谈中，周恩来对妥协方案点不点头将是田中访华成败的关键。田中也好，大平也好，都想从周恩来的表情中猜测会谈的命运，但周却不露声色，滴水不漏。田中又一次感到：周恩来实在高明，可以说是深不可测。

周恩来到底要干什么呢？会谈结束后，田中等突然恍然大悟：“周恩来是在等什么人最后拍板！”周恩来请示的不是别人，肯定是毛泽东。毛泽东会作出什么反应？田中等非常担心。

吃晚饭时，中国外交部礼宾司通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下午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

晚上8时30分，周恩来陪田中角荣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向着客人风趣他说：“打架打完啦？不打不行啊！”

田中连忙回答：“不，我和周恩来谈得很好。”

毛泽东：“不打不成交嘛！”

以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为转机，中日恢复邦交谈判突然顺畅起来——

晚上 10 时 10 分，大平和姬鹏飞两位外长在迎宾馆会谈。大平逐条宣读日方的草案。姬鹏飞和张香山一一记了下来。外交部两名工作人员轮流拿着他们的记录走出房间。其实是把记录的内容送交周恩来。

片刻，工作人员回到座位上交给姬鹏飞一张字条。姬鹏飞看后，便开始宣读中方的答复。

日方参加谈判的一位当事人，事后描述了当时精彩的场面：“真是迎刃而解。中方对日本的妥协方案作出全面让步。”

中方原来坚持要用“结束战争状态”这几个字，后来周恩来改成“结束不正常状态”。这样日方就不用再一次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了。

中方还放弃了“把复交三原则一起写在联合声明正文里”的初衷。周恩来认为，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增加反霸权条款，答应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就应该送给田中一份“人情”。

不过，中方还是提出了两点要求：

“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要在联合声明前言里提一笔。”

“中国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这一条到底怎么办，想听听大平外相的意见。”

接受不接受这个要求，将会关系到联合声明的最终签署与否。大平外相没有犹豫，他很坚决地拿起铅笔，在已经打印好的日本方案上改写了联合声明前言的后半部分，最后写成：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这一条，大平最后是这样表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大平删掉了中方一直坚持的“要求权”的“权”字，随后把稿子交给了中国方面，中方看了后，同意了。这样，双方围绕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在法律上出现的分歧，一一得到了解决。

最后，只剩下文字进一步斟酌的问题。双方工作人员兴致很高，你一句我一句地，终在翌日清晨完成了联合声明的全文。

9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9 月 30 日上午，田中首相一行从上海乘飞机返回日本。在上海机场，周恩来最后一次握着田中的手话别，并特别叮嘱了一句：“回去后，请转达对天皇陛下的问候。”

这使田中感到吃惊，因为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毕竟是在天皇名义下进行的，不少中国人要求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田中由此更领略到周恩来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的风度和宽阔胸怀。田中临进舱时，转身在舷梯上向着周恩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邓小平首次出访美国 新外交战略取得成功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出访美国，在美利坚大地上刮起了一阵“邓旋风”。在历时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争分夺秒地与卡特总统以及其他美国官员进行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并回答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这期间，有两千多名新闻记者追踪采访和报道这一历史性事件，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全部变成了“邓小平时间”。在邓小平前往访问的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当地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表达对邓小平的欢迎，并以大量篇幅报道邓小平访问活动。可以说，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述评）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北部一直处于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威胁之中。到了1978年和1979年，苏联的军事力量又伸入越南、柬埔寨、阿富汗，加之亲苏的印度，从而完成了从北、西、南三面威逼中国的战略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刚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对“凡是派”决定性胜利的邓小平，遂将外交战略眼光投放到遥远的美利坚大地上，希望以同美修好为契机，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确保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战略重心的大转移。

而从1978年到1979年初，从美利坚吹拂过来的阵阵热风，更坚定了邓小平的这项外交抉择——

1978年5月17日，卡特总统指示即将访华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领导人强调，美国已下决心要断然对付苏联在全世界的军事集结和代理人的扩张主义。与此相应，卡特总统又授权布热津斯基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接受中国关于正常化的三项基本条件（断交、废约、撤军），并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以前声明的五点（1977年初布热津斯基曾敦促卡特加以重申的正是这五点，当时没有结果）。

5月20日至23日，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带来了卡特总统希望邓小平访美的正式邀请，并向邓小平重申：在两国关系中，我们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并提议双方下个月开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开始高度机密性磋商。邓小平当场拍板，代表中国接受了这个建议。

12月16日，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来而不往非礼也。为了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邓小平决定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作为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1975年福特总统访华的回访，于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传统的春节（大年初一）。邓小平这次访问，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同美国发生关系以来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

1979年1月28日下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政府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了邓小平副总理：机场上铺着一公里长的红地毯，鸣礼炮21响，机场上气氛祥和。

1月29日上午，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晚上举行盛大国宴。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

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进行了多次卓有成效的会谈。在1月29日的会谈中，邓小平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和团结，反对各种霸权主义，也虚心听取美方的意见。邓小平的才能、胆识和风度使卡特甚为佩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明亮的眼睛不时向左右扫视。当我的话被翻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向别的中国人有力地地点头。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卡特后来还回忆道：“邓说，他并不反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认为这可能有必要。但是他觉得目前的第四次会谈结果必然同前三次一样，不能限制苏联的战略军事力量。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人需要长时期的和平以全面实现现代化。苏联终将发动战争，但我们也许可以把战争推迟22年（到本世纪末）。他认为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之间没有必要建立正式的联盟，但认为应该联合行动遏制苏联。”

“我们都认为，如果我们联合反苏将铸成大错，这只能把苏联推得更远。我说最好是采取这样的政策，就是当苏联态度积极时就与之合作，否则就同它竞争。我们要长久地避免战争，不是仅仅把它推迟二十二年而已。”

在1月30日的谈判中，邓小平与卡特就国际形势，特别是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入侵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称越南是亚洲的地方霸权主义者，对莫斯科和河内可能存在的联盟表示忧虑。邓小平和卡特还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邓小平堂堂正正指出：“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邓小平指出，美国可以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做出贡献，希望美国和日本规劝台湾谈判，而不要做不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事。

邓小平特别强调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中国才会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失去信心，一是迟迟不能谈判；二是苏联人进入台湾。我们不赞成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

1月31日，邓小平和卡特在白宫东厅亲自签署了《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黄华、方毅分别和美国签订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领事馆的协定》、《教育、农业和空间合作谅解的换文》、《关于高能物理合作协定》。由于这些都是行政协定，因而毋须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开创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先例。

卡特总统兴致勃勃他说：“这三天的讨论是真正罕见的。”

签字仪式后，邓小平以乐观的口吻说：“我们刚才办了件大事，这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又说：“我们曾经预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在广泛的领域里迅速地展开，今天所签订的协定就是我们的第

一批成果。”

卡特总统热情洋溢他说，“我们已经找出了一条新的、不可逆转的途径，通向更坚实、更有建设性、更富有希望的两国关系。”

有的美国记者故意向邓小平提出挑衅性问题：“你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卡特这时暗暗着急，可也只好瞪大着眼睛望着邓小平。只见邓小平笑容可掬，不紧不慢地回答道：“有！”

邓小平的回答使在场的人们无不瞠目结舌。但邓小平又话锋一转，字字掷地有声：“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邓小平语惊四座，全场顿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美8天，邓用一半时间访问美国三大工业中心城市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这样的安排，目的是为今后彼此间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奠定基础。他特别留意美国的高新技术和现代化成就，一再表示美国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学习。这不仅仅是客套或谦虚。在西雅图，他在一次讲话的最后说：“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就是这个被称为‘通向东方的大门’的城市。这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两国是隔水相望的邻居。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2月5日上午，邓小平一行结束了对美国八天的正式访问，乘专机离开西雅图途经日本，于8日下午返回祖国。其间他在日本作了两天停留，同大平正芳首相等进行了会见。在会见中，邓小平再次严厉地谴责了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并说，必须给越南以制裁，为此，即使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世界舆论对此认为，邓小平的谈话意味着中国即将对越南采取军事惩罚行动。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第10天，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开始了自卫反击战。西方舆论界据此认为，邓此前的环太平洋访问是对美、日两国态度的火力侦察。而在整个自卫反击战中，苏联都始终保持了事实上的沉默，硬是忍心地让它的越南小兄弟在中国铁拳暴风骤雨般地打击下辗转哀鸣而不动声色。这，应该是与邓小平连续访日、访美以及中日、中美接连实现邦交正常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吧！

邓小平的新的外交战略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功，着实使“北极熊”有些心虚胆怯。后来，它终于沉不住气了，不断向中国传递出缓和的信号。1989年5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终于来到北京，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中苏关系从此正常化。这又令美国人心里酸溜溜的……

无名氏《三十六计》有“借局布势，力小势大”之说。意思是自己力量虽小，可借助其他的局势，布成有利于自己的阵营，使阵势在敌人眼中显得异常强大，最终威慑住敌人。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与上说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它使得苏联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邓小平不止一次讲到“世界大三角”。一次，他对日本朋友说：“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他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邓小平这里并非否认“三角”存在，而只是觉得中国这一角尚需努力。因此，中国这一角不能投靠任何一方，要独立自主而又灵活机巧，成为另外两角都需要争取和借助的对象。正如邓小平所言：“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份量的。”其实，中国的份量就在于中国人

民自己，先是毛泽东，后是邓小平，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善于利用并巧妙处理各种国际关系，在相对平衡中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只有经济强大了，我们在国际事务里面才能真正有份量，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英阿马岛起冲突 孰是孰非后人评

1982年春夏之交，南美洲南端的南大西洋洋面风云突变——马岛之争进入了军事对抗阶段。4月2日，阿根廷军队进驻马岛。4月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下院发表演说，称“英国的主权领土多少年来第一次受到了侵犯……对于从1833年以来延续至今的我们的主权，我们没有丝毫怀疑。”

于是，以马岛之争为主题，以欧美大陆为舞台，一场沸沸扬扬的历史活剧上演了。

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阿根廷本土以南300英里的南大西洋上，英国称之为“福克兰群岛”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1690年英国人约翰·斯特朗漂流至此，并将两个岛之间的海峡命名为“福克兰海峡”。之后，英国人一直称这里为福克兰群岛。1764年，法国人在这里建立居民点，并命名为“马尔维纳斯”。1767年，西班牙将该群岛并入西班牙在南美领地。1816年，获得独立的阿根廷从西班牙人手里继承了该群岛主权。1833年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又说马岛最早是由英国人发现的，再占领了它。从此，英阿之间在群岛主权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军队进入马岛的消息传入英伦三岛后，举国震惊，以为大耻。4月5日，在一片骂声中，被认作“投降派”的鬓发斑白的外交大臣被迫辞职。紧接着，撒切尔夫人成立起战时内阁，以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英雄皮姆为外交大臣。同时，一支由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在内的118艘各类舰船、250多架作战飞机和35000名军人组成的特混舰队亦启锚远航，向着远离本土8000英里以外的战区日夜兼程地赶去……

特混舰队南下之后，英国立即宣布马岛周围200海里为海空禁区，严禁外国船只和飞机进入，摆出了一副磨刀霍霍的样子。但撒切尔夫人最初的本意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势压人罢了。4月3日，她曾经这样说：“我不能预先说明这支特混舰队将会接到什么样的命令。这要看当时的情况而定。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许多朋友不断进行的外交斡旋能够取得成功。”预计特混舰队到达战区需要整整4周的时间。这4周时间是难熬的，同时也给双方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机会。

美国国务卿黑格将军成为英阿冲突的第一个调停者。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而阿根廷则是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美国理所当然应该为双方和平解决危机发挥作用。黑格将军马不停蹄，在危机发生后的最初几周内，穿梭于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试图促成一个妥协性成果。国际社会最初也对美国的调停持乐观态度。但是，黑格先后拿出5个不同的和平方案，都被双方所拒绝。

进占马岛的是1979年末上台的加尔铁里军政府派出的军队。当捷报传回之时，阿根廷民众群情激昂，沉浸在一片民族自豪感之中。而加尔铁里一时间也成了民族英雄。在这种情形下，叫加尔铁里坐下来谈判是不大可能的。他毅然回拒：“主权是不能谈判的！”于是，又是一阵喝彩声。

在英国方面，最初也不愿低下高傲的头。尤其是被称为“铁女人”的首相撒切尔夫人，自尊心极强，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她认为阿根廷的“入侵”

不仅是对大不列颠的“侮辱”，也是对她这位首相尊严的冒犯。英国人是在为正义而战，为捍卫主权而战。再说英国曾是独步天下的海上大国，阿根廷侵犯马岛，简直是蚍蜉撼大树，自不量力！英国绝不会败，所以，英国也不可能在阿根廷没有做出让步的情况下接受黑格的和平方案。黑格的五个方案均遭拒绝之后，又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非常现实的临时处理方法：即阿根廷军队从马岛全部撤出，英国特混舰队停留在距马岛 1000 英里以外的水域，然后在美国的监督下，在不违背岛上居民意愿的条件下，英阿双方就此五年内马岛的主权问题重开谈判。但就是这样一个双方都有面子，都有台阶下的方案也被英阿双方所拒绝。

可是，撒切尔夫人内心还是有顾虑。南大西洋隆冬将至，气候恶劣，作战条件不好。英国海军即使装备先进，也不敢说有把握获胜。另外，英国海军远离本土，马岛周围又没有可以向其提供给养的国家，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对于英国就是一场灾难；如果和平谈判久拖不决，也等于英国军队不战自降。所以，4月26日，她坦承说：“如果我们施以军事压力，和平解决的机会可能会更大些。”她心里祝愿特混舰队快快进入战区，早日开战，而且战必胜，方能以战压和，让加尔铁里在她这位“铁女人”面前软下来……。在那些日子里，撒切尔夫人日日寝食难安，在内心主战的同时，公开场合的言谈又必须克制、谨慎……。她私下里曾讲，在那些日子里，马岛简直成了她的生命所系，成了她的血脉所系。

黑格的斡旋不见成效，美洲国家组织又以秘鲁总统贝劳恩德为代表，出面调停英阿冲突，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也参加进来。但这时战事已起。4月25日，前期到达的英国军队重新占据南乔治亚，岛上阿军缴械投降。5月2日傍晚时分，英核潜艇“征服者”号，发射两颗鱼雷，命中阿根廷重型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号，致使368人葬身海底。而这天，贝劳恩德还以为和平指日可待。他对记者说，可能晚上就要签字了。

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号被击沉的消息传出后，举世大哗。这是二战之后海上军事行动中最大的杀戮行为。为了淡化世界舆论，争取战略主动，撒切尔夫人突然表示对秘鲁总统的和平方案有兴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耍外交手腕。因为秘鲁总统的和平方案和黑格的方案没什么大的差别。撒切尔夫人之所以接受秘鲁总统的方案而不接受黑格的方案，是因为时机不一样。现在英国已给阿根廷以致命的一击，当然就可以作出高姿态了，率先表示让步，使加尔铁里骑虎难下：他接受这个方案，就意味着屈辱，愤怒的阿根廷人绝不会答应；倘拒绝这个方案，则使阿根廷人要战争，不要和平的面目昭然若揭。结果加尔铁里拒绝了这个方案，这正是撒切尔夫人希望看到的。因为它使英国国民看到，英国出兵打仗是被迫的。阿根廷人拒绝这样有利的方案，英国只好奉陪。撒切尔夫人由此为英国士兵死伤愈多而自己免遭责难找到了理由。

5月4日，阿根廷海军对英军实施报复。阿根廷的一架购自法国的“超级军旗”战斗机发射一枚也是法国产的“飞鱼”式空对舰导弹，击中了英国航空母舰的护卫舰“谢菲尔德”号正心。这条军舰刚刚建成，花了2亿多美元，可怜初作处女舰，便葬身鱼腹！而20人被炸死的噩耗，更使英国举国震惊！于是，英国街头第一次出现了反战示威活动。在此之前，英国人对马岛战争的了解，仅仅是特混舰队雄纠纠、气昂昂地驶出英国海域，驶向南大西洋的盛大场景。当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号被击沉时，他们认为这是对“入

侵者”应有的惩罚。但是当他们在电视上看见英国士兵血淋淋的尸体时，才突然恍悟到战争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这样，要求立即停止战争，举行和谈的呼声在国内日高，下院里关于战争的辩论也日趋激烈；工党领袖富特就撒切尔首相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提出谴责。英国士兵也有了牢骚之声……

国内民众情绪的变化无疑加重了撒切尔夫人的精神压力。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这种变化她是早有估计的。她于是做出同国民在一起的姿态。在那些日子里，她身着黑服，以示对死者的缅怀、对死者家属的关切和对战争的反感。她经常在公开场合热泪盈眶，甚至辍泣不止。以往面对公众发表演说，她总是伸出双手向掌声致谢。现在她则两手低垂，深深鞠躬。撒切尔夫人的泪水和谦卑，显示出一个正常母亲和女人多情慈悲的一面，深深地打动了国人。人们开始体谅和理解她为祖国荣誉而不能不为之的作为战时首相的另一面了。这样，反对党对她的攻击倒是显得不通人情了。

5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调解最终归于失败，马岛之战全面升级……撒切尔夫人咬紧牙关，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她坚信英国水兵不会辱没使命。终于，6月14日，阿根廷守军缴械投降，“米”字旗重又骄傲地飘扬在马岛主峰。撒切尔夫人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事后，人们议论，撒切尔夫人为什么这样固执地要打这场马岛战争呢？有研究者认为，其原因有两个：

第一，从长远看，撒切尔夫人经常想着如何能在她的任期内重振昔日大不列颠帝国的荣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实际已沦入二流大国的地位了。而马岛战争是让世界重新认识英国国力、军威风采的绝好机会。撒切尔夫人认为，如果把一件要做的事同民族的自豪感结合起来，总会唤起人们对帝国的憧憬。撒切尔夫人对马岛战争讲了这样一些话：

“当我们开始动手的时候，有些迟疑不决和性格懦弱的人认为，我们真的干了，也干不成什么大事；他们以为我们的衰落已经不可挽回了，我们再也不是从前的那样了，英国不再是曾建立起一个帝国、并且统治1/4世界的民族了。他们错了！”

诚然，也可以这样说，打这么一场小战争所赢得的“自豪感”延续不了多久。但是，无论如何，撒切尔夫人认为，在她出任首相的第三个年头干了这么一回事，毕竟是苏伊士运河战争以来所没有的。她想通过这个举动让世界对大不列颠民族再一次刮目相看！而战争结束之时，作为撒切尔夫人个人，她不仅在英国国内声名大振，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显赫一时。在许多人看来，她是比上台不久的美国总统里根更强有力的政治家，更适合担当西方世界的领袖。撒切尔首相的威望由此达到顶峰。她似乎就是另一个温斯顿·丘吉尔——一个伟大的大不列颠民族利益的守卫者了。

第二，是近期的原因。马岛战争结束后，也许在战争没有打起来以前，撒切尔就已经想着下次大选了。按5年一任计，下次大选应于1984年举行。历史上的英国首相总要利用首相有权决定提前大选的权利，为自己准备有利时机，或为了促成一个有利时机而作准备。以“民族”的名义发动的这场马岛战争。巩固了她对保守党和对全国的统治地位。于是撒切尔夫人趁此东风，提前举行大选，终在1983年6月得以继续连任首相。

明代揭喧《兵经百篇·发字》云：“制人于危难，扼人于深绝，诱人于伏内，张机设阱，必度其不可脱而后发。”撒切尔夫人在马岛之战中，先是尽力避和，以获取军事上的优势，然后才放言求和，从而将她的对手加尔铁

里置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加尔铁里最终选择了继续战争，这又正中撒切尔夫人的下怀。于是她利剑高扬，终打得加尔铁里树起白旗。撒切尔夫人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设计圈套周密，让对手乖乖地往里钻。同时也使得那些反战的反对党及国内外普通人或者转变立场，或者口拙舌讷，有利于她去政手赢得“保卫主权”的马岛之战。从这种意义上讲，撒切尔夫人对自己一方也是“张机设阶”，只不过目的并不坏——是为了排除干扰而已。至于她通过马岛之战又赢得了政治资本，则又当另作别论了。但有时候，公心与私心、良心与黑心往往交织在一起，是难以分开来议的。

美苏签定中导条约 双方大做外交文章

1987年12月8—10日，美国总统里根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会晤，就签署全部销毁两国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进行磋商，最后达成协议，签署了中导条约。事后里根不无得意地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条约”，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戈尔巴乔夫则说，这是走向未来的“伟大的一步”，他同时也认为，“1987年12月8日成为核威胁不断增长和人类生活摆脱军事化的分水岭”，但现在“就戴很多桂冠为时尚早”。苏美两国首脑挥动小小的笔头，宣判了2000多枚核弹的命运，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两国削减的核弹还只不过是“整个冰山上的一角”，悬在世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的威胁并没有真正消除。

自从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以来，整个世界便日益笼罩在核大战的阴影之中。然而，就世界两个最大的核武库美国和苏联来说，几十年激烈的核军备竞赛耗费了大量国力。昔日用以威慑对方的庞大的核武器储备，已成为这两个超级大国身上越背越重的包袱。而世界越来越高涨的反核军备竞赛，要求核裁军的和平运动，也成了其顺水推舟，以放下包袱的一个绝妙支点。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莫斯科会晤以来，双方就此问题的谈判断断续续、时起时伏，总是只开花不结果。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在外交上，特别是在美苏关系上，发动了强大的和平攻势。同年10月戈尔巴乔夫在访问法国期间提出了关于美苏战略武器谈判的新建议，11月里根则提出反建议。接着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了引人注目的会晤。

1985年11月19—20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会晤，这是美苏关系紧张对峙6年之后两国首脑的第一次会晤，也是战后两国首脑的第八次会晤。

这次会晤的突出特点是笼罩着十分神秘的气氛，令人难以捉摸。19日上午10时，两人在美国代表团总部所在地莱蒙湖畔一所19世纪古老别墅——水中花宫台阶前会面，按原计划，每天都以里根同戈尔巴乔夫私下会晤15分钟为开场，然后举行双边正式会谈。可是，当他俩走出密室进入大厅时，已是11时零4分了。两人的首次会晤谈了1小时又4分钟。

19日下午，双方在地区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尖锐对立。沉默一阵后，里根站起来说：“何必这么僵着，出去走走，呼吸点新鲜空气好吗？”戈尔巴乔夫说：“好主意，新鲜空气能产生新鲜主意。噢，外面冷，您得穿大衣。”两人

边走边谈了5分钟。以后记者笔下的“湖边漫步”便渊源于此。

1985年的欧洲冬天突然早临，零下十几度的寒潮冻得迎接美苏首脑的瑞士仪仗队员在雪地中打哆嗦。戈尔巴乔夫也不停地用手巾抹擦鼻涕。于是里根又陪同戈尔巴乔夫进入湖边小舍，守着熊熊火炉，继续交谈。是为“炉边对话”。

这是不是里根、戈尔巴乔夫，特别是演员出身的里根有意为记者们制造出的浪漫话题、新闻花絮呢？

起草小组经过连续30多个小时的艰苦工作，到21日清晨4时30分才最后写成联合声明。21日上午，在国际会议中心，里根将戈尔巴乔夫拉到贵宾

休息室，他发挥了昔日演员的才能，导演了两人一起“向全世界亮相”的场面。10时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近5000名记者前一起露面。10时21分会晤正式结束。

对大批记者来说，这是一次很艰难的采访。19日美苏代表团发言人在国际新闻中心宣布：首脑会议期间实行新闻封锁。美国代表团发言人斯皮克斯话音刚落，就被记者们团团围住，几次想突出重围，都未成功。他说：“先生们，我饿，还没有吃饭呢！你们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又没有参加会谈。想说的不知道，知道的不能说。怎么样，吃饭吧！”看来里根随员们的演员功夫也并不比里根逊色。如此吊胃口，使记者们叫苦连天，却痴心不改，巴巴守候，可是，直到21日上午10时之前，他们一直无法得到双方会谈的实质内容。

首脑会晤的“成果”主要表现在联合声明上，双方表示愿意加快军备控制谈判，各自砍掉战略核武器50%。但是，联合声明承认：“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存在严重分歧”。例如，苏联强烈要求美国放弃其“星球大战”计划，而里根“仍然一如既往地认为，这个研究计划……是必要的”。美联社评论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炉边对话”和“湖边散步”气氛好像十分“亲切”，但对于世人最为关注的如何限制军备竞赛的问题并没有达成具体协议。

熊熊炉火难消积雪坚冰。但是，以这次会晤为标志，美苏之间前几年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状况有了改善。联合声明公布后，里根便立即对记者发表讲话，一副潇洒轻松的模样：“我日内瓦之行是为了寻求美苏关系的新起点而来，这一目的已经达到。”戈尔巴乔夫也不愿掉镜头，亦很愉快他讲：这次会晤讨论了“苏联和美国人民关心的所有问题”，是“一次负责的讨论。”

1986年9月30日，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又相约出新，同时宣布，两国首脑定于10月11—12日举行“临时性会晤”，地点是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在美苏首脑会谈之前，先举行一次“临时性会晤”，这在两国首脑会谈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但会晤没有取得成果。好在冰岛会晤失败后，两国首脑仍不气馁，继续着各方面的努力，以试探和寻找双方的共同点，终于迎来了1987年12月8—10日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华盛顿会晤。这次会晤签署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中导协议。

这次会晤之前，双方其实已拟好了中导协议草案。可是，华盛顿方面对此次会晤及中导协议大为不满的人也不少。因此，里根为了消除障碍，首先在会晤即将举行的4天前接受四家电视台记者的联合采访时说了一句颇有份量的话：“这些人在思想深处接受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里根这句话大大激怒了保守派，他们公开指责里根背弃了原则，为苏联的宣传工具所利用。不过，里根敢于“口不择言”，是因为他深深了解最近频繁的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共和党内赞成中导条约和改善美苏关系的人占绝大多数。

首脑会晤前夕，代表各种派别和主张的游行示威陆续不断。12月5日中午，来自全国各地的和平组织的成员约3000人冒着寒风，在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集合，然后手拉手组成一条“人桥”，从白宫一直延伸到四个街区以外的苏联驻美使馆。在“人桥”的两端，各有一批儿童把鲜花送到白宫和苏联使馆。一名小女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她希望“消灭了小导弹后，再消灭大导弹”。儿童们在苏联使馆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可是到白宫传递和平信息的10名儿童却吃了闭门羹。白宫人员因事先没有准备而措手不及，白宫发

言人对此表示遗憾。舆论界认为，苏联先得了一分。不过，在里根的宣传战中，苏联人的“抢镜头”只是小菜一碟罢了。里根要上演的，乃是一次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大制作”哩！

美国方面从12月4日开始发放采访首脑会谈的特别记者证，当天全国新闻大楼6层过道里挤满了从世界各地赶来报道首脑会议的6000多名记者。为报导这次会谈，美国四大电视系统更是不惜工本，投入大量人力，仅美国广播公司就投入910人。

美苏双方在两国首脑会晤以前作了大量的争取舆论的工作。11月30日—12月5日，美国大小政府官员共向记者“吹风”11次，美国新闻界向每个采访首脑会晤的本国和外国记者发了它编写的一本厚厚的“背景材料”。苏联先遣队中有20名负责情况介绍的官员、160名专家。他们到达华盛顿后，在麦迪逊饭店一住下，便在新闻俱乐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为了确保美苏首脑会议顺利进行，美国国务院、特工部、华盛顿警察局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几周之内召开了50次会议，特工部许多工作人员日夜工作，加班加点。他们出动直升飞机巡视戈尔巴乔夫的汽车通行的道路，对苏联官员下榻的华盛顿15街和M街路口的麦迪逊饭店里里外外也都进行了检查。对于将放置在华盛顿纪念碑上的摄影机也要让经过特训的警犬嗅审。

美国方面如此大动干戈，大事铺张，除了确实具有安全因素的考虑外，也含有烘托气氛的意味。

8日下午2点02分（美国东部时间），在军乐队演奏《向元首致敬》的乐曲声中，美苏两国首脑并肩步入白宫大厅。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相继发表简短讲话后，一同坐在中导条约的签字桌旁，在厚厚的条约文本上签字，一共签了16处。这是美苏裁军谈判史上第一次真正减少核武器数量的条约。

根据中导条约规定，在条约生效后的3年内（1991年之前），美苏双方将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共2611枚，其中美国859枚，苏联1752枚。根据联合国的材料，美苏目前核武库中存有大约5万枚核弹头，其爆炸总威力约为130亿吨。根据中导条约规定美苏双方将要销毁已部署和未部署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数量在双方核武库中仅占4%左右。

中导条约所遵循的目标是加强战略平衡，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将有助于减少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与加强国际和平。

条约规定双方在条约生效后的3年后都不再拥有中程导弹、发射装置及有关辅助设施，在条约生效18个月后都不再拥有中短程导弹、发射装置及有关辅助设施，条约生效后都不再生产任何中程和中短程导弹以及有关这种导弹的发射装置。

事后，里根以自豪的口吻宣布他和戈尔巴乔夫“做出了永垂史册的事情”，戈尔巴乔夫说他和里根“栽下了能长成和平大树的幼苗”。

克林顿以武力相胁 逼海地军政府下台

1994年9月15日晚，加勒比海上空，风云骤变。美国总统克林顿于当晚9时30分发表电视讲话，向以塞德拉斯为首的海地军人政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立即下台出国，否则美国将对其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几分钟后，海地武装部队司令塞德拉斯则在电视里公开宣布，拒绝克林顿的最后通牒。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宁愿战死也不离开祖国，我不能给子孙后代的脸上抹黑。”他声称：

“海地军民将尽一切可能抵抗入侵，美国入侵部队会遇到海地人民的顽强抵抗，入侵有可能以大屠杀而告终。”

这样，继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以后，加勒比海又面临着一次战争危机。

1992年，以塞德拉斯为首的海地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海地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而上台执政。从此，阿里斯蒂德流亡美国，为恢复海地民主而四处奔波。当然，美国对海地动武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要真正维护什么民主，而在于海地军人政权上台以来在一系列问题上敢于向美国说“不”，致使美国愈来愈心烦意乱。因为加勒比海地区已有一个桀傲不驯的古巴在那里长期与美国作对，海地军人政权近三年来的作为，无疑已成为古巴事实上的盟友。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必须彻底孤立古巴，绝不允许在美国后院再冒出一个古巴来。

鉴于此，克林顿授权驻联合国大使策动一些国家在联合国通过了要求塞德拉斯交出政权，否则就要用武力解决海地问题的决议。可是，海地军人政权仍未被吓唬住。这使克林顿颇有些骑虎难下。要知道，前一段时期克林顿政府一直被指责在波黑、海地和朝鲜问题上立场软弱，无所作为，使美国超级大国的形象受到损害。两年来，美国对海地军人政权使用了外交说服、经济封锁与军事威胁种种手段，塞德拉斯等却毫无妥协迹象。现在，由美国发起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可以用武力解决海地问题的决议之后，如果美国不带领多国部队对海地进行武力干预，美国的大国威望和信誉将丧失殆尽，今后类似伊拉克和伊朗这样与美国敌对的国家也将不再把美国放在眼里，因此，形势逼得美国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进入海地，通过解决海地问题重树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有能力解决国际难题的形象。

克林顿在15日晚的全国电视讲话中透露，解决海地的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万名美军进入海地，推翻军政权的统治并恢复阿里斯蒂德总统政权；第二阶段，大部分美军将撤出海地，一小部分美军将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派出的部队一起在海地承担维和使命。但人们在评论这一计划时都指出，小小海地可能对美军造成不可小视的威胁，也可能使美军尽快粉碎抵抗的计划无法如期实现。这，克林顿不是没有看到。同时，国会、报界和民众的多数都反对美军入侵海地，如果强行下令，万一美军遭受伤亡，总统本人将承受八方指责。因此，克林顿在发表完电视讲话后，仍决心向海地派出特使，去游说塞德拉斯，再做一次外交努力。如果谈判成功了，就可以避免美军入侵和流血，使政治风险化为乌有；退一万步讲，即便谈判失败，也可表明总统尽了一切努力避免动武，是海地军人执迷不悟才使流血难免，从而

使美国公众对总统多凡分理解和同情。

那么，派谁去充当肩负如此重要使命的特使呢？克林顿想到了前任总统吉米·卡特。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卡特一直要求白宫给他分配任务，派他到海地调停危机，不久前他从非洲和俄罗斯访问回国后，发现海地军人政权的外交部长戴维给他寄来一封信，邀请他担任调停人。卡特通过中间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海地军事强人塞德拉斯，几分钟后，塞德拉斯打来电话，表示希望跟美国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塞德拉斯的弟弟担任他们之间的翻译。卡特立即征求前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和参议院现任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纳恩的意见，并邀请他们同行。当对方接受邀请后，卡特将事情经过通报克林顿总统，希望批准他们作最后的和平努力。

9月16日下午，克林顿宣布：为了尽最后一刻的努力避免战争，现派遣卡特前总统、鲍威尔将军和纳恩主席前往海地首都太子港，任务是跟海地军万人土谈判他们下台和离开海地的方式问题。

在宣布这个决定前，克里斯托弗和副国务卿塔尔伯特明确反对卡特这一人选，认为卡特为人过于软弱而且随意性太强，难于控制，搞不好只会把事情搞糟。再说，让前总统前去谈判，会使人产生现政府无能的印象。因此，克里斯托弗坚持派政府现职官员出使海地。而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却认为，为了使海地军人首领感到不失尊严，应当派有影响的人物前去谈判。卡特身份特殊且与海地有过交往，又富有解决国际难题经验，因此是最佳人选。

经过精心考虑，克林顿也同意卡特提出的其他人选，决定派声望卓著的退休将军鲍威尔和资深参议员纳恩与卡特同行。意图很显然：黑人将军鲍威尔前往海地，会使美国民众、特别是黑人对谈判给予更多支持，而纳恩加入谈判则可使国会议员对谈判的批评声音减弱。

尽管克林顿决定派卡特出使海地，但总统与主要顾问们在给予卡特多大授权的问题上仍然意见相左。国务卿、国防部长和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都认为，卡特等人的使命很简单，就是要求海地军政权3名首领在18日中午12时以前下台并必须离开海地，否则美军应马上开始军事行动。然而，思量再三，克林顿总统却授权卡特：尽力达成一项协议，只要军人首领同意下台，也可下要求他们离开海地出走。但是，谈判不能拖过18日中午，如达不成协议，军事进攻将按原计划于18日午夜开始。

肩负着克林顿总统的特别使命，卡特一行于17日一早乘专机向海地首都太子港飞去。

从走下飞机进入海地首都太子港的第1分钟起，卡特等人就马不停蹄地展开了一场接一场的外交谈判。

17日上午，他们首先与海地临时总统约纳森举行谈判，接着会见了一批当地知名的工商界人士，随后又与议员们进行了交谈。从下午起，卡特等与海地军政权首领塞德拉斯将军和毕安比将军在两层楼的军队总部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

谈判一开始，卡特就发现白宫对他的授权大狭窄，因为事情非常复杂。他们在谈判中不可能只谈塞德拉斯等人下台时间表和离开海地的方式问题，还必须讨论如果海地军方领导人政弃权力下台，海地军队如何迎接美军登陆维持和平以及美国如何取消对海地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的问题。

17日本来是个星期六，然而，克林顿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们顾不得休息，一整天都呆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候消息。克林顿通过卫星保密电

话始终与卡特等 3 人保持着联系。但从 17 日上午直到深夜，从海地传来的都是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的坏消息。这时，国防部长佩里提醒总统说，如果 18 日入侵计划不变，现在必须下令军队进入全面准备状态。眼看谈判没有进展，身为三军总司令的克林顿略加思索后下令说：命令部队开始准备。几分钟后，海地水域周围的军舰、美国本土基地上的大型运输机和伞兵部队都进入了战备状态。

在太子港，卡特等先使出了“硬”的一手。卡特开门见山，“劝告”两位将军主动交权，以避免和海地军队一起全军覆灭。鲍威尔实言相告：你们难以想像美军火力的猛烈和强大程度，几乎没有重武器的海地军队不会有还击之力。纳恩则说：国会虽反对动武，但在总统一旦下令之后，国会只能以一个声音一致支持总统和美军行动。塞德拉斯没有被美国来客的威胁所吓倒。他说，海地虽然是个小国，但却有自己的尊严，如果美军真的入侵，海地军队和人民不会投降，而将奋力抵抗。谈到自己的命运，塞德拉斯说，在当上军人的第一天，他就宣誓以生命保卫国家，他宁可战死在抵抗美国入侵的战斗中，而决不愿因出卖海地而被本国同胞所处决。

海地政府内的一位官员悄悄告诉卡特，要想说服塞德拉斯和毕安比，必须首先做通塞德拉斯夫人雅尼克的工作。塞德拉斯对夫人言听计从，而后者对毕安比也有绝对的影响力。正苦于无计可施的卡特等 3 人喜出望外，夜里只睡了三四个小时，18 日一大早就登门拜访。最初，雅尼克态度异常坚决：“丈夫身为军人，理当为国献身。我和三个孩子也宁可以死报国。”同是黑人的鲍威尔将军一再以“个人生死事小，以妥协换取海地人民不流血更为重要”相劝。经过近 4 小时的攻心战，雅尼克勉强表态支持寻求妥协。此外，卡特还同塞德拉斯夫妇的孩子进行了交谈。

克林顿总统原来规定卡特一行在 18 日中午离开太子港，免得妨碍美国的军事行动。时至 18 日中午 12 时，谈判还没有结果，海地军方拒绝下台流亡国外。这时，聚集在克林顿办公室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国防部长佩里等人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他们要求卡特一行如果没有希望达成协议，马上离开海地。

可是卡特强调，强迫一个公民流亡国外将严重违反人权，他要求克林顿政府跟海地军方来个折衷方案，同意他们在国会通过赦免法后再让他们下台。克林顿总统通过卫星电话指示卡特，谈判时间可以延长到下午 3 点，不管谈成谈不成，他们不得晚于下午 3 点离开海地。放下电话，克林顿马上便把谈判进展告诉了身边坐立不安的高级顾问们。与此同时，为防谈判出现不测，克林顿又下达命令，要担任入侵任务的 2 万名美军部队在 19 日零点 1 分开始对海地的军事行动。

尽管塞德拉斯和毕安比两人同意主动下台，但自 18 日下午起的有关协议条款的谈判进展并不顺利。塞、毕先是不同意流亡总统阿里斯蒂德返回海地；后又对议会和新总统大选日期提了相当苛刻的条件。

下午 3 点，克林顿打电话给卡特，要他马上终止谈判，登机返美。卡特以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为理由，要求克林顿再给一些时间。克林顿同意再延长谈判时间 1 小时。

下午 4 点钟，谈判仍僵持不下，卡特担心克林顿又打电话来催，再也顾不上保密，就使用普通电话叫通白宫，恳求克林顿再给 1 小时时间，克林顿非常勉强地又一次表示同意。

下午 5 时，卡特与塞德拉斯终于达成一项协议。协议规定，塞、毕等 3 名军人首领在议会通过大赦今后主动提前退休、此后流亡总统马上返回海地，但协议却没有规定议会何时开会通过大赦令。当呆在白宫的克林顿和高级顾问们接到文传发来的协议草案时，都表于不能接受。克林顿问，如果议会开会时间无限期拖下去，怎么办？克里斯托弗也表示一定要规定一个最后期限。记者出身的副国务卿塔尔伯特气呼呼地拿起笔在协议上写下了以 10 月 15 日为塞、毕等下台最后限期的条件，就把修改稿用文传发给了卡特。

下午 6 时 30 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焦躁不安的克林顿来回踱步，其他所有人也都已对谈判前景近乎绝望。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国防部长的提议，克林顿下令美国第 82 空降部队的 61 架飞机从北卡罗来纳州的空军基地起飞，前往海地开始执行美国的军事入侵计划。飞机起飞的时间是下午 6 点 47 分。紧接着，克林顿叫通电话，以一种既是请求又是命令的口吻对卡特说：“我们是多年的好友。但我不能不下达命令要你和代表团所有人在半小时内离开太子港。你们必须马上离开。”卡特不愿服从克林顿的命令，仍然坚持要继续谈判以达成协议。白宫这边，克林顿的高级顾问们已在研究万一卡特等成为人质，如何加以营救的问题；海地那里，卡特、鲍威尔和纳恩内心里已经准备好成为塞德拉斯手中的人质。

美军空降部队的飞机从北卡州空军机场一起飞，机场附近的一名美籍海地人立即打电话给海地军方通风报信，毕安比准将接到这个十万火急的消息后，立即怒气冲冲地闯进谈判会议室。他大声嚷道：我们不能相信美国人，美国进犯海地的飞机已经起飞，我们必须立即中断谈判，我们必须立即准备迎战！

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卡特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他们即将达成协议，这个消息可能使他们的谈判前功尽弃。但卡特仍在作最后努力。后来双方决定把谈判地点搬到总统府继续举行。卡特向对方保证，如果双方能够很快达成协议，他们仍有时间要求克林顿总统取消军事行动。美国飞机马上就要飞抵海地的消息加速了美国同海地军方的谈判速度。

下午 7 时 30 分，协议终于达成。协议规定，在议会最迟于 10 月 15 日前通过大赦令和塞、毕等三人提前退休后，阿里斯蒂德总统将返回海地执政。但协议没有要求塞、毕等三人离开海地。协议草案传到白宫。

克林顿在办公室来回踱步思考了片刻后，于 7 时 45 分，在电话里告诉卡特，同意协议条文。克林顿还授权卡特在协议上正式签字。

在海地总统府内，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被美国指定要签字的塞德拉斯中将和毕安比准将不愿意在协议书上带头签字，而被美国称为“傀儡”总统的约纳森这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位 81 岁的老人嚷道：“我们需要和平，不要战争，我在协议书上签字。”他的内阁部长们一个个看得惊慌失措，国防部长当场表示抗议并且提出辞职。为了避免战争，塞德拉斯中将最后也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下午 8 时整，克林顿总统下令取消入侵行动，正在飞往海地的几十架飞机掉头返回美国基地。

晚上 9 时 30 分，克林顿总统在白宫的电视讲话中公布了协议的内容，并宣布从 9 月 19 日开始，2 万名美军将和平进入海地，以确保海地政变军方领导人在 10 月 15 日之前交权。在记者的闪光灯下，卡特显得很疲惫苍老，但那疲惫苍老的脸上却透溢出一种完成使命后的宽松与欣慰。

巴以言和，舍小而谋大 铸剑为犁，干戈化玉帛

1993年8月的最后几天，中东大地传出一则消息犹如一阵惊雷令世界目瞪口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政府秘密和谈成功，以色列决定从1967年占领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城撤军，由巴勒斯坦人首次在那里实行自治，巴解和以色列互相承认。

8月29日，巴解宣布准备修改巴解宪章，显示了巴以互相承认的先兆。8月30日，以色列内阁举行会议，以16票赞成、2票弃权，通过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方案。中东两大民族在经过4次战争和45年敌对之后，终于通过和谈达成协议，朝着全面解决阿以矛盾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中东是当代世界“地区性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又是这场冲突的中心。阿、以矛盾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

公元前18世纪，从两河流域迁徙而来的希伯来人（古代犹太人），在南（今巴勒斯坦）几经辗转，历经沧桑，于公元前11世纪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在三代国王扫罗、大卫和所罗门的苦心经营下，王国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繁荣的统一国家。公元前926年统一王国分裂成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太王国，两个王国分别于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被亚述和巴比伦灭亡。此后，巴勒斯坦地区又先后被波斯、希腊和罗马人所征服。公元135年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的最后一次起义失败后，被迫开始向世界各地大流散。从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失去优势地位，人数也不断减少，最少时仅有上千人。

7世纪，巴勒斯坦归入阿拉伯帝国后，当地居民多数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与陆续迁人的阿拉伯人互相影响、融合、形成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即巴勒斯坦人。此后，他们世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

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出现，使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断向巴勒斯坦移民，因争夺土地和生存条件，阿、犹矛盾开始产生。本世纪20—40年代，英国在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时期，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阿犹矛盾日趋尖锐，最后发展到兵戎相见、同室操戈的地步。1947年11月，第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两个国家。随着1948年5月以色列国的建立，阿、以矛盾迅速升级，终于演变成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5次战争：第一次阿以战争（1948年5月15日—1949年7月7日）；第二次阿以战争（1956年10月29日—11月6日），又叫苏伊士运河战争或西奈战役；第三次阿以战争（1967年6月5日—6月10日），又称“六·五”战争或“六天”战争；第四次阿以战争（1973年10月6日—10月24日），又称十月战争（以色列称赎罪日战争，阿拉伯人称斋月战争）；黎巴嫩战争（1982年6月4日—8月21日），有人称第五次阿以战争。这五次战争给参战双方带来巨大损失，据统计，阿拉伯国家共伤亡88362人，以色列伤亡41175人。参战各方的财产损失更为惨重，仅以埃及为例，在它参加的前四次阿以战争中，共耗资400多亿美元。

随之而来的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大片土地，便成为20多年来

阿以矛盾和冲突的焦点。被占领土问题不仅是引发阿以冲突的导火线，也是以色列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重大的政治分歧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以漫长的敌对史中、惯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双方都以对历史的不同解释使彼此为敌。犹太人意识到他们被凯撒大帝逐出后，浪迹天涯，受尽迫害，几乎灭绝。在回到耶路撒冷这块上帝赐给的土地后，他们看到自己又陷于致命的危险中。而阿拉伯人则把现代以色列当作是改头换面的殖民主义者，是 1000 年前西方十字军东征的继续。

从小规模的冲突开始，一直发展到整个中东都卷入的大血战和超级大国冲突的前哨，历史的背景由此使得拉宾的陈述更有意义：“历史再不应成为障碍。”他说，30 年的惨重损失和痛苦教训使双方开始明白，和平共处是两个民族在同一块土地上生存的唯一选择。1978 年，在美国斡旋下，埃及和以色列经过长达半个多月的谈判，终于签订了“戴维营协议”（《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1979 年 3 月 26 日双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签署了埃以和约。1980 年 2 月 15 日，埃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埃以和平的实现，结束了阿以之间 30 年之久的全面交战和对峙状态，开辟了政治解决阿以冲突的中东和平进程。

但是中东和平进程在 80 年代一直停滞不前，和平的愿望和计划仅是纸上谈兵，有关实现中东和平的国际会议也是一拖再拖。直到 1991 年 10 月，在有关各方的努力下，马德里中东和会终于召开，从而开了阿以双方坐在谈判桌旁解决中东问题的先河。

美国对中东的和平可谓用心良苦。中东地区有美国重大的战略利益。仅从表层看，力促阿以和谈成功对美国外交也大有益处，克林顿政府需要在对外政策上取得成就以缓解国内对其“只重内务，不重外交”的批评。从更深的层次上说，美国目前正奉行“经济主义外交”战略，全力追求“经济安全”目标，力图以“经济安全”、“扩展理论”和“多边主义”取代冷战时代的“遏制主义”。这种地缘经济战略客观上要求美国避免再次卷入中东地区大规模军事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漩涡，避免在中东冲突中付出高昂代价，力求在对其战略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形成长期稳定与和平的局面。尤其是第 41 任总统布什任内后期，美国不得已发动了海湾战争，使中东地区的东部处于剧烈震动之中。这样中东西部的动荡局面便不容许再继续下去了。布什及其国务卿贝克因而力主加速中东和谈。但是，阿拉法特在海湾战争中对萨达姆的支持，使很多海湾国家对他表示不满，亦使美国深为不快。他们对阿拉法特的冷落，使得素有“和平之邦”的挪威乘隙成为阿以自治协议谈判的撮合人。

1993 年 1 月，寒风凛冽。此时美国正忙于第 41 任总统布什与第 42 任总统克林顿的政务交接事务。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东道主正在热心筹划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见。应邀的两方来客乘坐不同的航班在不同的机场先后降落。下机后，等候多时的轿车立即迎上前去，然后向 80 公里以外的一座庄园飞驰而去。

保尔高德庄园为 19 世纪修建的木质建筑，古朴典雅。在那里忙碌的挪威外交大臣斯托尔滕贝格介绍来客相见。1 月 20 日，在他的主持下，以色列和巴解的代表开始了面对面的直接会谈。

一切都严格保密。除挪威外交大臣等几个人知道之外，只有巴解和以色列少数领导人知道，双方各自都向自己的盟友保密。为了避免被人发觉，谈

判地点经常更换。一会儿在保尔高德庄园，一会儿又改在外交大臣家中，要不就在偏僻的农舍或奥斯陆一家旅馆的第32层，7个月中在这些地点共举行了14次谈判，另外还在另一国家谈了3次。从5月起，会谈级别增高，由以色列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乌里·沙维尔和法律顾问与巴方阿拉法特的高级顾问阿布·阿拉等举行会谈。6月份双方开始就履行自治方案的具体细节进行讨论。

双方受拉宾、佩雷斯与阿拉法特的直接指示，在谈判中经常唇枪舌战，讨价还价，气氛紧张。据说“拉宾对协议草案的每一个标点都不放过”。8月20日，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在访问挪威之际秘密草签了这一自治协议。

8月29日，以色列内阁开会，佩雷斯向全体阁员报告了“挪威渠道”的经过和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方案的产生，在座部长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他们对巴以双方超越美国举行会谈并产生协议，惊讶不已。

1992年7月以色列新总理拉宾执政后，决心要改善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形象，给巴勒斯坦人参政和经商的权力。当然拉宾政府和巴解组织都必须谨慎行事。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强硬派已威胁要谋杀阿拉法特，更严峻的挑战来自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内部。在巴解组织遭遇到一系列挫折后，加沙地带和西海岸年轻一代的巴勒斯坦人趋向激进，很多人加入了原教旨主义军事组织。

相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阿拉法特却逐渐温和，苏联援助消失和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错误地站在伊一边，使他在财政上陷于困境。而他从幕后介入的与以色列两年的和谈亦未取得进展。

因此，这位被以色列人视为恐怖主义象征的阿拉法特令人吃惊地同意先在加沙地带实行自治。加沙是个没人要的弃儿，是极端主义的温床，贫民窟里的骚乱不断，很多示威者被枪杀，打伤或投入监狱，以色列人把它看作是个必须割除的毒瘤。

而阿拉法特之所以拿生命去冒险，是想通过以色列撤军和国际社会的援助，从原教旨主义者手中夺回权力。自治后的巴解，必须将松散的结构转换成具有实际的管理职能。

阿拉伯国家过去总是把巴勒斯坦处于自己的保护伞下，现在则必须转入到同它合作。由于巴勒斯坦的包袱阻碍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繁荣，他们也很愿意这样做。

至于以方、虽然拉宾、佩雷斯在巴以会谈后期及时向美国通报了情况，但整个谈判过程没有请美国人参加，却迅速取得了进展，这一点委实使美国政府甚为难堪。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31日说：“巴以达成协议的消息使克林顿政府感到有点尴尬，美国成了局外人。”

但是，美国是决不甘心扮演此类角色的。特别是克林顿总统必须要迅速摆脱这种尴尬局面；第一，克林顿总统及其副手戈尔副总统在就任现职前被舆论（特别是阿拉伯舆论）公认为偏向以色列的。他必须干净利落地消除人们的这种看法，积极主动地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使会谈不至于没完没了毫无结果。第二，克林顿总统当选以后，世界各国都以为他在经验上、特别是外交经验上不足，都抱着等着瞧的态度。匈牙利外交部长盖佐就直言不讳他说，他相信在克林顿的领导下，美国不会变得“内向”。他又说：“克林顿必须证明自己同布什一样有能力处理对外事务。”

9月初，克林顿与副总统戈尔及国务卿克利斯托弗经过紧急磋商，决定

以替巴勒斯坦的经济重建筹款为诱饵，毫不客气地去摘取挪威外交斡旋的桃子，将巴以和解协议的正式签字仪式移到华盛顿来举行。

美国的盛情邀请，使阿拉法特很是感动，拉宾、佩雷斯也觉得更为体面，挪威则忿忿之余无可奈何——毕竟美国财大气粗呀！

正式签字仪式定于9月13日在白宫南草坪举行，已向全世界作了宣布。而这，又应是克林顿就任总统以来在外交上的一次大杰作。

克林顿总统习惯于后半夜才上床休息，可9月12日晚上，却一反惯例，10点钟就解衣休息以便能有充沛精力主持13日的巴以协议签字仪式。心中有事梦不长，这对总统也不例外。凌晨3时，克林顿突然醒来，脑子里充斥着上午将在签字仪式上讲话的内容，特别是讲话中引用《圣经》中的一段话。他爬起身来到书房，拿起《圣经》找到引语的出处，又读完了与引语有关的故事，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这时他发现，白宫另一侧总统顾问们的几间办公室里也是灯火通明。原来，克林顿12日临睡前发现，13日讲话里有一段话引自《圣经》，却没有取自《可兰经》的引语，显然不够平衡，他要求属下想法弥补。时间紧迫，虔信基督教的顾问们别无他法，只好连夜苦读《可兰经》，但一无所获，最后只好在凌晨3时打电话唤醒沙特阿拉伯驻美大使，才问出一段恰当的《可兰经》引语放进克林顿的讲话稿里。

不过，阿拉法特与拉宾虽然已经答应来华盛顿参加巴以协议签字仪式，但敌对多年的两个民族的代表，能否在仪式上当众握手，谁也没有把握。13日10时30分前后，拉宾及其随从先后被引入白宫蓝厅，与克林顿总统等美国官员见面。本来白宫官员想让这两人站在一起拍张照片，但拉宾和阿拉法特彼此相距15英尺，互不理睬，照相的想法自然告吹。最后，当蓝厅里只剩克林顿、拉宾和阿拉法特三个人时，拉宾才向阿拉法特说了第一句话：“你要知道，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阿拉法特回答说，“我知道，我会做该由我做的那一部分”。但拉宾和阿拉法特并未握手。

11时45分，当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巴勒斯坦代表阿巴斯在协议上签字后，白宫南草坪上3000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主席台上的拉宾和阿拉法特。站在克林顿右侧的拉宾面无表情，一动不动；站在克林顿左侧的阿拉法特虽面带微笑，但也毫无想要握手的意思。这时，站在中间的克林顿着急了，要知道这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他有意让事情的结局十全十美。于是，他用右手拉住拉宾，用左手拉住阿拉法特，轻轻但有力地使他们向着彼此靠拢。这时，阿拉法特脸上已是堆满了笑容。他率先向前迈出一步，伸出右手；拉宾明显地迟疑了一下，随即伸出手和阿拉法特的手握在一起。这两只手曾经多少次签署过彼此开战的命令，这两只手曾经多少次挥舞着咒骂对方……如今为了和解而握在一起了。白宫南草坪上的3000人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同样站在白宫南草坪的主席台上，拉宾与阿拉法特的表现却大不相同。阿拉法特身穿黄咔叽军装，头戴白底黑点的巴式斗巾，始终笑容可掬，举止轻松自然；而军人出身的拉宾却神情呆板，显得局促不安。他大半时间低头望着自己的脚尖，当全场多次为克林顿和其他人的讲话而热烈鼓掌时，他却一动不动，毫无反应。主席台上的讲台后面，有一个木制踏板，是白宫官员担心个子矮小的阿拉法特够不着话筒而专门为其准备的。轮到高个子的拉宾发表讲话时，他也登上这块踏板，结果反而离话筒远了，弄得白宫官员们哭笑不得。

签字仪式结束后，克林顿、拉宾和阿拉法特走下主席台与前排的观众们

——握手。当走到主席台右侧时，坐在那里的一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儿童高声欢呼，并向克林顿、拉宾、阿拉法特各献上一件天蓝色 T 恤衫。T 恤衫正面印着三个儿童站在一枝橄榄枝上，下面印着英文字：和平的种子。克林顿、拉宾和阿拉法特不约而同地一字排开，都用双手把 T 恤衫在胸前展开。记者们用照相机摄下了这个难得的镜头。

巴以协议（即《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协议》）规定巴勒斯坦自治过渡期为五年、分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四个月内，巴勒斯坦人将接管加沙地带和杰里科镇的行政事务，以色列人只负责外部安全和保护犹太移民。

与此同时，西岸的其他地方将实行“准接管”，巴勒斯坦先在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和税收方面自治，它还将控制目前不景气但潜力很大的旅游业，以色列的政权仍将维持一段时间，直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选举产生为止。这将在 9 个月内完成，届时以色列安全部队从主要的城镇撤出，而数千名目前在约旦和埃及受训的警察部队将取而代之。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巴以双方就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土地的最终地位等进行谈判。从而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之所以还要再谈判，是因为巴勒斯坦人坚持要成立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并不急于这样做，但降低了反对的调门。最为敏感的是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想把它作为自己的首都，而以色列人坚决反对。

当以色列和巴解组织达成协议的消息传出之后，加沙地带的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从难民营里涌到街上，载歌载舞。此时大约 200 名哈马斯组织的成员冲击了庆祝队伍，至少造成 15 人受伤。

在所有反对巴以协议的力量中，哈马斯是最危险的一支，它产生于加沙地带贫困不幸的难民营中。早期，以色列当局曾经默许它的存在以牵制巴解，后来它则对以色列人的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以色列担心西岸自治后哈马斯会对犹太移民及新的巴勒斯坦政权构成威胁。他们还担心恐怖活动更容易进入以色列，因为他们将不再控制加沙港，这样如从海上走私的喀秋莎火箭就能直接袭击以色列城市阿什克伦。以色列议会中的利库德集团因而坚决反对巴以和谈，认为“这是在和希特勒以来犹太人最大的谋杀者做交易。”但是，由于大选中的失利，利库德集团当时除了抗议外无法有更多作为。

执政的工党领袖拉宾以及佩雷斯签署巴以协议则是出于更远的战略考虑。以色列数十年来一直和阿拉伯人处于敌对和战争状态，被占领土人民反以斗争此起彼伏，使以色列长期不得安宁，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困顿；外交长期处于孤立状态。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猛发展，成为对以色列的最大威胁。以色列必须调整战略。以土地换和平无疑成为以色列的最佳选择。况且加沙地带贫瘠落后，本为以色列侵占领土，放弃这块面积 354 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杰里科城，对以色列非但不造成威胁，而且是丢掉了包袱。

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也感到以色列的存在已是不容忽视的事实，用战争等手段收复被占领土已不可能。巴解内部矛盾加重，财源枯竭，对以和解必然会带来转机。此外，阿拉法特看到拉宾政府有和谈诚意，争取在拉宾任期内取得和解，促成被占领土逐步实现自治，以便最终在被占领土建立巴勒斯坦国。

巴以之间迅速达成自治协议，使旷日持久的阿以矛盾得到缓和，这完全是形势所迫和双方的实际需要，也受到双方多数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支持。这

以后，阿拉法特与拉宾、佩雷斯在克林顿的督促下，更是快马加鞭，加紧将纸上的东西化做现实。

10月6日，拉宾和阿拉法特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参与下举行会晤，首次在最高层讨论如何具体实现巴以协议以及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事宜。双方决定，从10月13日起，在埃及开始举行部长级会谈。

后续谈判对巴以双方都是一场严重考验。而协议得以贯彻的关键之一是避免横生枝节。阿拉法特已严格实现诺言：9月24日，被占领土巴解武装人员接到了他的命令：停止对以色列的一切军事行动。使以色列平民百姓感受到过去所得不到的安全与安宁很重要，他们会成为推动政府继续向前的力量。

再一个关键是使巴勒斯坦人得到实惠。巴解组织很有远见，已以秘密接触之初就着手制订经济发展蓝图，阿拉法特在华盛顿出席签字仪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美国国会呼吁援助。世界银行已确定了一个帮助被占领土筹措43亿美元的计划。10月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支持中东和平会议”，有43个国家参加，决定今后5年内筹款20亿美元。

筹款会议是美国操办的。虽然巴以协议的主要促成者是挪威外交大臣，但美国却大大咧咧地接过成果，由克林顿主持签约仪式，宣布同巴解恢复对话之后又主持筹款，这都是为了加强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在中东的西部平息阿以争端，有利于美国在阿拉伯东部对付伊拉克、伊朗，保护西方能源生命线的安全。仅从这一点看，美国也不情愿巴以协议的贯彻和整个阿以争端的解决发生逆转。

此后，克林顿亦加紧了对中东和平进程的进一步撮合。至1994年5月4日，阿拉法特和佩雷斯在开罗又签署了实施巴以原则宣言的第一阶段协议，即加沙-杰里科自治最后协议。

1994年10月26—28日，为了支持和扩大中东和谈成果、进一步推动阿以和平进程，克林顿又进行了首次中东之行。10月26日，克林顿访问了埃及和约旦。他在开罗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举行了会谈。克林顿表示，他将尽力争取阿以争端的全面解决，实现中东和平。他对在促进中东和平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埃及表示敬意，对阿拉法特表示将继续尽一切努力对付恐怖主义感到满意。在谈到履行巴以协议中向巴自治区提供资金问题时，他说，美国将在支持早日实现西岸权力移交的巴以协议中起带头作用。在约旦，克林顿参加了约以和平条约正式签署仪式，同侯赛因国王进行了会谈。他再次高度赞扬约以和约，称约以和平的成功将改变该地区的历史。10月27日，克林顿还访问了叙利亚和以色列，先后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以色列总理拉宾举行了会谈。他是20年来第一次访叙和15年来第一位访以的美国总统。

然而，巴以在达成原则宣言时克服了重重阻力，落实起来却更为艰难。这是因为双方当初为达成原则宣言采取了“先易后难”的策略，把每个阶段的实施细节都留给以后谈判来解决，而双方对实施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都估计不足。双方关于自治第一阶段的谈判比原定的日程拖延了7个月时间，直至1994年5月，巴勒斯坦人才在加沙和杰里科实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梦想。随后，在克林顿的敦促下，双方从10月开始进入自治第二阶段谈判，这一阶段共有三项主要任务，即：巴勒斯坦人应举行选举以产生自治的正式权力机构，在选举前以军应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聚居区撤军并重新进行部署，

以方应将西岸的绝大部分民政权力移交给巴方。但是，由于巴以双方在约旦河西岸以军重新部署、巴选举和民事权力移交等敏感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加上巴以内部反对和平势力的干扰和以政府曾决定在东耶路撒冷征地扩建定居点，致使谈判一波三折，险些破裂。

原来，以色列议会内反对巴以和谈的极右势力利库德集团不断煽动犹太人移民扩大定居点，主张更多地征用巴领土，并坚持耶城是以色列首都，巴人无权分享。1995年4月底，拉宾政府被迫作出征用53公顷东耶路撒冷阿拉伯领土修建犹太移民住宅的决议后，遭到阿拉伯世界的一致反对。5月17日，美国在安理会上使用否决权使得印尼等六国提出的要求以撤消侵占阿领土的提案未能通过，又在阿拉伯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和极大的愤怒。为此，东盟秘书长和摩洛哥国王积极进行联系，筹备5月27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阿拉伯小型首脑会议，研究延滞阿以和谈进程及同美国进行交涉问题。同时，以内部也对政府的决定存有严重分歧，议会阿拉伯集团提议对政府投不信任票，利库德集团从旁策应，发起了一场倒政府的运动。以色列议会中原本就存有两股倒政府势力，一是由阿拉伯民主党和阿拉伯民主阵线议员为主组成的反对政府征用东那土地决定的集团，即阿拉伯集团，一个是极右的利库德集团。这两个集团虽然出发点不一样，但倒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并有形成“合力”的趋势。

面对内外的强大压力，5月22日，拉宾总理紧急召集内阁会议，宣布冻结征用东耶路撒冷53公顷巴勒斯坦土地的计划，并决定组成一个以总理为首、几位部长参加的特别委员会，重新审议征用东耶土地问题。这是拉宾政府为避免腹背受敌而作出的决策。正如拉宾所言：“政府作出这一决定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利库德集团准备同阿拉伯集团合伙投票倒政府”。此外，约旦国王侯赛因等阿拉伯领导人同拉宾总理联系，劝其收回决定，以免阿以和谈陷入僵局，也对以作出冻结决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拉宾政府的决定更受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欢迎，使得巴自治第二阶段谈判获得重大突破。从9月16日开始，阿拉法特和佩雷斯在埃及塔巴连续9天共举行了近百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谈。这期间，双方提出了一项项建议和反建议，也拿出了各自绘制的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重新部署图。双方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至1995年9月24日，终于草签了塔巴协议。

塔巴协议的草签是巴以求同存异的结果，但也与外交斡旋密不可分。为了缩小巴以间的分歧，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塔巴会议期间，一直同谈判双方保持着热线联系，并在双方谈判出现危机时及时调解。

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在9月24日的草签仪式上强调，巴以在埃及塔巴草签的协议将促进中东和平进程。他相信，巴勒斯坦人民将和本地区人民一道为创造一个和平与稳定的新中东发挥自己的作用。

以色列外长佩雷斯指出，这次巴以草签的协议具有历史意义，它将把以巴两个民族联结在一起，给子孙后代带来美好的未来。他说，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以巴人民都将能找到一条克服困难的途径。

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巴以草签协议表示欢迎。他强调，该协议是中东在实现全面和平的道路上迈出的新的、重要的一步。1995年9月28日，克林顿又一次在白宫南草坪主持了阿拉法特与拉宾签署关于巴勒斯坦第二阶段自治即扩大约旦河西岸自治协议，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历史跨越。

这项协议确定：以色列撤出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口稠密区，包括6

个城市和希伯伦市的一部分以及 400 多个乡镇。这意味着在经过长时期冲突以后，以色列终于承认了巴勒斯坦人在这一块被称作“上帝赐与犹太人”的土地上拥有一定的统治权利。

应该看到，巴勒斯坦第二阶段自治协议是在巴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经过艰难反复的斗争与较量之后取得的。虽然双方相互作了妥协，但总起来看以色列仍占上风。巴勒斯坦人得到的，依然是有限自治，而且“有限自治”也将分阶段实施。在最初阶段，西岸巴勒斯坦人自治只占西岸土地面积的 30%，协议中还有含糊不清之处，以在“安全问题上”则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利益。

而为了让巴勒斯坦人实行自治，以军将在约旦河西岸重新部署。协议规定重新部署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把以军撤到巴勒斯坦人口稠密区外面，这包括杰宁、纳布鲁斯、图勒凯尔姆、卡勒基利耶、拉玛拉与伯利恒 6 个城市以及几百个乡镇。协议没有规定以军什么时候开始重新部署，也没有限定完成时间。佩雷斯在 10 月 7 日同阿拉法特再度会谈后说，这个重新部署将在半年之内完成。协议同时还规定，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人仍可“继续”在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的道路上“自由行走”；规定在城市里，以色列的车辆将由以巴联合巡逻队护送。关于希伯伦市的重新部署另作安排。以色列早先拒绝以军撤出希伯伦，因为有 400 多名犹太人定居在这个市中心。在巴方坚持下，以方最终作了让步，但也不是无所得。如协议规定，以军从希伯伦部分地区撤走后，仍留下一部分军队保护犹太定居者和定居者行走的道路。希伯伦将由双方共同控制，巴警察负责管理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保留保护以色列人的“必要权力与责任”。

对于巴勒斯坦第二阶段自治协议，巴议会——国大会代表中也有不少人批评说，“以色列统治者不想谋求中东真正的公正与全面和平”。在加沙的巴自治当局批准这项协议时，有 2 名部长对协议持保留态度。巴解执委会原则上批准这项协议，但主张以军必须在协议生效后 10 天内开始撤军。执委会 18 名成员除了 8 人已经辞职或不参加工作外，其余 10 人中只有 7 人与会，其中一人还对部分条款有保留。一些巴勒斯坦激进反对派更是强烈反对这项协议。

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一般都对协议保持沉默。希伯伦和纳布鲁斯的巴青年则举行示威，反对协议，10 月 1 日，一个巴勒斯坦民意测验中心发表对居住在西岸和东耶路撒冷 500 名巴勒斯坦人调查结果，46.3% 的人赞成这项协议，28.9% 的人表示反对，24.8% 的人不表态。另外，59.2% 的人反对有关希伯伦的安排。

以色列内阁和议会批准了这项协议，但是反对撤出一切所占领土的右翼党派攻击拉宾“出让了安全”，为建立巴勒斯坦国“铺平了道路”。犹太定居者接连闹事，宗教领袖号召以色列士兵拒绝执行重新部署的命令。9 月 28 日，一项在以色列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51% 的人支持协议，47% 的人反对。11 月 4 日，反对巴以和谈的以色列恐怖主义分子终于暗杀了拉宾总理。拉宾总理的遇刺身亡对中东和平事业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但暗杀阻挡不了和平进程。与恐怖分子的愿望恰恰相反，拉宾被害使更多人认识到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必要性。

拉宾的继任人佩雷斯也是中东和平的倡导者。拉宾去世后，佩雷斯受命组成新政府，他强调对内奉行民主对话方针，致力实现内部和解；对外继续

和平政策，恪守各项和平协议，并尽力推动以叙、以黎和谈。至 12 月 27 日，以方已向巴方移交了杰宁、图勒凯尔姆、纳布卢斯、卡勒基利亚、伯利恒及拉姆拉等 6 座城市。

1996 年 1 月 20 日，根据巴以自治第二阶段协议，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举行了第一次大选，选举产生了由 88 名委员组成的巴勒斯坦委员会。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可是，就在中东和平进程冲破阻力大踏步前行之时，1996 年元月 5 日，以色列特工机关用“移动电话炸弹”除掉了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运动的爆破专家阿亚什。2 月 25 日，哈马斯运动借替阿亚什报仇为名，分别在耶路撒冷和阿什凯隆制造了两起重大爆炸事件，致使百余人无辜死伤。3 月 3 日和 3 月 4 日，又连续在耶路撒冷与特拉维夫制造爆炸事件，各炸死 20 人。四起爆炸事件共造成近 70 人死亡，约 200 人受伤。

这次大爆炸事件将佩雷斯与阿拉法特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迫使佩雷斯内阁作出下一系列严重影响巴以关系的决定，其中包括中断巴以接触，停止执行 3 月份从希伯伦撤军的协议，搁置原定 5 月份开始的最终阶段谈判等。佩雷斯内阁还声明，以军可能重返已撤出的巴勒斯坦地区，必要时可以进入巴自治区追剿哈马斯分子。与此同时，佩雷斯又连续召开内阁紧急会议，研究反恐怖措施。他说：以决不向恐怖活动低头。他呼吁人民保持镇静，发誓要彻底消灭哈马斯等极端组织。内阁会议决定成立以安全总局局长为首的反恐怖高级指挥部，宣布对哈马斯运动和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展开一场“全面战争”。巴自治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也立即发表声明对事件进行谴责，表示巴人民将同以人民一道同恐怖活动进行斗争，彻底铲除其基础。巴自治机构紧急开会研究了中东和平形势和打击恐怖活动问题，并宣布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等力非法组织，逮捕了数百名包括策划一系列爆炸事件在内的哈马斯分子。

舆论认为，巴以和谈经过两年多的艰难历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工党以土地换和平政策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在国内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佩雷斯的公众支持率扶摇直上，曾超过反对党利库德集团主席内塔尼亚胡近 20 个百分点。工党已经宣布提前到 5 月 29 日举行大选。爆炸事件对佩雷斯竞选构成了实实在在的严重威胁。以人民对佩雷斯政府保障国民和国家安全的信心已严重动摇，佩及工党的威信再度骤然下跌。极右势力也乘机抬头，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

分析家们认为，巴以关系已严重受损，如事态继续恶化，不但下阶段的谈判难以取得结果，就是以前所达成的协议也将发生大的倒退。爆炸事件对整个中东和平进程的不利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以宣布暂停叙以在美国的谈判便是证明。人们认为，这些事件可能产生更深层的影响，以在今后的阿以谈判中可能会把安全问题看得更重，让其在安全安排方面做出让步更加不易，谈判可能会更加困难、时间可能会拖得更长。当然，只要巴以双方根据和平协议精神行事，加强协调和配合，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平进程道路上的障碍应是能够排除的。

巴以谈判旷日持久，一波三折，但双方都从本民族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出发，坚持不懈，努力寻找共同点。每一阶段协议的达成，其实就是向着对方更靠近了一步。当然，就双方而言，都势必要在原来的立场上作出妥协让步。所以，巴以双方的反对派都大叫大嚷自己的首脑为叛徒。以色列总理

拉宾就是这样倒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下的。但是，拉宾、佩雷斯与阿拉法特无疑是犹太与阿拉伯两大民族的具有战略眼光的杰出人物。他们都意识到两大民族都必须在地中海东岸的这块弹丸之地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继续共存，谁也不能吃掉谁；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彼此间的争斗仍然剑拔弩张地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其结果必是鱼死网破，共同灭亡。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前景变成现实，就必须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他们所取的根本谋略是“舍小谋大”，看起来是抛弃了（至少是部分抛弃了）过去的原则立场，实际上是以小的代价牺牲，换取较大的利益要求——双方的和平、安定、发展与繁荣。“舍小谋大”是一种以迂为直、以退为进的奇妙之术，它将对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追求当作妥协让步的最高原则。正因为拉宾、佩雷斯与阿拉法特抱着这个宗旨，所以尽管谈判的道路荆棘丛生，困难重重，双方却终于一步步靠近了。1994年三人共同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则是世界对他们的这种诚意与努力的认同和奖赏。而巴、以双方的极端分子们则眼光短视，不愿意以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牺牲去谋取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实现，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尽管他们可能一时得逞，却注定要被时代的潮流所唾弃，这是不言自明的。中东和平进程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巴、以双方坚持对话，反对对抗；坚持和解，反对暴力，他们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就一定是光明的、灿烂的。

以历史作借鉴 以土地换和平

1995年11月4日深夜，一条从地中海之滨传来的噩耗让整个世界惊呆了：中东和平缔造者之一、以色列总理拉宾被暗杀了！以色列全国立即陷入一片空前的悲痛气氛中。人们以各种形式悼念着这位和平斗士。电视、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哀乐，播放着拉宾生前的活动、讲话录像、录音，播放着人们回忆与悼念他的访谈及文章。拉宾遇害的特拉维夫金斯广场，被改名为拉宾广场。在长达一两周的时间里，这里一直聚集着成千上万的自发前来悼念的人群。每到夜晚，人们席地而坐，点燃手里的蜡烛，形成一片闪烁而璀璨的星海。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低唱着一首叫《拉宾，好人！》的歌……

拉宾1922年3月1日出生于圣城耶路撒冷，父母系俄国犹太移民。青年时代的拉宾立志农业救国，在农业中学毕业后留学美国攻读灌溉工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使他的梦想破灭了，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反对轴心国的战斗。战争使他的军事才能得以发挥，1964年就任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在1967年的“六·五”战争中，他指挥以色列军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他的战绩赢得了以色列人的尊敬和爱戴，同时也力阿以矛盾埋下新的火种。1968年1月拉宾退役从政。1974年1月他当选为议员，1974年当选为工党领导人，并出任内阁总理，1977年4月因其夫人非法在美国存款事而辞职。

1977年4月以前的拉宾不用说是一位主张同阿拉伯世界对抗的强硬派。以色列《国上报》曾援引拉宾的话说，他梦想“加沙地带最好沉入水中”。他的话使入联想到以色列1948年成立后阿拉伯人曾宣称要把以色列推进大海的提法。巴勒斯坦女发言人阿什拉维曾谴责拉宾的讲话是“种族主义的”。

人们还回忆起拉宾任国防部长时曾让以色列士兵“狠狠地打击”巴勒斯坦的活动分子、以便平息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

专栏作家吉迪恩·列维甚至还在《国上报》发表评论说：拉宾“口里说出来的东西比他心中隐藏的东西要多、但心中隐藏的东西却相当黑暗，这就是拉宾。”

1977年拉宾的政府垮台后，拉宾开始对自己以及以色列国家的过去进行深刻的反省。他看到，长朝的阿以战争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力和财产、资源损失，还留下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离乡背井、流离失所，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也成为造成包括以色列国在内的整个中东地区的长期动荡的一个重大根源。但以色列国内右翼势力从宗教和历史的观念出发，却一直坚持被占领土的合法性，并主张兼并约旦河西岸，强调“以和平换和平”的方针；左翼力量则从现实和可能出发，认为在保证以色列安全的前提下，在被占领土问题上应作出让步，主张“以土地换和平”解决阿以之间的争端。

战争是最好的学校。拉宾也终于认识到解决矛盾的最终办法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和平是历史的潮流，以色列只有顺应这个潮流，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对抗和战争是没有出路的。从此，拉宾就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向为实现中东和平而斗争的努力之中。

1984年9月至1990年在工党与利库德集团组织的联合政府中，拉宾担

任国防部长。1992年2月拉宾再次当选为工党主席，1992年6月拉宾击败了右翼集团领导人沙米尔，出任以色列总理，为中东和谈带来了新的希望。

1992年7月13日，拉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宣布：“和平与安全”问题将是新政府的当务之急。他强调，他的政府将把中东和平及结束阿以冲突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采取现实、灵活和大胆的步骤来推动中东和谈。他在全面寻求与阿拉伯国家和解的同时，重点放在解决巴以之间的问题，实现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自治。他上台伊始，即向阿拉伯国家发出“令人目眩”的和平攻势。他表示愿意邀请约旦国王、叙利亚总统和黎巴嫩总统到耶路撒冷讨论和平，他也准备去这些国家访问。

拉宾总理执政以来所发表的讲话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妥协态度，这是以色列人在利库德集团支配政府的15年中很少听到的。当时舆论评论说，拉宾把中东和谈的气氛从失望和沮丧变为希望的速度令人吃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所采取的一些限制在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移民点的措施使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代表团认为他是认真的。

拉宾在讲话时很讲究分寸。为强调以色列有意同它的邻居和解，他在谈到以色列1967年阿以战争中从约旦夺走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时，使用的是让人听起来很舒服的“西岸”的字眼，而利库德集团的沙米尔在谈到这一地区时坚持使用（圣经）上的称呼：“朱迪亚和萨马利亚。”

拉宾在讲话中不使用“和平进程”这个词，因为在沙米尔执政时，中东和谈已拖了10年之久，他喜欢用“实现和平”，意在强调他决心很快把自治权转交给巴勒斯坦人并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签定条约。他同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很快便进入实质性阶段。

在同叙利亚会谈时，拉宾不忌讳谈及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这两项决议都要求以色列从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与沙米尔不同，拉宾认为没有理由保持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人的全部领土。

当拉宾对他自己国家的人民发表讲话时，严厉告诫移民者，要求他们必须“成弃以色列是宗教圣地的主张”——这种主张使以色列人认为保住西岸的每寸土地是他们的宗教责任。

1993年9月13日，拉宾同阿拉法特在华盛顿白宫南草坪上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协议》，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同阿拉法特握手。整个世界都为为之欢呼。

1994年5月，拉宾又派遣外交部长佩雷斯赴开罗同阿拉法特签署了实施巴以原则宣言的第一阶段协议。

同年7月25日，拉宾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华盛顿签署了《华盛顿宣言》；10月26日以约两国正式签署和平条约，结束了两国长达46年的战争状态；紧接着，以约双方于11月27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至此，以约关系实现了完全正常化。

由于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的共同努力，中东和平结出了累累硕果。因此，他们三人共同分享了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中东和平的重大进展，却激起巴、以双方反对势力的更大怨恨，双方的报复乃至恐怖活动，都把罪责归咎于“叛逆”。以色列极右分子的矛头指向拉宾，散发拉宾头戴阿拉伯头巾、身穿希特勒党卫军眼的纳粹漫画像，公开叫嚣要杀死“出卖国家安全”的“叛徒、杀人犯、纳粹”拉宾。

然而，拉宾并未被吓倒，他同佩雷斯、阿拉法特一道，在国际社会的撮

合，支持下，一次次地力挽狂澜，使和平航般不断驶向彼岸。1995年9月28日，拉宾和阿拉法特签署了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巴勒斯坦自治的“塔巴协议”。“塔巴协议”规定，以色列将在10年内开始从约旦河西岸撤军。6个月后完成第一阶段撤军，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的范围将扩大到西岸27%的地域。巴勒斯坦国的雏形已经出现。以色列极右势力的“大以色列”之梦开始破灭。

塔巴协议签署后，以色列极右势力反对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反对把约旦河西岸归还巴勒斯坦人的活动骤然增加，抗议示威此起彼伏，有人大骂拉宾是“叛徒”、“卖国贼”，甚至将拉宾和希特勒相提并论，矛头直指拉宾和他的政府。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要人受到威胁、住房部长埃利泽遭到围攻；教育部长阿洛尼遭到殴打；环境部长的轿车被推下高速公路，一时间向和平事业反攻倒算的事件频频出现。

在以巴和平努力取得重大进展时，以色列国内的右翼势力上演的这一幕幕反对实现和平的闹剧，主要与约旦河西岸的前途有关。

约旦河西岸位于以色列中部地区与约旦王国之间，面积6600多平方公里，它深入以色列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仅是以色列水资源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对以色列安全至关重要。另外，以色列右翼势力和犹太教正统派坚持认为它是犹太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认为巴勒斯坦是上帝那和华赐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历史上又是古代以色列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约旦河西岸古称朱迪亚和萨马利亚，曾是犹太分国时期南部犹太王国和北部以色列王国所在地。他们声称以色列对西岸有历史和宗教的权利。“六、五”战争后，一直要求兼并它。况且，在西岸犹太人定居者中间，很多人是民族主义分子和犹太教正统派教徒，他们亦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一地区。因此，随着西岸自治范围的扩大，必然引起这些人的反对和抵制。塔巴协议签定后，以色列出现的破坏和平进程的活动和事件，就是右翼势力不愿放弃西岸思想意识的集中表现。当然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者袭击以色列人的事件，也对事态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95年11月4日晚，拉宾的好友，前特拉维夫市长沙哈特在特拉维夫金斯广场组织空前规模的集会声援拉宾。以

色列内阁部长、埃及和约旦驻以大使及10万以色列群众参加集会。不料，这便为以色列极右分子刺杀应宾提供了一次可乘之机。

极右分子中要干掉拉宾的杀手们，经常在夜深入静的时候，聚集在特拉维夫金斯的一座公墓里宣誓。他们发誓要杀死拉宾和其他的“以色列叛徒”。在墓前发誓刺杀拉宾的组织中，有一个名叫“埃雅尔”，“埃雅尔”两年来早就一直在盯着拉宾和佩雷斯的行踪，阴谋行刺。拉宾曾有8次处在凶手们的射程之内。

拉宾住处经常是设警卫的。“埃雅尔”侦察过这里的每个拐角，寻找通向房顶的途径，侦察过能击中拉宾的各个方位。为了搜集资料，他们买了有关政治暗杀的所有书籍。

“埃雅尔”曾设想，有了M16手枪，他们就可以仿效奥斯瓦德暗杀肯尼迪的办法行刺拉宾。不过，由于弄下到这种武器，他们只好放弃了“肯尼迪模式”，转而考虑搞“炸弹汽车”，在道路上作案。他们为此在拉宾经过的各种路线上，都标出了行刺地点。这种办法后来也放弃了。原因是拉宾的座车是美制销装车，要炸死拉宾本人的希望很小。

最后“埃雅尔”决定使用最可靠的办法，即派一个杀手进行贴身攻击。

1995年9月，这个密谋小组决定由伊加勒·阿米尔充当杀手。

伊加勒·阿米尔是“埃雅尔”行动小组的小头目，27岁，家住以色列中部城市赫兹利亚，是特拉维夫郊外巴尔·伊兰大学法律系三年级学生。幕后指挥他的是一个24岁的疯狂分子，名叫阿维沙·拉维夫。他的政治主张可归纳为这样几句话：必须尽可能屠杀、驱逐巴勒斯坦人，以便建立一个以色列；除了攻击阿拉伯人之外，还要处死拉宾和佩雷斯这些“巴解组织当中的犹太人”。

犹太教的几个教士也已经发出教令：“杀死拉宾、佩雷斯是一个神圣行动，因为要建立以色列，就应当走这条路。”所以，阿米尔认为，他的使命是神授的。

拉宾总理当晚在特拉维夫金斯广场参加的，是一次“要和平，不要暴力”的和平集会。拉宾率内阁成员出席大会，表示以色列政府的和平诚意。在会上，拉宾发表了气宇轩昂、信心十足、发誓要将中东和平事业进行到底的演讲。他语气坚定地告诉人们，过去打了长时间的仗是别无选择，“但是，今天，机会，和平的机会来临了，为了今天在这里和不在这里的人们，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巨大的机会”。拉宾以“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支持和平”的和平呐喊结束了他的演讲。随后，他又同全体与会者唱起了象征以色列和平运动的《和平之歌》，使大会进入了高潮。然而，当拉宾发表完讲话走下主席台，前往等候的专车时，潜伏已久的阿米尔靠近拉宾向他开了3枪，至少两枪击中身体上部。拉宾倒在了血泊中。警察立即包围了现场，救护车急速赶到，把拉宾送往医院。阿米尔当场被警方拿获。他承认是按“上帝命令”枪杀了拉宾，并表示“绝不后悔”。

拉宾被送进医院后，与会的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消息，有的人在广场点燃蜡烛，唱起悲歌，更多的人则涌向医院。但是，一个小时后，传来了拉宾总理不治身亡的消息。人们流泪了，他们自发地点燃了蜡烛和打火机，向自己的总理表示沉痛的悼念。

噩耗传出后，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纷纷连夜发表谈话和声明，强烈谴责这种令人发指的恐怖行径，普遍赞扬拉宾为以色列和中东和平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对他的遇害表示沉痛悼念。这其中不但有素与以色列交往密切的西欧、北美国家的领导人，而且有亚大地区和东欧各国政界和社团领导人，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我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台也以惊人的速度，连续报道了拉宾总理遇害的消息。

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李鹏总理对拉宾总理的不幸遇刺，向以色列政府和人民表示沉痛悼念之情。

以色列国家和人民对拉宾遇害深感悲痛，向自己的领导人表示崇高敬意。他们纷纷从各地赶来向自己的总理最后告别。只有500多万人口的以色列，竟有100万人瞻仰了拉宾的遗体，这说明要求实现中东和平的愿望已深深扎根于以色列广大人民的心中。当时以色列人民最为普遍的一句话是：

“犹太人的事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业。拉宾遇害了，以色列人民还要继续走自己的路。”

从11月5日开始，人们都在以不同方式，自觉地开展悼念拉宾的活动。许多地方还为拉宾设有“灵堂”。6日下午，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城为拉宾总理举行了隆重国葬。拉宾的遗体按以色列最高礼仪安葬在赫茨尔山国家公墓。来自世界各国的40多位领导人出席了这个葬礼。其中有美国总统克林

顿和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还有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约旦国王侯赛因、阿曼和卡塔尔大臣以及巴勒斯坦方面的一些官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因安全原因未能出席拉宾葬礼，但他却于 11 月 9 日深夜密访以色列，亲自前往拉宾在特拉维夫的寓所进行吊唁，向拉宾夫人表示沉痛哀悼，对拉宾为中东和平作出的伟大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

拉宾遇刺事件深深刺痛了以色列人民，激起以色列人民对和平更大的支持和同情。拉宾此次死干犹太人之手，而不是阿拉伯人之手，这对以色列人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和震动，使他们认识到右翼势力的危险性，也感到实现中东和平责任不仅在阿拉伯一方，也在以色列一方；而对拉宾遇刺的悲痛则迅速地转化为对和平的支持和追求。

11 月 5 日凌晨，以色列代总理佩雷斯在主持内阁紧急会议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即说，除了继续走伟大领导人拉宾指引的和平道路外，以色列别无选择……

拉宾是中东和平的重要缔造者和推动者，他的遇害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重大损失。但是，拉宾遇刺使右翼反和平势力极不得人心。拉宾遇刺后的民意测验表明，以色列 74% 的公民支持和谈——这是从未有过的民意支持率。对和谈更为积极的佩雷斯顺利组阁，他一再强调要继续拉宾开创的和平之途，加快自治协议的执行步伐。在拉宾总理葬礼举行后的第二天，以色列军队按原订计划立即开始从杰宁市撤军和重新部署……拉宾由一位参加过四次中东战争的以方强硬派，一转为同阿拉伯和解的对话派，乃是其善于以史为镜，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原因并改弦易张的结果。唐人吴兢《贞观政要·任贤》里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意思是借鉴历史，可以找到盛衰兴替的原因和规律。拉宾曾是一位老资格的军人，然而，正如他 4 日在遇刺前发表的演讲中所言，他打了 27 年仗，却发现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只能用和平手段来实现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存。可以说，这是历史给人的启迪，是

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因此，拉宾能及时反省，及时调整对阿战略，果断地采取了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以求以色列国的长期生存。更可贵的是，拉宾既已认识到只有以“土地换和平”才是彻底解决阿、以两大民族的根本途径，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任何力量也未能改变他，甚至为此而献身。

1981 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因与以色列握手言和，勇敢地迈出了中东和平的第一步而遭到国内极端分子的暗杀。而拉宾则成为为中东和平事业而牺牲的第二位国家领导人。为了中东和平，萨达特倒下了，拉宾倒下了，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也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为了避免中东再次出现萨达特和拉宾的悲剧，为了使千万人的鲜血不付之东流，阿以双方对解决中东冲突的唯一选择就是继续以历史作借鉴，按“土地换和平”的既定原则办，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和平，反对暴力，这样方能大力推动中东和平的进程，早日实现中东和平。

中东和平最后一关 叙以关系出现转机

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继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佩雷斯发誓要继续推进中东和平。53天后，即12月27日，中东地区最为艰难也是最为关键的叙、以和谈在中断半年之久后果然恢复了。世界舆论因此表现出更为浓郁的兴趣。作为叙、以和谈穿线人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不无得意他说：和谈“已跨过一个重要的阶段”。

可是，舆论却把更多的奖赏给予佩雷斯，认为主要是佩雷斯的积极、主动与务实的举措带来了叙、以和谈的转机。

叙、以和谈一向被视为中东和平乐章三部曲（埃以和平、巴以和平及叙以和平）中的最后一章。更有研究者在《世界知识》1994年第18期上予以评议说：“继1993年9月巴以签署和平协议后，1994年7月约以签署《华盛顿宣言》。然而，在中东和谈这历史性的两幕闪过以后，人们似乎还是没有看到‘正戏’，这是因为，实力强大的叙利亚和以包列的谈判仍未走出沼泽地带，叙利亚尚未最终进入和平舞台的正中心亮相。”

原来，叙利亚自1991年起便与以色列开始和谈，其间却时断时续，既不开花更不结果。这是因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谈判的具体策略上采取步步为营、合纵突破的方针，以期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随着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与以色列实现了单独媾和，叙利亚当初所谋求的阿拉伯四方和衷共济，不同以色列单独媾和，以期加重谈判筹码，一举实现全面解决的战略，事实上已告破产。当时真正与叙利亚“和衷共济”的国家只剩下力量不大的黎巴嫩了。这种客观情形使叙利亚感到一方面谈判的底牌已不像过去那样有力，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已走在了前头，叙利亚落在后面无疑已显得很被动。叙利亚自然更不愿被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但同时它又不愿在世人面前造成彼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拉着走的印象。

在巴以、约以和谈取得突破后，阿萨德总统深知，可以回旋的时间和余地都已不多了，叙利亚必须不失时机地作出历史性的抉择。以色列很清楚地感觉到叙利亚的两难心理，于是便抓住时机向叙利亚展开和平攻势，以压叙利亚从原来的强硬立场后退，最终达成相对有利于以色列的妥协。以色列总理拉宾于1994年7月28日敦促阿萨德尽快同以色列举行“直接的、悄悄的会谈”。拉宾表示，叙利亚虽已同意推动“某种和平”，但他对叙以和谈进程的迟缓“感到失望”，在目前的情形下，阿萨德必须采取“公开的和平姿态”，使以色列公众确信：大马士革愿意仿效巴解组织和约旦，结束与以色列的战争状态。这样，以色列就伺机巧妙地将球踢回到叙利亚的场地上。当拉宾又一次强调和平是自愿的，不是强加的时候，以色列似乎已拿到了和平的主动权。

叙以和平的最大障碍是戈兰高地问题。戈兰高地是叙利亚南部边境上一个非常富饶且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原，它向西俯视着以色列最主要的农业基地胡拉谷地，向北俯视通向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平原。1967年“六·五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这块高地，1981年又正式宣布吞并戈兰高地。以色列对戈兰高地长达27年的军事占领使叙以之间的宿怨根深蒂固。在“全球后冷战”的时代大背景下，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平进程开始启动。阿萨德意识到这可

能是收复戈兰高地的历史性机遇。然而，叙以谈判一开始就在“撤军”与“和平”孰先孰后的问题上陷入僵局。以色列坚持在它撤军之前，叙利亚必须给以色列以明确的外交承认，实现两国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和戈兰高地的非军事化，开展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并要求叙利亚放弃阿拉伯联合抵制以色列的立场。而叙利亚认为，以色列应该首先从戈兰高地撤军，然后才能够谈论和平问题。双方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争执了近三年时间。阿萨德一开始就制定了“以和平换取领土”的路线，只要以色列归还戈兰高地，叙利亚就可以采取“勇敢者的和平”。然而，叙以双方由于积怨太深，互不信任，谁都不愿迈第一步。可是，1994年7月14日，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却在27年后第一次在讲话中承认叙利亚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这使得陷于停顿的叙以和谈重现生机。

现年72岁的佩雷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25岁即成为以色列国防部海军事务负责人，29岁就出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国防部副部长。此间，他还参与策划了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的战争。

1984年9月以前，佩雷斯主要在国防部门工作，这似乎和他的名字有点关系。佩雷斯1923年8月21日出生在波兰。父亲是个木材商，1934年回到当时由英国托管的以色列。他改原名佩尔斯基为佩雷斯。“佩雷斯”在希伯来语中意为鹰。佩雷斯十五六岁时结识了以色列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本·古里安，随后从政，他相继加入了以色列工人党和犹太自卫军。1965年，他与本·古里安一起另创以色列工人党，并任总书记。后来，工人党和另外两个党合并组成现在的以色列工党。

1984年9月—1986年10月，佩雷斯担任总理。在此期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出了军队，开始同摩洛哥谈判并与埃及恢复了关系。此后，他先后在沙米尔政府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1992年7月，拉宾当选总理后，佩雷斯担任外交部长。

在政府任职的重心从国防转向外交的佩雷斯支持拉宾与阿拉伯媾和的政策，是以政府同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各方谈判的重要代表。他为以色列分别同巴勒斯坦和约旦达成和平协议作出了贡献。为此，他被授予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和199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拉宾与佩雷斯，这对伙伴兼对手曾是以色列的“黄金搭档”。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两人一刚一柔，分工明确：巴勒斯坦问题由佩雷斯全权处理，无论是挪威丛林密谈、奥斯陆协议，还是华盛顿原则宣言，具体工作全部由佩雷斯操作。拉宾作为总理只是过问谈判与协议。但在叙利亚问题上，拉宾以戈兰高地关系到以色列的安全为由，坚持大权独揽，不容佩雷斯置喙。拉宾死后，他的一位政治密友透露，在叙利亚问题上，拉宾坚持两条：一是不让佩雷斯过问谈判问题；二是控制速度，不加快和解步伐。据说，作为外长的佩雷斯对叙以谈判的了解并不比记者多多少。以色列谈判团团长、驻美大使拉宾诺维茨只向拉宾报告谈判细节，不向外交部汇报；以军总参谋长在与叙军总参谋长谈判前也只接受拉宾的指示，事后只向拉宾报告。

拉宾独特的经历与身分使他在对叙谈判中慎之又慎。作为军人，他对戈兰高地的军事价值看得很重；作为夺取高地的指挥官，他曾亲眼目睹将士拼杀夺地，多了一份感情因素；作为政治家，他又必须考虑公众对放弃高地的承受能力，以及给本党带来的利弊……因此，他对佩雷斯在叙以谈判中表现出的更加开明与主动的态度甚为反感。1994年2月，佩雷斯同阿拉法特草签

汗罗协议后，注意力转向叙以谈判，对谈判进展缓慢表示不满，提出推动谈判的一系列主张，但被拉宾拒绝。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佩雷斯显然与拉宾意见相左。

首先是戈兰高地的主权。拉宾从未公开承认叙利亚对高地的主权，但佩雷斯多次公开承认叙利亚对高地的主权，并向阿萨德保证工党政府有足够多数改变议会的《戈兰高地法》（1981年以色列通过在戈兰高地实施以色列法律的议案，实际上是吞并高地）。他援引前艾希科尔政府在1967年那次战争后的决定：在确保以色列水资源的前提下，以色列准备撤退到国际边界线，以换取和平与叙利亚对以色列安全的保证。佩雷斯多次明确表示，没有从戈兰高地的全面撤军就不能与叙利亚实现和平。

第二是有关“全民公决”问题。拉宾提出在与叙利亚达成协议后，戈兰高地问题需通过“全民公决”。佩雷斯反对“全民公决”，他认为：如临近大选时达成协议，那就无需“公决”，因为人民在大选中自会作出选择；如在大选后达成协议，则更没有必要“公决”，因为在工党的竞选纲领中将写明准备撤出戈兰高地，巩固和平。

第三是戈兰高地的安全安排问题。佩雷斯认为把安全安排作为叙以谈判的中心议题；只会导致双方在纯技术问题上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如果只在“你撤4公里，我撤2公里”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易使谈判陷入僵局。叙以间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如撤军问题、边界划定、和平性质、关系正常化，等等。全面谈判将给予谈判双方更大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容易把“有争议的问题与需要解决的问题”区分开来，下会因某一个具体问题影响整个谈判。

第四，对于以叙和解的得与失，佩雷斯不同意拉宾和舆论界过分强调在叙以谈判中以色列所付出的代价，而主张要让人民看到付出代价后的收获。戈兰高地对以色列固然重要，但它换来的是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全面和平，从根本上消除了战争威胁，是以色列安全的可靠保证。强调以色列的失，只会造成人民间的分裂、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佩雷斯仅仅把戈兰高地看作是谈判桌上一张可以讨价还价的牌。他认为在军事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高地已失去其战略上的重要性，以色列不应为保留高地上的预警站而失去与叙利亚和解的机会，佩雷斯主张从戈兰高地全面撤军，回到委任时期的国际边界线上。以色列与叙利亚争议的领土面积总共为44平方公里，这些地方主要还涉及水资源，佩雷斯认为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甚至可以像埃以间塔巴问题一样提交国际仲裁，不应成为叙以和解的障碍。

然而佩雷斯的主张没有得到拉宾的赞同，于是佩雷斯动员了他拥有的各种关系，从埃及总统穆已拉克，到阿根廷总统梅内姆，从政治家到商人，试图说服阿萨德提高谈判等级，由他和叙利亚外长沙雷直接谈判。但阿萨德很清楚，在戈兰高地问题上没有拉宾点头，谈判将一事无成。他向传话人表示，佩雷斯的这些话如果出自拉宾之口就好了，拒绝了佩雷斯提高谈判级别的要求。

到了1995年6月，叙以两国总长会谈后，阿萨德不同意在戈兰高地保留以色列预警站，后续的高级技术军官会谈无法进行，双方互相指责。阿萨德曾提出恢复谈判的条件，拉宾一口拒绝，谈判由此搁浅。克里斯托弗曾规劝拉宾并提出了一些恢复谈判的“折衷”办法。但拉宾坚持丁继续高级技术军官有关安全安排的讨论，叙以谈判就不能恢复。谈判进入死胡同。美国当时

沮丧地认为，拉宾与阿萨德互相失去基本信任，谈判无望。作为调解国，美国将继续努力，但只是“低力度的”调解。拉宾逝世前，舆论也普遍认为，在美国、以色列大选前叙以达成协议的希望是零。

美国何以热衷于充当叙、以和谈的牵线人呢？原来，克林顿上台后，对中东地区制订了两套性质不同的战略：在中东“西部”，对阿以冲突问题，美国以“完全伙伴”的姿态力促阿以双方冰释宿怨，进而营造出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和平机制，而叙利亚能否进入和平的“戴维营轨道”决定着这种和平机制能否最终形成；在中东“东部”，美国则对伊朗和伊拉克实行“双重遏制”使两伊在谁也不能强大的情形下形成“弱势均衡”，然后利用沙特等地区伙伴维持地区稳定，控制海湾石油资源。这样一种安排无疑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1994年1月16日，克林顿总统曾不辞辛劳地赶到日内瓦会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他明确表示如果叙利亚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做出历史性举措，美国愿意改善与叙利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言外之意就是美国可以帮助叙利亚改善经济。在叙以谈判僵持在“八年分阶段撤军”还是“一年之内全部撤军”两个方案之间时，美国又以“历史中间人”的姿态提出“两年期撤军”的折衷方案。克里斯托弗在多次穿梭外交之后认为叙以和平的“新希望”已经升起。实现全面的和平是“可能的”。但拉宾与阿萨德互不相让的执拗态度却使克林顿与克里斯托弗很是恼火。他们也急于想早日打通叙、以之间的障壁，从而实现中东地区的全面和平，以确保美国的战略利益。

拉宾于1995年11月4日的遇刺终于为打通这道障壁提供了历史机遇，也使佩雷斯有了实现其对叙和谈主张的充分机会。因为再没有人能在他之上来评头论足，再捆绑住他的手足了。

佩雷斯组成新政府后，加快了他实现对叙利亚的谋和的步伐。他采取了两条有力措施。首先，他分别把拉宾诺维茨大使和沙哈克总长召到办公室来，要他们提供叙以谈判的详细情况，接着又与美国调解人罗斯进行了3个小时的密谈，了解叙以谈判的全过程和美国政府的意见。佩雷斯听完汇报后，大有“原来如此”之感。他的助手向新闻界透露：叙以谈判“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有意义的进步”。并似乎作了这样一种暗示：叙以谈判所取得的实际进展远比公开发布的大得多，只是拉宾出于某种担心秘而不宣。第二，佩雷斯从拉宾诺维茨手中收回与叙谈判的“专利”，任命他的亲信、外交部办公室主任奥里·萨维尔为谈判团团总揽谈判大权，并起用了奥斯陆谈判的整个班底。这样，佩雷斯把叙以谈判的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他紧接着宣布，有关叙以谈判过去所有的声明都已“死亡”，重申他当外长时的各种主张，并在和美国协商后提出了叙以谈判“十项原则”。与此同时，阿萨德也有所呼应。除了最高级会谈外，叙利亚积极响应了佩雷斯的呼吁。加之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斡旋，双方于1995年12月中旬同意在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恢复谈判。

克林顿与克里斯托弗闻讯大喜。他们套用当年埃以戴维营谈判的模式，把叙以代表请到马里兰州的怀伊种植园，与新闻界和外界完全隔绝，大有不推动叙以达成协议誓不罢休的架势。按照预定计划，叙以两国代表团12月27—29日举行第一轮和谈，休息一周。双方利用这机会回国内汇报请示，然后再在次年1月3日进行为期3天的第二轮谈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29日谈判结束后，双方一致同意留下来在此后几天进行非正式会谈。在外界看

来，这个举动具有积极意义，它预示着叙以和谈有望在关键时刻获得突破。

据报道，以罗斯为首的美国调解人员一直守在谈判会场，从中斡旋调停。以色列在 70 年代和埃及和解，两年前又与巴勒斯坦人达成了和平协议。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成果都是在非正式会谈中取得的。美国方面显然也希望通过怀伊庄园的非正式会谈创造出好气氛。

从以色列总理办公厅主任贝林的话中不难推断出这两轮叙以会谈中的良好气氛。以色列电台援引贝林的话说，此次叙以会谈在三个方面与以往有所不同：一是以色列政府授予以代表团更广泛的权力；二是叙利亚方面对此次和谈抱有较大希望；三是美国调解斡旋加大了力度。在波黑和平协议正式签署后，美国即将中东和平进程列为首要任务。为此，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于 1996 年上半年多次穿梭往来于叙以之间。克里斯托弗发表谈话说，美国政府和克林顿总统本人决心竭尽全力推动叙以在年底之前达成和平协议。

以色列与叙利亚的分歧焦点集中在戈兰高地。比如，以色列虽然最终会同意全部撤出戈兰高地，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它将要求在戈兰高地上划出非军事区；要求美国在戈兰高地上设立监测站并派驻维和部队；要求叙利亚对黎巴嫩境内的极端伊斯兰势力实施有效控制，使之不再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还将要求叙利亚保证不切断由戈兰高地上多条河流流入以色列境内加利利湖的水源。据透露，叙利亚方面除要求全面收回戈兰高地外，还要求美国 and 以色列承认或默许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影响和控制，要求美国和西方提供经济援助，要求美国将叙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删除掉。此外，以色列政府还面临如何说服目前居住在戈兰高地上的 1.4 万名以色列人放弃经营多年的家园，撤回以色列境内的头疼问题。这批以色列居民已表示将与以政府进行抗争。

佩雷斯接任以色列总理后，在叙以谈判问题上采取了与前任总理拉宾截然不同的谋略。拉宾是“择题重于择对象”，谈判条件达不成协议就不谈；佩雷斯则是“择对象优于择题”，谈判条件达不成协议也可以谈，用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生意不成情义在”。

佩雷斯新的谈判策略的核心是强调人的因素。他认为，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谈判对手之间须有诚意，互商互让，问题才能解决。而已方则必须首先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来，方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果谈判先被框在先决条件中，问题就很难解决。像 1995 年 6 月叙以最后一轮谈判，叙要求以先保证归还戈兰，再开始谈判；以则坚持先讨论安全问题，再谈戈兰高地的归还，双方相持不下，谈判破裂。

在埃以、约以、已以已实现和平或正在实现和平的情况下，唯有叙以、黎以和平问题处于停滞状态，成为实现阿以和平道路上的最终障碍。佩雷斯上台后便开始抛出他的新谈判策略，频频向叙伸出橄榄枝，呼吁无条件恢复叙以谈判，主张各自把自己的想法、建议拿到谈判桌上，不划定任何红线和禁区，然后坐下来解决问题。这样便自然会感动对方。佩雷斯决意通过全面归还戈兰高地实现以叙和解，并带动以黎和平，从而一鼓作气与所有周边阿拉伯国家实现永久和平。在叙利亚方面，阿萨德总统看到了以色列现政府追求和平的真诚愿望，也看到了叙收回戈兰高地的现实可能，决心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会。在叙以两家之外，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亲自参与调停，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也把促成叙以和解作为他 1996 年外交的首要目标。上述这些主客观因素和条件，最终促成双方于 1995 年 12 月 27 日无条件恢复了谈判。

当然，最初的几轮谈判，双方并未直接切入撤军，安全、关系正常化等核心问题，也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只是提出了一些对经济合作、水资源分配、黎巴嫩局势等次重问题的想法。谈判明显带有“避重就轻”，“只提问题不下定论”的特点。分析家们认为，这样做对刚刚恢复的“脆弱”谈判继续下去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因为只有首先制造出友好的和谐的气氛，才能让双方乘势进入“角色”。再说虽然“下阶段双方面临的难题并未减少”，但宣布继续举行谈判和双方高级军官参加谈判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进展。目前双方采取的“先易后难，逐步突破”的谈判方针有希望使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实现和平的希望也是存在的。

叶利钦撤换外交部长 俄罗斯调整外交政策

1996年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俄罗斯政府里便一阵忙乱。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经济部长亚辛、农业部长纳扎尔丘克、运输部长叶菲莫夫、外交部长科济列夫、总统办公室主任菲拉托夫、第一副总理丘拜斯相继挂冠离任。其中尤以科济列夫的去职引人注目。科济列夫曾鞍前马后地效忠叶利钦达5年多，怎么突然会落得如此令他寒心的结局呢？

其实，叶利钦早就有撤换外长的打算。在整个1995年里，叶利钦就已多次批评科济列夫领导的外交部工作不力，责令其改进。叶利钦于10月19日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大会前夕曾公开表示，他正在物色合适人选来取代科济列夫的外长职务。后因西方国家和俄国内舆论反应强烈，这才匆忙收回成命，并向记者解释，他暂时不准备撤换外长，而是要给外长找一个好的副部长；因为科济列夫经常在国外访问，没时间和精力来管理外交部事务，云云。叶的这番表白，当然不能糊弄住记者，记者们自然不会相信；他们认为，叶撤换科济列夫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995年12月17日，科济列夫在摩尔曼斯克选区被选为俄国家杜马议员。俄罗斯宪法规定，杜马议员不得在国家机构担任公职。他当选为议员后，曾向选民表示，是继续留任外长还是当国家杜马议员，他要同叶利钦总统会晤后才能决定。翌年1月3日，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里亚博夫宣布，凡选入国家杜马的议员必须于5日前向中央选举委员会递交辞去国家机构公职的书面声明。5日，科济列夫向叶利钦总统提交了辞呈。于是，叶利钦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来解除科济列夫的外长职务，同时也给科济列夫一个保全面子的机会。

1月5日，叶利钦总统签署命令，决定接受科济列夫的辞呈，解除其外长职务。俄总统新闻处同时也没有忘记解释说，解除科济列夫的外长职务是由于他已当选为俄国家杜马议员。

科济列夫生于1951年3月，1974年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后逐级晋升。1990年10月他离开苏联外交部，到叶利钦麾下的俄罗斯外交部出任外长，成为叶推行俄罗斯新外交路线的得力助手。但莫斯科的一些报纸，特别是反对派一直认为，前苏联解体后，年轻的科济列夫对美国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几乎推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跟着美国外交指挥棒转。尤其在1995年北约加紧东扩计划，直接威胁俄的国家安全时以及美国在波黑和中东问题上根本不把俄罗斯放在眼里的情况下，更显得柔弱乏力。俄国舆论还认为，在经济改革方面，科济列夫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模式，结果非但没有靠西方援助振兴俄经济和“融入西方文明社会”，反而使俄处于西方的从属地位，从而削弱了俄作为世界核大国的地位。1995年9月6日，俄罗斯杜马还通过一项声明，要求叶利钦解除科济列夫的外长职务，认为科济列夫“使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外交失败，使俄罗斯和总统的威信受到损害。”俄罗斯军队方面也对科济列夫的亲美政策表示出极大的不满。

虽然俄罗斯的反党派势力和新闻媒体的批评矛头直指科济列夫的外交

部，却无疑给统率全局的叶利钦以巨大的压力。为了堵住这些批评，叶利钦开始对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作出积极的调整。他在国内外的许多公开场合，不断强调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平等性”和“务实性”，在事关俄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敢于向西方说“不”。如反对北约东扩，坚持对外出售核技术，抵制西方对车臣事件的干预和反对西方在解决波黑问题上避开俄罗斯与牺牲塞族人的利益等等。1995年底，叶利钦更是有意冷落外交部，让国防部长格拉乔夫频频执行外交使命。他还命令成立总统外交政策委员会，以加强对外交的控制。

这年12月俄杜马选举中以俄罗斯共产党为主的反对派势力大获全胜，而执政的切尔诺梅尔金总理领导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仅获得10%投票选民的支持。这不能不使叶利钦痛下换马的决心。因为他在接下来的1996年6月的大选中必须要战胜俄罗斯共产党方能连任总统。而这紧要的一点就是需要针对选民的心态以尽力满足和讨好。这样，追随他多年，且忠心耿耿的科济列夫便自然成为第一个牺牲品了。当然，这也怪科济列夫太懦弱、太不争气了。这同他天生一副娃娃脸倒是相称的。

叶利钦总统在解除科济列夫职务后，旋即于1月9日正式任命对外情报局局长普里马科夫为俄罗斯新外长，在西方引带出一片惋惜遗憾之情。西方国家政府和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认为科济列夫是西方国家“值得尊敬的合作伙伴”。是“老练的外交家和俄罗斯利益的坚定维护者”。而早在1995年10月19日，当叶利钦宣布打算撤去科济列夫的外长职务，但在物色到新的合适人选之前，科济列夫仍将留任现职之际，美国国务院就立即作出过反应，表示科济列夫去职“将严重损害美俄关系”。但叶利钦看来没有理睬他们。

西方的反应并不奇怪，因为普里马科夫非同寻常的经历令西方格外不安。去年66岁的普里马科夫，富有国际事务经验，善于从事组织工作。他24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9年加入苏共；会讲阿拉伯语，在《真理报》当过记者、评论员、副主编，著有《国际冲突》（合著）、《资本主义世界能源危机》；他还曾两次访问中国，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苏联时期，他曾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当过苏联情报局局长。苏联解体后，他被任命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他力主维护俄国切身利益，反对美称霸国际事务。俄《消息报》指出：“他领导的对外情报局同早期科济列夫的外交部的方针明显地唱对台戏。”普里马科夫曾多次揭露西方向前苏联派遣大量情报人员，强调俄应采取措施抵制；他领导的情报局还出版了揭露西方向独联体渗透的小册子；他认为，“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还是一个大国，应抗衡美国企图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确立领导地位的战略，他对俄亲西方的外交一直持批评态度，他明确反对北约东扩，认为这会给俄国造成巨大的威胁，会使俄与西方关系重新回到“冷战”时代。

在宣布普里马科夫为新外长时，叶利钦为了安抚和稳住西方阵脚，命总统新闻秘书梅德韦杰夫表示，西方国家不应把科济列夫的去留看成是“某种威胁和俄罗斯对外政策发生变化的标志”。不过，这位新闻秘书同时又说，全面发展同独联体各国的友好关系并加深同它们的一体化，仍然是俄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面，加强同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扩大与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睦邻合作关系，是俄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他还说，叶利钦总统打算努力达到俄罗斯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并争取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和地区发展互利关

系。

普里马科夫则在出任外长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对外关系的4个主要方面：创造有利于俄罗斯民族利益的外部条件；发展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保持国际关系的稳定，共同消除“冷战”后果，调整地区冲突，首先是独联体地区的冲突；继续执行裁军政策，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总之，要奉行与俄罗斯大国地位相称的、符合民族利益的、非对抗性的全方位外交政策。

果然，普里马科夫主管外交部后，俄国外交顿觉局面一新：首先，俄罗斯已经停止执行去年5月美俄首脑会晤达成的核问题的一些谅解。

其次，加强了与独联体诸国建立独立国家联盟及统一国防及安全体系的步伐。

3月下旬，叶利钦同白俄罗斯、哈萨克斯但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总统签署《加深经济和人文领域一体化条约》。条约指出，计划今后成立一体化国家联合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在尊重各国主权、平等互利、不破坏现有国界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分阶段加深条约参加国在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和社会领域的一体化。条约还称，签订该条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形成统一的经济空间，以便使商品、劳务、资金和劳力的共同市场能有效地行使职能，并使统一的交通、动力和信息系统得到发展。条约又指出，各方执行协商一致的价格政策，在工业和农业综合体建设中协调结构政策。条约参加国同意实施统一的社会保障政策并创造条件来保存统一的文化空间，共同创造条件来建立跨国的教育战略。为此，又成立了管理一体化的联合机构：跨国委员会、一体化委员会和议会间的委员会。

4月2日，叶利钦又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签署了《建立主权共和国共同体条约》，并表示不排除今后进而建立邦联的可能。

叶利钦与普里马科夫在外交上的频频出击和强硬派作风，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惊诧莫名之余又深感不安……

科济列夫1990年10月出任外交部长以来，一直奉行亲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重大问题上唯西方马首是瞻，特别屈从美国。结果适得其反，俄罗斯非但没有与西方建立“蜜月”似的联盟关系，反而使俄罗斯沦落为从属于西方的二流国家。这，不仅是广大国民与反对派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连叶利钦也意识到后果的危险。而广大国民与反对派的强烈不满，则直接导致了在1995年底国家杜马选举中，切尔诺梅尔金总理领导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仅获得10%的选票的结局。这无疑使叶利钦吓出一身冷汗。叶利钦为了获得连任，不得不适当调整外交政策，注重民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当然，叶利钦本人也是极具民族自尊心的，正如他在克里姆林宫向外交部人员介绍新外长时所言，更换外长是为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因为“国家的未来和利益，以及改革的全部效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取决于俄罗斯同国际社会的关系如何建立”。叶利钦在事关民族利益，也兼及个人利益（二者成分孰多孰少，不得而知）的危局面前，终于打破情面而忍痛割爱，使自己和国家的手脚得以舒展开来，去国际舞台上寻找新感觉，蹬打新天下，重塑俄罗斯的一流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 《会议桌上的世界》郑寅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4 月版
《中国外交演义》王俊彦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
《罗斯福传》陈乐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6 月版
《世界史通俗演义》当代卷吴必康郭富民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 3 月版
《叶利钦其人其事》刘毅政编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3 年 2 月版
《走出雅尔塔》徐焰等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政海秘闻》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李宗仁先生晚年》程思远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
《邓小平谋略》萧诗美红旗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张继平等编著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 月版
- 《戴高乐传》陈乐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6 月版
《里根传》叶进、李长久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 月版
《尼克松传》啸天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版
《撒切尔夫人传》陈乐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
《撒切尔夫人传》刘德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9 月版
《周恩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2 月版
《元首传》赵白生等编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5 年 3 月版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7 月版
《田中角荣》王泰平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版
《纵横捭阅斯大林》解力夫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 2 月版
《周恩来传略》方钜成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1986 年 9 月版
《真正的战争》尼克松著常铮译新华出版社 1980 年 8 月版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 6 月版
《外国历史名人传》朱庭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1985 年 9 月版
- 《列宁回忆录》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著哲夫译人民出版社 1971 年 12 月版
《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
《列宁传》普·凯尔任采夫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5 年 10 月版
《欧洲战场》唐先圣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版
《乾坤挥手间》李正堂编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3 年 2 月版
《毛泽东、邓小平与现代中国》中国现代史学会编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
《世界史通俗演义》（现代卷）闻一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 5 月版
《布什和他的指挥官》（美）鲍勃·伍德沃德著石尔红译人民日报出版

社 1991 年 11 月版

《第二国际》张友伦商务印书馆 1972 年 5 月版

《论美苏关系》(美)丹·考德威尔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

《铁托自述》佩·达姆扬诺维奇达洲新华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

《世界现代史》王春良等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版

